

编 委 会

主 任：张 磊

副主任：梁渭雄

委 员

毛蕴诗

刘斯翰

李

李文初

李江帆

李辛生

李宗桂

李恒瑞

李鸿生

李锦全

李新家

李新魁

吴奇程

吴奕新

张 绰

张尚仁

张炳申

张硕城

余少波

武 岩

陈胜彝

范 英

林有能

郑英隆

胡守为

钟阳胜

黄天骥

章权才

蒋述卓

温思美

颜泽贤

黎学玲

目

•学苑聚焦•

对“爱国主义”的学理思考

——“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研讨述评 …… 林有能 (5)

•经济•

资本市场与中国经济发展 …… 苟文均 (7)

马克思主义关于银行效益的思想初探

…………… 曾国坚 何五星 (11)

简谈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 …… 马壮昌 章云龙 (15)

深圳市宝安区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实践与探索

…………… 梁道行 (19)

意大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 …… 叶祥松 (22)

•“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广东实践”征文•

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

——从南海市看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 吴赤峰 (26)

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之我见 …… 陈政绍 (30)

•哲学•

关于卢卡奇的自然——历史观问题 …… 翁寒松 (32)

现代的召唤:走出伦理中心主义困境 …… 任剑涛 (35)

哲学博士访谈系列之一:欧阳康博士访谈录

…………… 本刊特约记者 冯 平 (39)

试论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我国社会科学

研究的挑战 …… 刘超球 (43)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林有能(兼)

编务主任

黄荣显

1997年第3期

录

•历史•

- 汉学研究在瑞典 [瑞典]罗多弼(47)
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 李绪柏(50)
清末广西两次会党大起义的比较研究 ... 蒋玲(56)

•文学•

- 浪子词人柳永与正统君臣审美意识的冲突
..... 张海鸥(61)
黎明时分的三支响箭
——论“五四”女作家的杂文、新诗和“问题小说”
..... 钱红(66)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导论”读后放言
..... 黎乔桂(71)

•学者访谈录•

- 龙泉明教授谈现代文学研究 王毅(77)

•书评•

- 广东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印记”
——读《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 杨昌俊(80)
读《清诗流派史》 陈永正(82)
东盟教育研究的扛鼎之作
——评《战后东盟教育研究》 王学风(84)

•学术动态•

- 广东逻辑学会 1996 年学术年会论点综述
..... 黄绍汪(85)
“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 王承文(86)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46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B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 A Radical Consideration on Patriotism — — — a summary of the points from "The Symposium on Patriotism and Spirit of the Epoch" Lin Youneng(5)
- The Relation between Capital Market and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 Gou Wenjun(7)
- A Primary Study on Marxist Thought of Bank Benefit
..... Zeng Guojian and He Wuxing(11)
- A Brief Talk about Manager's Yearly Salary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Ma Zhuangchang and Zhang Yunlong(15)
-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Experimental Units in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Liang Daoxing(19)
-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of Italia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Ye Xiangsong(22)
- A Look through Nanhai Township into the Rural Mass Activities of Establishing Spiritual Civilization Wu Chifeng(26)
- My Opin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en-agers' Ideology and Morality
..... Chen Zhengshao(30)
- About Lukács György's (1885 - 1971) View of Nature - and - history
..... Weng Hansong(32)
- A Modern Call: Leaving from a Difficult Position of "Moral-centralism"
..... Ren Jiantao(35)
- An Interview Talk with Ph.Dr. Ouyang Kang
..... (a correspondent of the Journal)Feng Ping(39)
- A Challenge by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 to Chinese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s Liu Chaoqiu(43)
- Sinology in Sweden (Sweden)Luo Duobi(47)
- The Cultures of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during the East and West Han Dynasties Li Xubo(50)
-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Uprisings of the Nongovernmental Secret Parties in Guangxi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Jiang Ling(56)
- The Aesthetic Conflicts between a Loafer-like Writer of Ci Poem, Niu Yong (987 - 1053?), and the Monarchs and Their Officials with Orthodox Concepts
..... Zhang Haiou(61)
- On the Female Writers' Essays, New Poems and "Stories of Problems" in the May 4th Period Qian Hong(66)
- Some Bold Words Issued after Reading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mpiled by Zhang Peiheng and Luo Yuming Li Qiaogui(71)
- Prof. Long Quanming's Talk about His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 Wang Yi(77)
- A Book Review on "Market Economy and the Socialism Based on It"
..... Yang Changjun(80)
- My Impression on "A History of Poetary Schools in the Qing Dynasty"
..... Chen Yongzheng(82)
- A Comment on "A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s in Five Countries of the East Asian Alliance" Wang Xuefeng(84)
- A Summary of the Points from "1996's Annual Symposium of Guangdong Logic Society" Huang Shaowang(85)
- A Review over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ui Neng (638 - 713) and the Culture in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Wang Chengwen(86)

对“爱国主义”的学理思考

——“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研讨述评

□林有能

广东历史学会等单位于1995年12月和1996年12月相继在广东的肇庆市和汕头市举办“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学术研讨会,着重研讨与爱国主义相关的学术理论问题,这对深化该课题的研究及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很有意义的。研讨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并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一、论题选取的意义

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概括——“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无疑是精辟的。问题的复杂在于,恰是“对自己祖国的这种深厚感情”,使得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都会站于本国、本民族的立场,本着自身国家、民族的利益去阐释“爱国”的内涵,即使是深具理性的人文科学工作者,在涉及到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时,也难免发生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冲突。这两次研讨会,选取“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作为主题。窃以为,这对于解决爱国主义研讨中理性和情感的矛盾,深化该课题的研究,应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所谓时代精神,应该是指代表着各个时期最积极、最先进的思潮和行动,是一种理性的体现。这样,爱国主义——作为情感的体现,时代精神——作为理性的体现,两者融汇结合才有可能对爱国主义的界定作出科学的解释。对此,这两次研讨中,有些学者作了较详尽的表述:“爱国主义,确切地说具有完全意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激情和理性的结合,而不能有所偏废。”“激情促成了理性,理性升华了激情。因之,对祖国的命运的镂心刻骨的关怀,就不能不

体现为把爱国主义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爱国主义的主流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紧密结合,并成为一切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必须具备的本质特征和主要标志。”根据这样的逻辑理路,我们就可以说,“历史上形成的、反映历史进步趋势的祖国利益才构成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

二、两次会议的收获

爱国主义是一个倍受关注的课题,那么,以往的研究状况怎样呢?在这两次研讨中,有的学者作出这样的评判:“自‘文革’以后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和研究,不免令人感到总有某些欠缺深度和广度的感觉。谈起爱国主义,一部分人会如数家珍般列出一大堆历史上爱国者的事迹,……但缺少了理论上的分析。这是一种以个别代替一般,以事实代替理论分析的偏差。”这种评判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它却点出了主要问题之所在:欠缺深度,缺少理论分析。在这两次研讨中,笔者不敢妄言这种状况有很大的改变或突破,但有些专题应该说是有所创获的。

首先,把爱国主义与文化结合起来,从维护本国文化的角度阐释爱国主义的深层内涵。有的学者把爱国主义分成不同的层次,指出:抵抗外国侵略,是爱国主义,是低层次的爱国主义;维护本国文化,是爱国主义,是高层次的爱国主义。一个国家以兵戎相见,灭亡他国,用心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将文化强加给他国,使之成为附庸,用心就不一定显而易见,因此更值得人们注意。这种论述相对于过去以民族英雄事迹和抵抗外来侵略为主线和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

叙述就更具学理深度,是爱国主义研讨中某方面的深化。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命根所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被征服而没有灭种,甚至有些被征服者的高度文明和发达文化反过来征服了征服者,无不显示出文化的内在力量。所以,维护和发扬本国的文化,抵抗外来的文化侵略是每一位爱国者的职责,尤其是在相对和平的环境,无形的文化侵蚀最易得手,(所谓和平演变、西方化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侵略)尤需国人警惕。这就是从文化角度阐发爱国主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二,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念,因而它的主要内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and 有所侧重。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基于这一逻辑理路,与会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发展作了高度的概括,指出古代的爱国主义与忠君、爱本民族、爱国家政权揉合在一起;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现实赋予爱国主义以新的内容,那就是一方面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把国家主权牢牢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另一方面高举科学、民主、文明的大旗,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用“一国两制”的模式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是当前爱国主义的最高体现。笔者认为,这种用变化、发展的眼光来分析不同时期的爱国主义,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其意义在于启发人们要以时代精神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特别是要人们认清什么是当前爱国主义的主要内涵和根本任务,并为实现这一任务而努力。

第三,把爱国主义的作用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历史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它的理据是从精神—物质互变的角度阐述人们由爱国而迸发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必然会转化为维护祖国、建设祖国、热爱世界

和平的动力,转化成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从而推动历史和社会向前发展。尽管这一观点还有待从学理上作进一步的论述,然而它的提出,则是过去鲜有的。它诱发人们重新审视爱国主义的历史作用,从而予爱国主义更为深切的重视。

第四,回应学术界中一些不同意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给学术界营造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因而在爱国主义的研究中就很自然会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诸如爱国会带来排外情绪、不利于对外开放,抵抗侵略不利于西方先进文明的传播等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意见。在这两次研讨中,有的学者针对这些意见进行了回应和辨析,他们从中国近代历史实际出发,肯定了在接受外敌入侵的条件下排外情绪的必要性;指出丧失主权的开放不可能富国强兵,只有坚持主权独立的开放才是真正爱国者的态度;认为爱国与开放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爱国则必须开放,开放是为了爱国,两者并不矛盾。同样,面对外敌入侵,抵抗是每一个爱国者的必然选择,但这种抵抗并非是排拒所有先进的东西,近代许多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先驱。再有,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都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他们侵略落后国家和民族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并没有把先进文化传播给落后民族的主观动机。因此,抵抗其侵略与学习其先进的东西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抵抗侵略与学习西方并不存在矛盾。

三、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一,在这两次研讨中,尽管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但就总体而言,理论层次还有待提高。首先,如前所述,“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主题,但是在这个总的题目下,如何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专题作为研讨的核心是研讨会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前提之一。而这两次研讨会在这一点上则未尽如人意,因而参与研讨的论文以及在研讨过程中就出现偏离主题的零散情况。其次,有些学者未能把握好学术研究与普教宣传的功能和任务的

资本市场与中国经济发展

□ 苟文均

资本市场在中国的转轨经济中正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推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一、培育一个更富竞争性和清偿力的银行体系

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维系着国家银行高度垄断的金融体制,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自财政预算拨款,银行体系仅给予国有企业数量有限的短期贷款,以满足超配额短期流动资金的需求。政府预算和信贷计划引导着金融资源的流动和配置,银企之间没有真正市场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银行对企业贷款之风险和盈利能力没有敏感反应。

市场经济改革促进了中国原有的国家银行高度垄断的金融体制发生分化。垄断的银行体系分离出一个中央银行和四大专业银行。此外还生长出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融资也由过去的财政拨款转向银行债务融资。由于在银行体系之外缺乏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结构的、有效运作的资本市场,使得国有企业高度依赖银行债务融资。国有企业整体经济

效益水平的低下、大量的债务合同、较高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波动以及缺乏股权融资,使得许多企业债务资产的比率超出了谨慎的水平。根据1994年底的统计数据计算,国有企业的负债资产比率水平平均达79%,此外总资产中还有9%是损失挂帐、未作处理的虚数,两项合计共88%。现在的情况可能更趋严重。1995年上半年全国企业波动负债比率已高达90%左右。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急需长期资金,希望扩大股权资本,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资产负债比率。

企业对银行融资的高度依赖把银行置于高经营风险的危险之境。从银行的角度看,股权资本是企业一种永久性的不需要固定地偿付本金和支付利息的资金来源。企业从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还可以为偿还重大债务提供资金。缺乏股权资本意味着对债务融资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当预期与结果发生偏离时,就可能导致企业无力按期偿债,把银行贷款沦为呆帐、坏帐,从而使负债经营的银行缺乏清偿能力,爆发银行体系的危机。

股票投资对于投资者而言是一种风险资本,因为股东产权的收益决定于公司的

分寸,侧重于后者而影响了学术层次。

第二,近代爱国主义是爱国主义研讨中最受关注的一段,然而由于近代的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使得这一历史时期与爱国主义关联的许多问题不易作出解答。研讨中,不少学者都认为抵抗外来侵略、变法图强、振兴中华是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标志。

但是在这一标志的前提下,怎样阐释统治阶级中的战与和、为了富国强兵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和活动、统治阶级在经过奋力抵抗外敌而最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以及怎样评价那些与外国侵略者谈判、签约的执行者等等,均有待从理论上作深入的探讨。

经营状况。如果公司解体,只有在偿还完所有贷款和其它债务融资之后,股东才享有剩余产权资本索取权。因此,富有竞争力的银行一般不愿意对那些自有资金未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发放贷款。债务与股东产权的比率在各国可能有所不同,但总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一限度,银行就不会放款。中国国有企业的高资产负债比率及其对银行信贷的倒逼,严重地损害了银行体系的安全性,侵蚀了银行的资本金。据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银行自有资金占资金总额的比例已由1985年12.1%下降到1994年的7%以下,大大低于商业银行法的法定界限和国际公认的8%警戒线。因此,推动资本市场中股票市场的发展能稳定和提高银行体系的清偿力。

一个富有活力、高效运作的资本市场为储蓄者和资金需求者在银行体系之外又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融资选择机会。储蓄者通过比较股票债券和银行存款间的收益率流动性和安全性而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公司则能够权衡各种资金来源的成本和期限结构而选择成本最低的融资方式,这就会促进银行体系的竞争和效率。中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改革开放后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国有银行体系仍在金融体系中占有垄断优势,市场的竞争机制难以充分发挥。因此,积极发展资本市场,能提高中国银行体系的竞争性和效率。

二、调动储蓄资金并促进向投资的转化

资本市场在调动储蓄资金并促进向投资的转化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1)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工具与储蓄率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储蓄对各种金融工具实际收益率的变化反应敏感。存款的增长速度迅速下降,从而减少一国的金融储蓄总量。资本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具有不同流动性、收益性和

安全性的新型金融工具,如股票、债券、可转换债券等来刺激人们去进行金融投资、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购买不动产或外逃到国外寻求有利可图的投资,这就能提高社会的边际储蓄倾向和一国的储蓄率水平。(2)资本市场提供的金融工具通过与利率受抑制的银行存款等之间的相互竞争,能推动受抑制的利率达到更接近于能正确反映通货膨胀和资金稀缺性的市场利率水平,从而形成一国合理的金融资产价格体系,促进储蓄水平和有效投资。(3)资本市场能通过创造流动性来吸引长期金融投资。许多有利可图或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需要长期资本的投入,但投资者往往不愿长期放弃具有安全性、存取自由的银行储蓄。资本市场创设的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机制为实现金融工具的高流动性和投资者的进入退出提供了条件。流动的产权资本市场颇具吸引力,它不仅能使证券投资者获得一份资产——股本,并在他们一旦需要增加储蓄或改变其资产组合时可以立即抛售,降低投资风险,并使其更加有利可图,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而且公司获得永久性的资本来源,能改善企业资本结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在中国,企业是否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来筹集和充实资本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否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来融通长期资金,要看国民收入分配以及由之决定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究竟是何种格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证券市场确实没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改革改变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构,在社会总储蓄结构中,政府储蓄逐渐减少,分散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则逐年增加。目前,全国城乡居民的金融资产总量约4万亿元左右,其中储蓄存款近3万亿元,约占城乡居民金融资产的75%;全社会现金流通量7500亿元左右,国库券余额约3500亿元,还有一些其他债券、基金、人寿保险单等。这种居民金融资产过分向储蓄倾斜的结构既不利于城乡居

民资产的增值、保值,也制约了国家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等建设资金的筹集。因此,应建立多种投资渠道,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十分迫切和必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证券市场为主体的资本市场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机制。

三、提高资本的合理配置效率

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微观基础是以公司制企业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公司制企业所筹资金由各种类型的股票和债券组成。对于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尽量节约资本,提高资本的运用效率;二是扩大资本规模。尽量节约资本就是不仅要在生产过程中充分发挥资本的效用,而且要选择成本最低的融资方式,而证券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融资工具,又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工具。在银行信用体系之外构筑一个以证券为主要工具的资本市场,可以通过竞争机制的作用更有效地降低资源的配置成本,提高市场经济运作的效率。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远没有市场机制那样行之有效,尽管市场机制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因为信贷计划配置金融资源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政治偏好,公共部门有高于私人部门的特权,优待大项目、歧视小企业、信贷配额制、利率不合理及寻租行为,造成金融资源的价格扭曲、误配和浪费。在没有一个有效运作的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融资或者说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进行的:1、企业通过保留收益的方式进行内部融资。历史久而颇有效益的大企业有条件通过截留利润进行再投资,但那些富有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新建公司以及高风险的高科技产业的融资却困难重重。如果没有一个以证券市场为核心的资本市场,新兴产业和富有发展潜力的新公司就难以建立,大公司则由于规模经济效应易于进行资本积累而越来越大,这就会形成垄断的市场结构,阻碍一国

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竞争水平的提高。2、银行信贷融资。如果没有一个有效运作的、适度规模的资本市场,企业就不能补充充足的自有资本。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必然形成企业过高的资产负债比率,增加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对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来说,由于市场残缺,银行利率不能发挥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合理流动,并由于地方政府支持下的企业对银行信贷资产倒逼机制的作用,银行信贷既不能流向其最有效益的地方,也缺乏约束力,因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极低。这就需要在银行信贷体系之外发展一定规模的高效运作的资本市场。

四、促进企业的产权转换和重组

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关键环节,因为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又为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股份制企业治理结构的形成和资本结构的合理化、产权转换和产权流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确立,兼并与收购、产权转让与交易已开始成为中国资本市场趋于发展成熟的新增长点。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发生的企业并购和产权(股权)转让事件,自中国证券市场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然而,中国发生的大多数产权转让和重组是在资本市场之外进行的,产权转让和重组是股票市场应有的功能,西方发达国家的并购活动主要在资本二级市场上进行,中国资本市场的狭小不足以完全承担起产权这一企业综合要素流动的重任。在中国大量的上市公司目前尚不能流通法人股和国有股,且多数国有企业不能通过股票的发行和流动来实现要素的重新配置的约束条件下,产权市场在盘活存量资产,促进产权流动和重组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资本市场的必要补充。

然而,产权市场作为资本市场规模狭小条件下的重要补充在发挥产权流动和重组方面具有极大的局限性:1、企业财产的非证券化使财产具有不可分割性,从而造成产权流动和产权交易的困难。因为对大中型企业产权的购买是单个企业和个人无力完成的,只有多个企业或个人的共同参与才能实现产权的转让和重组,这就必须对被购买企业进行股份化,并通过股票的转让实现产权流动和重组。2、对小型企业的兼并虽不必进行股份化,但兼并者往往因资金不足需要出售已有的证券,这也需要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高度流动性的资本市场。3、通过证券市场实现产权流动和重组可以超越现有经济体制和地域分割性的约束,节约交易成本。被兼并企业可将资产作股投入兼并企业,并凭所持股份获得相应的权益。这样,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可通过证券的交易来实现产权流动和重组。因此,只有加快发展中国资本市场,才能高效率地推进企业的产权转换和重组。

五、资本市场是既能满足中国经济增长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又能抑制通货膨胀的融资机制

货币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然而货币供给的扩张又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损害一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由此可见,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银行信用机制很难实现刺激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双重目标,其根本原因在于银行信用的货币供给机制。商业银行的信用机制具有创造成倍货币量的乘数作用,这就会导致流通中货币供给量的迅速膨胀。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客观上要求有更高效率且能解决刺激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之间矛

盾的融资机制。资本市场的发展为这一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因为以证券为媒介的资本市场融资机制的特殊功能在于:它在为市场经济运行扩大货币资本供给规模的同时却能保持货币供给总量的相对稳定,而且这一机制会促使货币资本按照效率原则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一方面,它把社会闲置货币转化为运营资本,这种转化在保持社会货币供给总量规模不变的同时相应增加了社会的投资;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有效资本配置效率能提高货币资本的运用效率,节约资本,从而减少对货币资本的总需求,降低中央银行货币投放量。

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稳定增长对于成功实现转型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几次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害,根本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银行信贷对企业的软约束导致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低效运用和地方政府支持下的企业对银行信贷供给的倒逼;二是由于缺乏银行信用之外的融资机制,企业的投资饥渴和财政赤字主要依靠中央银行放款的扩张来满足,然而,经济产出的低效益不能吸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这就会推动通货膨胀的上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很低的通货膨胀率,除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外,与它们拥有发达的高效运作的资本市场具有极大的相关性。因此,中国应稳步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实现低通货膨胀和高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作者苟文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100015)

责任编辑:谭湛明

马克思主义关于银行效益的思想初探

□ 曾国坚 何五星

应该承认,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邓小平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先导,对银行效益问题没有直接全面地进行论述,甚至很少直接使用银行效益这个概念。但是,这些伟人对银行效益的有关思想却是很丰富、很有真知灼见和现实指导意义的。

一、马克思关于银行效益的思想

(一)银行的效益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20章中剖析了价值和财富这两个范畴的区别,批评了萨伊把价值、财富和效用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肯定了李嘉图这个观点,并且指出,李嘉图在这一章中包含了这样一个思想:“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①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评价了李嘉图的思想,而且明确阐明了真正的财富应当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内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很显然,马克思关于真正财富这一思想和理论,体现了银行效益的基本精神。

(二)借贷资本运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马克思从揭示剩余价值规律出发,研究了借贷资本运动的“四链条”模型,即 $G—G—W—G'—G'$,他把这个循环过程概括为“双重支出”和“双重回流”,指出第二次回流终点上的 $G' = G + \Delta G$ (G 为贷款本金, ΔG 为贷款利息),即第二次回流已增殖,在量上大于第一次回流。并指出:“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②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虽然与产业资本的运动形式不同,但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都是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马克思这一思想,其现实意义在于:虽然时代不同和所有制不同,但借贷资本运动规律是一样的,借贷资本运动形式是一致的,只要是从事借贷行为的商业银行,就应当理直气壮地确定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和经营方针。

(三)提高银行效益应遵循的几个观点。

1、节约与分配劳动时间的观点。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③又说:“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④这个观点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银行仍需要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以便于实现银行宏观经济效益。因为这样做有利于银行社会劳动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形成银行的结构经济效益。从微观来说,节约劳动时间,也就是降低各种耗费,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银行微观经济效益。

2、资本潜能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一个一定量资本的作用程度,是由生产过程的各种潜能规定的,而这些潜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资本本身的价值量无关的。”^⑤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分析,说明了同量资本因周转速度不同会有不同的利润率。加速资本周转可以提高年剩余价值率和年利润率,其原因就是因为在资本周转速度的加快,同一原有资本在一定时期得到多次利用,很好地发挥了它的潜能,其结果是提高了年利润率和年利润总量。马克思关于资本潜能的观点,是我们通过不增加投入,而通过挖掘各

方面的潜力来提高银行经济效益的理论依据。

3、资本扩张力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⑥科学技术运用于银行，可以急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经营管理，可以节约大量耗费和降低业务成本，可以开发和实现具有多功能、新功能的金融产品等等。在个别银行首先使用科学技术于业务时，他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在所有银行都采用科学技术时，他们共同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前进。因此，银行在从事货币经营和信用活动中采用科学技术，是提高银行经济效益的关键。

二、列宁关于银行效益的思想

(一)实行银行国有化，是社会主义银行取得最佳社会效益的前提。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实行银行国有化。实行银行国有化，是社会主义银行取得最佳社会效益的前提。他指出，“现代的银行同商业（粮食及其他一切商业）、工业紧密地生长在一起，不‘插手’到银行中，绝对不能做出丝毫重大的、丝毫‘革命民主的’事情来。”^⑦“只有实行银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往来流动的去向，以及这种流动是怎样发生和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只有监督银行，监督这个资本主义周转过程的中枢、轴心和基本机构，才能真正地而不是在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经济生活的监督，做好对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才能做到‘调节经济生活’，否则，这种事情仍免不了是欺骗老百姓的一句部长式的空话。”^⑧苏维埃政权只有夺取资本主义大银行并将其国有化，才能粉碎金融资本的统治，为无产阶级进行生产方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只有实现银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有可能稳定货币和市场，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他认为，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银行的社会经济效益也是不

能充分发挥的。列宁关于“银行实行国有化有利于提高银行社会效益”的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如何完善中央银行体制和发展政策性银行体系，如何更好地提高这些非商业银行的社会经济效益是值得借鉴的。

(二)搞好统计与监督，是提高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宏观效益的关键。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最精密的、最负责的计算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⑨他强调，“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⑩因为统计和监督能充分地、合理地、节约地利用已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创造出空前高的劳动生产率。他认为，“大银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骨干。”^⑪银行是一个综合部门，是唯一的货币发行机关，是全社会的“公共簿记”，在国民经济的运转中，银行既是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三大中心”和资金活动的总枢纽，又是国民经济各部门联系的纽带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具有对产品生产和分配实行正确统计和有效监督的能力。因此，社会主义银行必须进行严格的统计和监督，以实现最大的宏观经济效益。列宁这一思想和观点，对于当前我国中央银行全面履行职能，完善发挥宏观经济效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关于银行效益的思想

(一)纸币发行应按经济发展需要发行。纸币以什么作为依据进行发行，这不仅关系到银行自身的经济效益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银行的社会效益问题，关系到抑制通货膨胀和国民经济稳妥、协调、高效发展的大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纸币发行问题。早在1933年，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由于财政收支不平稳和现金大量外流，故迫使纸币发行大增，造成苏区内物价急剧上涨，纸币严重贬值。对此，毛泽东于1934年1月强调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原则，应该根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

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需的。”^⑫并指出,为了免去苏维埃纸币跌价的危险,苏维埃政府必须更注意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尽量输入现金与限制现金的输出,使苏维埃金融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极大地活跃起来,是增加市场吸收纸币的容纳量与保持纸币信用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同志关于纸币发行的原则,不仅强调绝对必需,而且突出了经济发行的原则。根据经济发展发行纸币,是毛泽东亲自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时从实践经验中得来的,是马克思货币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银行效益思想发展的重要成果。

(二)合理、有效地发放贷款。如何搞好货币的合理供应和资金的有效使用,毛泽东长期比较注重这个问题。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了“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发行”的论述。同时,他强调银行信贷要支持生产,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他要求银行贷款在讲求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注重自身经济效益,力求“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⑬毛泽东这些见地,对今天我们提高银行效益仍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

(三)勤俭、节约地办银行。节约支出,是提高银行效益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要为战争和革命事业节省每一个铜板。他尽管没有专门直接论述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办银行,但他的思想包含了这一内容。坚持勤俭、节约办银行,这对于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厉行增收节支,反对挥霍国家资财,力求避免浪费,以达到全面提高银行经济效益,具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四、邓小平关于银行效益的思想

(一)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以后,对于操纵国民经济命脉的大银行采取什么态度,运用什么方略,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未来的社会将有

计划地组织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国家银行只是国家手中掌握的一种计划配置资源的工具;列宁和斯大林,直到毛泽东也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对立的两种社会基本制度来看待,因此,银行只能是国家独享垄断权。只有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又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现实经验,从而在建立完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和社会主义国有银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同时也为从根本上解决银行效益问题指明了方向。1979年,邓小平同志指出:“银行应该是抓经济,现在仅仅是算帐、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要把银行当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必须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⑭只有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银行才能有真正的效益。1986年12月邓小平同志又指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⑮“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这不仅指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尤其是银行效益思想的新发展。

(二)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货币政策,是发挥银行效益的前提和保证。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并曾为制定货币政策制定了宗旨和原则。1943年7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力的保障。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

用是很巩固的。”^{①⑦}这一段论述，引出了可供当前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历史经验：第一，货币政策必须维护党的利益，要服务于党的目标和中心；第二，货币政策要讲求社会经济效益，服务于经济发展；第三，保持币值稳定，巩固本币信用；第四，限制发行额，调控货币供应量；第五，发行货币要有充足的物质保证；第六，坚持打击假币和非法货币流通。

（三）要学习国外银行先进经验。学习国外银行经验，与世界金融接轨，是邓小平又一重要的银行效益思想。当全国理论界对股份制经济姓“社”还是姓“资”问题讨论难分难解的时候，当社会主义应不应该发行股票、建立证券交易所莫衷一是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⑧}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我国的股份经济和股票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胆学习国外银行先进经验，大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也是银行走上国际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举措。邓小平同志多次谆谆教导我们：“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①⑨}“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一政策已经开始有些效果。但是，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

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②⑩}所以，我们各级政府，各经济部门，特别是银行战线，应该遵照小平同志的教导，审慎研究如何做到既要大胆地引进外资和技术，又要“合理地利用”，如何在偿债率的范围内掌握住这个“度”，使昂贵的学费，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第281页；

②《资本论》第三卷，第44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2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

⑦《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36页；

⑧《列宁全集》第25卷，第321页；

⑨《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10页；

⑩《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0页；

⑪《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11页；

⑫《金融知识百科全书》第2333页，马洪、孙尚清编，中国发展出版社1990年版；

⑬《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5页；

⑭《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研究》第14页，刘鸿儒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

⑮⑯⑰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3页、第17页、第373页、第117页；

⑲《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4页；

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5—406页。

作者曾国坚，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高级经济师；何五星，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经济师(510051)

责任编辑：谭湛明

简谈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

□马壮昌 章云龙

所谓年薪制,就是出资者以年度为单位确立和支付经营者薪金的工资制度。英、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对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在美国,公司董事会主席、各级总裁和副总裁、各级经理、公司监工以及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一般都实行年薪制。

经营者年薪制在我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的经济现象。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对经营者和一般员工统一实行月薪制。改革开放十几年来,虽然对现行的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但传统的经营者月薪制基本未被打破。经营者月薪制是与传统企业制度相联系的,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其弊端日益明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彻底改革传统的经营者月薪制,实行新的经营者收入分配制度——经营者年薪制。

实行经营者年薪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原则的要求。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等量劳动应取得等量报酬。企业经营者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时付出的是一种特殊的复杂劳动,其特殊性表现在:一是经营者需要经过专门训练。一般来说他们都有较高的学历,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对他们的培养曾支出了较高的代价。二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经营者的工作不像一般员工那样有相对规则的时间,他们工作往往夜以继日。国有企业经营者没有独立的利益,所以,要造就一支企业家队伍,就要在促使经营者职业化的同时,实现利益独立化。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经营者不是靠自己拥有多少财产去经营企业。而是靠自己的才能去经营企业,在保证出资者利益的同时去谋取自身的利益。实行年薪制,把企业经营业绩与获得的报酬联系起来,就能使经营者感到,在他所从事的事业

中,除了神圣的使命外,对自己也是有利可图的。这样,经营者不仅会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的职业,并且为获得更多的利益,去不断提高自己的经营才能,努力搞好企业经营。这在客观上能加速经营者职业化,促进高素质企业家队伍的形成。

一、年薪制在我国的提出与实践

经营者年薪制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而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初期,为调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国家允许企业在完成上级下达利润指标后适当提取用以增加职工工资,于是经营者在企业利润指标完成后便可与其他员工一起增加一定的工资。经营者的工资收入与企业利润开始挂起钩来。

80年代中期,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经营者的报酬与企业效益有了更直接的联系。1986年底,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规定》,指出“凡全面完成任期内年度责任目标经营的个人收入可以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1—3倍”。同时提出,“作出突出贡献的,还可以更高些”。此规定已经颁布,全国不少地方的厂长(经理)因在任期内企业经营效益较好,而受到政府或主管部门的一次性奖励。不仅如此,一些地方对有突出贡献的厂长(经理)还给予重奖。如北方某钢厂厂长在拿到100万元奖金的同时,又得到一幢小别墅。南方某企业厂长不仅奖励了一套房,又得到一辆小轿车。于是,社会上开始议论纷纷,有人提出企业是国家的,企业利润主要是由工人创造的,不应给厂长(经理)如此高的奖励。还有人提出厂长(经理)的灰色收入已经不少,其任职期间还享

有一般职工享不到的待遇,不宜再重奖。面对种种议论,一些厂长(经理)也发生疑问: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获利后,经营者个人可得十万、几十万、几百万的收入,我们付出如此多的劳动,为国家创造那么多的利税,难道我们就不能多得到一些报酬吗?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结合国外通行做法,有人就提出了将个人收入与企业效益公开而科学结合的一种新的工资制度——年薪制。

年薪制首先出现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1994年,深圳市选择六家企业进行年薪制试点。年薪制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和效益工资两部分。基本工资与企业的类别级别挂钩,效益工资与企业净资产增长率和实现利润增长率挂钩,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年薪在员工工资总额外单列。之后,全国不少省市开始试行。1995年2月,江苏省南通市试行经营者年薪制。北京市在1995年也作出决定,在市属部分国有企业中进行年薪制试点。内容主要包括:(1)经营者基薪确立,主要根据企业经营效益水平和生产规模,并考虑全市和本企业职工平均收入水平,一般试点中经营者基薪最高不超过北京市及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2)经营者风险收入主要依照企业超额完成当年生产经营目标的幅度确定,风险收入最高不超过基薪的一倍,最低为零。对经济效益下降或国有资产减值的,应扣减经营者的基薪,最少不低于20%,所剩部分一般不低于当年本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3)党委书记也采用年薪制的办法。(4)经营者的年薪收入在成本费中列支,并在企业提取的工资总额外单列。福建省也制定了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收入管理办法(试行),其主要内容是:(1)经营者年薪在职工工资总额外列支。(2)经营者年薪收入由年基薪和效益工资组成。年基薪按当年本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40%与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60%之和为基础,再按国家统一规定的企业类型确立年基薪。小型企业年基薪按基础增加1倍,中型企业经营者年基薪

按基础加1.5倍,大型企业经营者年基薪按基础加两倍。(3)经营者效益工资与国有资产增值和实现利润挂钩,企业完成国资、财政部门下达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利润指标的(亏损企业按规定的减亏额),经营者可获得年基薪。超额完成的经营者可分别按超额完成的国有企业增值和利润分档次累计提一定比例效益工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利润考核指标,原则上以企业前3年平均增值额和实现数为基数。(4)经营者年收入的20%转入风险基金,风险金待经营者任期届满统一结算。因决策失误的,应按损失额的一定比例扣减风险收入。

目前,全国许多省市如广东、浙江、湖北、上海、湖南、河南、山东等都相继出台了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办法。

各地在进行年薪制试点时,一般都将经营者的年薪分为基薪和风险收入两部分。基薪按企业规模、效益和本地、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倍数来确定。风险收入则依据企业上缴利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情况确立。年薪的确立基本体现了责任、贡献、报酬相一致的原则。各地还把经营者的收入与职工的收入区分开来,形成了经营者独立的收入决定机制。

实行年薪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国有资产保值及提高国有企业效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深圳市实行年薪制的六家企业资产总额由1993年的37.41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44.65亿元,提高了19.6%;实现利润由1993年的7.5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8.95亿元,平均增长19.2%。

作为在改革中新出现的事物,年薪制在试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1、年薪标准的确立尚不规范,不能真正起到激励和约束经营者的作用。虽然各地都将年薪分为基薪和加薪两部分,但基薪和加薪确立的差异很大,有的规定基薪与企业的规模、行政级别挂钩,在确定基薪时未摆脱传统工资制度模式。加薪虽然一般都与企业的效益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相

联系,但仍规定不能超过基薪的多少倍。对加薪的最高标准作出限定,这就不能很好发挥加薪的激励作用。在年薪制试行办法中,对经营业绩不好的经营者缺乏相应的处理办法,即使企业亏损,经营者仍然得到一定的报酬。这种年薪制确定办法,使经营者包盈不负亏,失去对经营者应有的约束力。

2、实行年薪制经营者的范围不明,经营者的任用未形成竞争机制。有些地方只对董事长或经理实行年薪制,有些地方把党委书记也作为实行年薪制的对象。但企业中哪些人员适宜实行年薪制,尚不统一。正是由于经营者范围不统一,造成企业内部人际关系出现新的矛盾,不少副职及主要管理层对自己未能实行年薪制意见很大。如果党政副职及主要管理层都实行年薪制,一是可能会引起工资开支较大;二是没有较好的年薪确立的办法,实行年薪制出现新的矛盾。

按目前的人事组织制度,国有企业经营者一般是由上级部门任用,并非通过竞争上岗,因而经营者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企业负责的状况就很难改变。经营者即使在一企业经营不好,仍能被调到其他企业或部门。这就有违实行年薪制的初衷。

3、企业经营指标难以严格考核。一是在国有资产评估上,缺乏一套严密系统的评估方法。特别是无形资产更难评估。二是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在税收、信贷方面可能得到某些优惠,难以真实反映企业效益情况。三是经营者为显示经营业绩,往往使用非正规的财会办法,如该提的折旧不提,该摊的费用不摊等。四是管理费与交际费无法区分。有些经营者用企业款请客送礼,或在经营过程中高价低卖,低价高买吃回扣等。以上多种因素给正确考核经营者指标完成情况带来了很大难度,也给年薪制的确立增加了困难。

二、完善经营者年薪制的对策思考

1、确立合理的年薪标准,规范年薪的

发放程序。首先,基薪的确立应把企业资产规模、利税水平、职工人数、企业技术密集程度、资金密集程度、本企业工资水平、本地企业工资水平、本行业工资水平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忽略了其它方面。应明确某一要素在基薪中占多大的比重,按比例计算出基薪。这样基薪的确立就比较具体,且易于操作。其次,加薪的确立不能仅规定为基薪的多少倍,这样一是过于简单,二是不利于经营者积极性的发挥。确立加薪在坚持资产保值增值、提高效益的原则下,要从本地区、本行业、本企业的实际出发。把企业当年职工人均工资额、利润增长度、资产负债率降低度、销售增长率、人均利润增长率、技术进步率、管理达标率等方面结合起来。由于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在加薪确定上应有不同的要求。只要求经营者一年完成多少利润,然后从超额部分按比例提取加薪,有时欠妥。对于基础较好的企业,经营者可能会完成指标,并能提取较高的报酬。但对于基础较差的企业来讲,做好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性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些甚至几年内难以有利润。所以,在目前国有企业普遍亏损严重的情况下不能一味要求利润实现的绝对额。对于基础较差的企业,应根据企业综合素质的提高程度如企业管理水平、质量达标、技术进步、减亏额等方面去确定经营者的加薪。第三,年薪不应有限额,应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使年薪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发挥出来。至于经营者年薪收入过高问题,应通过个人所得税调节而解决。第四,年薪应取于企业利税,在上缴利税中挖出一块,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企业审计后发放给经营者。政府应建立经营者年薪基金,专门用于年薪发放。

2、进一步明确实行年薪制经营者的范围。董事长、总经理在一个企业经营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关键作用。但仅靠一个经理或董事长的力量要经营好一个企业是相当困难的。经营好一个企业必须有一个经营群体,即包括董事长、总经

理及其副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内的管理者集团,副职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董事长、总经理决策的参谋和助手,同时也是决策的关键执行者,没有他们的积极配合,企业是难以经营好的。所以,实行年薪制的经营者的不应仅是董事长、总经理,而应包括副职及主要部门负责人。不过,由于在企业任职及地位不同,其作用和责任也不同,年薪的确定当然也不一样。副职、部门负责人的基薪可按董事长、总经理的一定比例确定,加薪由董事长、总经理根据副职、部门负责人所承担的责任、所起的作用来确定。

3、提高中介机构的水平和素质,完善评估制度。年薪制是对资产增值及企业利润的奖励制,只有资产增值和效益评估准确,年薪的确定才能准确,从而才能起到真正的奖励作用。要使资产增值、效益评估准确,就应提高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素质和水平,加强评估制度建设。一是实行持证上岗制。中介机构人员只有获得评估资格,才能从事评估工作,即使获得评估资格的评估人员仍要定期进行考核。二是提高评估人员的待遇。给评估人员一定的高薪,使他们珍惜自己的岗位。三是强化评估人员的纪律观念。不准评估人员收受礼品、礼金,不接受请客,对违纪者严肃处理。四是加强评估机构的管理,对评估中介机构定期进行资格考核,对不具备评估能力或不按规定进行评估的,要取消其评估资格。

4、严格企业内部财会管理,加强企业内部监督。严格的企业内部财会管理是搞好评估的基础。如果企业内部财务混乱,势必给评估带来困难,评估就难以准确。要严格企业财会管理,首先经营者必须重视财会工作,经营者不能让财会人员违反

财会规定处理帐目;其次提高财会人员素质,让真正懂财会的人做财务工作。再者,完善财务制度,对违反财会制度的要按规定进行处罚。

5、建立经营者提拔、任用、淘汰机制,实行经营者竞争招标制度。改变那种由组织部门或政府主管部门按行政级别选拔任用经营者的习惯做法,建立新型的选拔、任用、淘汰经营者的机制。一是转变观念,从过去以政治态度定人的片面性转移到以经营才能为主,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上来。二是实行经营者任职资格制。经营者只有具备了任职所必须的基本道德、基本业务知识、基本经营才能,才有资格任职。三是采取多种形式选用经营者,既可采用聘任制,也可实行考任制。四是充分发挥国资部门的作用,完善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使其真正成为企业的决策权力机构。选用经营者既要经过必要的考试、考察、考核,同时要确立经营标的,进行招标。投标中标后,对经营者试用一段时间,然后再正式签定合同。

6、制定规范年薪制的法律法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经营者年薪制也应制定法律法规,用法律形式把出资者、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规范起来。包括出资者、经营者的权利、义务,经营者产生的办法,年薪的确立、发放程序,经营合同的签订,资产评估办法,违约责任等,都要作出明确的规定。只有将年薪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年薪制才能规范起来,并真正起到对经营者的约束和激励作用。

作者马壮昌,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博士;章云龙,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硕士(510031)

责任编辑:谭湛明

深圳市宝安区

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实践与探索

□梁道行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是深圳市宝安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建区以来,我们十分重视区属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作。1994年8月,开展了首批8家企业试点改革,并于1995年9月顺利完成了试点改革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运作,1996年,8家企业实现利润2928万元,比上年平均增加8.8%,净资产

比上年增加7.1%。在此基础上,区里又选择19家企业进行第二批改革,目前,第二批企业改革工作已进入资产清查审计和资产评估阶段。回顾宝安区企业改革工作,我们主要抓了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股权结构、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富余人员安置和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搞好资产评估,强化国有资产具体存量管理

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影响,区属国有企业的资产一直缺乏严密、规范的管理,产权关系不清,权责不明。8家试点企业净资产增长率普遍偏低,1994年有2家企业净资产出现负增长。在企业内部,帐目不清,帐实不符,报表不能真实反映资产存量,甚至连经理也说不准自己企业的家底。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要求,重点抓清产核资工作。

1、建立企业资产存量管理档案。过去企业没有资产登记,企业有哪些资产,没有完整的档案可查。为此,我们把建立一套完整的资产存量管理档案作为突破口。先让企业自查自报,再组织专业队伍,深入企业现场做好复查核实工作。把企业厂房、设备等动产和不动产,逐一记录在案,对固定资产全部拍照存档,并将有关数据资料输入电脑,形成一套比较规范和完整的档案资料。通过建立国有资产存量管理档案,改变以往无帐可查、无处可查的混乱状态,为整个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打好了基础。

2、组织开展企业资产评估。资产评估是企业改革的关键环节,是企业最关心也最敏感的问题。为做好这项工作,首先,依照国务院《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结合试点企业实际,制定了《改组企业资产评估方案》,对资产评估的范围和方法等作了明确规定,其次是严格选定评估机构。经过认真的审查、筛选,聘请市、区几家资信较好、实力较强的中介机构负责资产评估工

作。第三,根据企业实际,合理确认评估结果。在评估中,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先根据资产的原值、净值、折旧程度、重置成本及获利能力等进行评定,然后根据每个企业的不同情况,合理确定其评估结果,既保证了国有资产安全增值,又使企业和职工能够接受。如畜牧总公司反映按市场法评估农业用地与实际获利不相符的问题,我们相应调低评估标准,使之符合企业实际。评估后8家企业总资产平均升值26.8%,净资产平均升值65%(其中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增长268%)。

3、验证评估结果,确立企业法人财产权。为避免国有资产在评估中造成流失,在中介机构完成评估报告后,我们开展了对评估结果的审查确认工作。一是对照存量资产档案逐一核查;二是到现场核帐核物。对漏评、错评的资产重新评估,对企业隐瞒收入和帐外资产一律按规定重新入帐。通过认真细致的清查确认工作,共核实、纠正了漏报、漏评资产2500多万元,保证了评估结果的真实性,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经过清产核资、界定产权,区国资委向试点企业颁发《国有资产授权占用证书》,确立企业法人财产权,明确企业应承担的经济责任,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家底不清、责任不明的局面。

二、推行职工持股,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

1、实现股权多元化。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我们将试点企业改组为混合所有制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产权社会化,通过产权的纽带,在企业内部建立起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相互制约的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严格按照“一法两条例”(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股份公司条例)的有关规定,设置了符合企业实际的股权结构方案。除了鼓励区内外企业、外资企业向试点企业参股外,还采取了试点企业间相互参股、债权转股权、

区属上市公司向试点企业参股、区内集体资金参股、投资管理公司用部分分红和配股参股等办法,实现了股权主体的多元化。8家试点企业改组后,国有资本共有16490万元,占总股本83.9%;法人资本1260万元,占总股本6.4%;个人资本1916万元,占总股本9.7%。

2、推行职工持股。为提高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积极性,我们推行了职工持股的改革,主要采取现金持股和负债持股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措施:一是由投资管理公司筹集200万元,作为职工持股基金低息贷给职工参股;二是效益好的企业用效益工资参股;三是从评估增值的净资产中划出10—15%,低息借给职工负债持股,职工要还本付息,股本逐年从其股份分红收益及效益工资中扣回。员工股原则上不能转让,不能继承,职工离退休、离开企业不能享受分红。规定每个职工现金持股部分不得低于持股总额的20%,独资公司100%现金持股。在持股额分配方面,本着既要拉开档次,又要掌握好平衡的原则,根据企业职工的职务、工龄、贡献大小,合理确定个人的持股份额,其中企业经理持股额不超过职工的3—5倍。实行职工持股后,职工和管理者既是资产经营者,又是企业股东,经理和职工的切身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大调动了工作积极性。1995年8家企业职工持股分得红利105万元,职工得到实惠,纷纷要求扩大持股比例,1996年有两家企业员工提前还清负债持股的股本和利息。

三、改革分配制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建立新的激励分配机制,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在股权构造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了基本工资、效益工资及股份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模式,进一步明确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我们取消了企业行政级别,实行以资产大小、经营效益为分类定级的标准,并以企业经营效益作为分配的主要依

据。具体做法：一是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董事长和经理的工资以年度为单位确定基本工资，并视企业的净资产和利润的增长情况确定其效益工资。1995年度试点企业全部兑现了年薪制。根据企业的效益，经理年薪最高拿到31万元，低的拿到6万多元，其中一家亏损企业的经理只能拿基本工资。二是对企业职工实行分类定级的基本工资和效益工资制。基本工资按照每个职工的岗位、工龄及物价补贴等，经劳动部门核准，确定其平均基数；效益工资按企业实现效益40%来提取；亏损企业不准发放效益工资。从而改变了以往的“铁饭碗”、“大锅饭”、分配不公的现象。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确立了员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如其中唯一的一家亏损企业，职工拿不到效益工资，收入明显下降。为此，该公司上下想方设法扭亏增盈，1996年亏损额比上年减少73%。

四、搞好配套改革，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做到“两个相结合”，即解决企业现实问题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结合，化解改革遇到的主要矛盾，保证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完成。

1、认真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妥善安置富余员工再就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既是企业保持发展后劲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我们针对企业改制后可能会出现富余员工的情况，采取“先挖渠，后放水”的方式，事先为企业富余人员安排好出路，提供再就业机会。根据上级有关法规，结合宝安区实际，制定了《关于试点企业富余员工安置的试行办法》，明确规定企业在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不得随意或借

故裁减员工。同时，为了保证员工的基本生活，在分配上采取保底不封顶的办法，规定职工最低月收入400元。另外，在确保国有资产净值增加的情况下，从企业当年税后利润中拿出5%作为富余员工安置基金，1995年8家企业提取富余人员基金130万元。由于工作周密细致，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没有发生职工失业、上访、闹事等情况，有效减轻了改革的阻力。

2、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各试点企业普遍存在房地产权属、分区财产划分、历年呆坏帐损失等历史遗留问题。面对这些疑难问题，我们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以妥善处理。如在企业房地产权属确认问题上，打破先发证后评估的正常程序，先由规划国土部门根据企业的房地产权资料提出确认意见，评估机构则按照其意见进行评估，加快了改革进程；对补交地价款存在困难的企业，将该款折为国有股，由区投资管理公司代国家持有；对分区时遗留的企业债权债务，作为应收、应付款处理；对历史积累的呆帐坏帐损失，则严格按有关法规作了处理。在试点企业改革中，共为企业解决各类型的资产、财务问题150多宗，卸掉了企业沉重的历史包袱，增强了企业的发展后劲。

一年多来，8家试点企业的改革成效显著，新的运行机制显示了强劲的活力。1996年，8家企业的总资产达83561万元，比1995年增长7.6%；净资产39269万元，比1995年增长7.1%。销售额57455万元，比1995年增长17.3%；利润总额2928万元，比1995年增长8.8%。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作者梁道行，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区委书记(518000)

责任编辑：谭湛明

意大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

□叶祥松

意大利国有企业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40 年代,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到本世纪 40 年代末,意大利国有企业已进入成熟时期,与此相应,其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也逐步完善,并不断调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管理制度。在深化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借鉴意大利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从中可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意大利政府对国家参与制企业的管理方式

按照经营方式和隶属关系不同,意大利国有企业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国有自治公司,如国有铁路公司、国营专卖公司、全国公路自治公司和邮政部门等。这类国有企业一般处于国家自然垄断行业,由相应的政府主管部门进行管理。(2)市政企业,如自来水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电车公司等。这类企业一般处于城市公共设施行业,而且大多属于地方政府所有,由市镇政府管理。(3)国有化企业,如全国电力公司。这类企业的资本完全属于国家,经营方式与一般企业相似,但不是股份公司。由相应的政府主管部门管理。(4)国家参与制企业,即由国家控股公司参股、控股方式管理的、不同国有化程度的企业。它们基本上是按照市场法则组织经营活动。

(一)国家是国家参与制企业最大的股东

国家参与制系统在三大集团(工业复

兴公司、国家碳化氢公司和制造业股份公司)是完全国家所有的控股机构,它们不能直接发行股票。国家通过它们去购买或控制其他企业的股权,以达到控制众多企业的目的。所谓国家参与制,是由股份被国家逐级或交叉控制的企业组成的一个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相结合的庞大的金字塔形的经济体系,而国家是众多国家参与公司的最大股东。在股东众多的情况下,国家参与制企业只要掌握少部分股票就可以达到控制下属企业的目的,这是用少数资本控制大量资本和众多企业的有效途径。

(二)政府对国家参与制企业的具体管理职能

1. 国家参与制企业的管理体制。国家参与系统极其庞大。为了管理好国家参与系统的众多公司与企业,1956 年 12 月国家颁布 1589 号法律,决定在政府内专门设立国家参与部。国家参与部的职责是通过各大控股公司全面管理国家在各个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所拥有的股权,监督和协调国家参与制企业的活动。

2. 政府对国家参与制企业人事管理方面拥有的权力。国家参与系统的最高层领导人(即国家级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国家参与部部长提名,政府内阁会议通过,最后由共和国总统颁布任命令。国家级控股机构的总理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通过后由政府总理任命。国家级控股机构以及次级控股公司和部门性集团,公司都设有董事会、董事长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政府对国家参与制企业的管理和监督职能,不仅反映在国家参与部以及有

关部长常设委员会对国家参与制企业的领导和管理上,而且从上述三个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也可看得出来。

3. 政府为国家参与制企业确定总体经营目标和发展方针。政府对国家参与制企业经营目标的要求,随阶段不同而变化。除在不同阶段国家根据全国经济计划或部门、地区计划的需要对国家参与制企业提出经营目标和发展方针外,政府对这些企业还有些特殊目标要求:(1)反垄断目标的要求。(2)增加就业岗位目标的要求。(3)对外竞争的目标要求。目前,国家参与制企业的经营目标和发展方针由经济计划部委员会制定全国经济计划时统一考虑。

4. 政府在财政方面对国家参与制企业的管理。按照规定,国家参与制企业每年净盈利的20%为企业正常储备金,盈利的15%作为特别基金,用于本企业的科学技术研究,为开创新工业企业作准备,其余65%的净盈利上缴国库部。在必要时,国库部可以从已缴款额中拨出对国家参与制企业的赠款和补贴,剩余部分作为由国库部掌握的特别金。正常储备金用于弥补国家参与制企业偶尔年份的亏损,在亏损额超过正常储备金的情况下,可以运用特别基金或特别储备金。

国家参与制企业与私人企业一样必须遵守国家的税收制度。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不对国家参与制企业提供免税和减税优待,只有在国家参与制企业向南方地区建设新工业企业时,才像对待私人企业一样给予免税和减税优待。

(三) 国家对国家参与制企业管理方式的调整

1. 落实国家参与制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国家参与制企业属公私混合企业,按照市场法则经营,它们在有些部门虽然占很高的比重,但总的来看,它们活动的部门大多存在着私人资本的强有力竞争。因此,国家对它们在价格、市场和企业具体经营管理上不进行直接干预。总之,它们在市场上与私人企业处于相同的地位,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上,享有自主权。

2. 改变政界对国有企业的旧观念,树立国有企业的新形象,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国有企业(包括国家参与制企业)应以社会——政治目标为主要目标,为此不必担心其亏损,国家理应给予补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有企业的亏损迅速增长。近年来,意大利人改变了对国有企业的旧观念,提出国有企业应当成为“盈利的、具有竞争能力的现代化企业”。

3. 出售某些下属企业或扩大集团下属企业内私人股权,以消除亏损局面,并优化国家参与制企业系统的产业结构。

4. 提倡专家治厂,减少官僚主义,提高生产率。自6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的人事安排受党派权力之争影响很大,因此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生产效率低下。针对这一情况,意大利撤换了一批没有能力和干劲仅靠政治关系任命的企业管理人员,换上一批有管理经验、年富力强的企业家。还打破了国有企业只能多创造就业机会、不解雇职工的老传统。

5. 积极开展与国内外有竞争能力的私营大型企业的合作,发展高精尖技术,以增强本公司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借鉴与启示

(一) 关于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又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的作用来实现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主要作用有:第一,为社会主义经济导航。第二,贯彻国家经济政策,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第三,参与国家宏观调控,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二) 关于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分类和组织形式

1. 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着数量过多(200多万)、比重过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8%)、经营范围过宽(几乎囊括了国民经济的所有部

门)、产权过于单一(主要采取国有国营形式)、国家无法管、无能管、也管不好等问题。如政府要对国有企业实施有效管理,就必须缩小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不宜国有企业经营或国有企业经营不好的领域统统让给其他公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去经营。据此,参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我认为,适宜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的领域大致包括以下五个大的部类:(1)基础设施。如主要公路、桥梁、码头、水坝、水利设施等。这些设施几乎全由国家筹资、建筑、经营和管理。(2)从事特殊产品生产的特殊行业。如有关国家安全,国防尖端技术的军事工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产业,如钢铁、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部门,主要由国有国营。(3)公用事业。如交通、运输、电力、供水、灌溉等,多数情况下由政府经营管理。(4)社会福利和非盈利目的的事业单位。如低租金住房、医疗卫生等,大部分由政府主办。(5)金融保险业。如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等,主要由政府承办。

2. 国有企业的分类。借鉴意大利对国有企业的分类方法,我国国有企业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中央政府直营企业。(2)地方政府直营企业。(3)国家所有,企业经营。(4)国家控股企业。

3. 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我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应采用国家业主制和公司制两种形式。国家业主制企业是指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国有企业。其特征是:第一,它只有一个股东,即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第二,国家业主制企业是国家委托有关机构或部门投资设立的,这些受委托的机构或部门行使股东的权利和义务。第三,国家业主制对国家承担有限责任。第四,它仅适用于国务院确定的生产特殊产品的特殊行业。公司制国有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数量多,分布广,对整个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任务繁重,困难重重。因此,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

主要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其原因在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具有手续简便易行、便于管理协调、省时高效、改造成本较低等优越性,且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制企业绝大多数都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与此相反,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手续繁杂,规定了复杂而严格的法律程序,不易管理协调,时间长、效率低,改造成本大,因此,国有企业应少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

(三)国有企业的分类管理

首先从宏观管理层次上看: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实行国有国营,采取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办法,控制程度较高,管理比较严格,企业按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和经营,企业的自主权仅限于企业内部生产计划安排、劳动用工制度、财务分配制度(受到国家制约)、组织人事制度等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对企业进行生产组织和管理。政府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实施宏观管理的要点是:(1)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制定出企业的发展计划,内容包括发展战略、投资计划、财务计划,并承担政府规定的有关义务。同时,政府也为实现企业计划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2)在投资方面,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每年确定一个投资额度,控制企业的投资规模。(3)在价格方面,政府参照国际市场价格对垄断性企业的价格进行干预,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随意提高价格。(4)在财务分配方面。第一,企业按照政府下达的工资总额增长幅度,对企业的工资分配实行严格控制,对因经营不善而造成亏损的企业,工资不能达到预定增长幅度,对因经营好而盈利的企业,可突破预定增长幅度适当增加工资。第二,企业依法上缴税后利后剩余部分应一分为二,大部分应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小部分用于职工的福利和奖金,对福利和奖金要进行严格控制。(5)对企业因服从中央和地方政府总体目标而引起的政策性亏损部分,由相应的各级政府按规定数额进行补贴,超亏部分,企业要用自有资金弥补,或

向银行借款。对目前我国亏损的国有企业要进行全面清理,视不同情况限期扭亏为盈,如不能按期扭亏为盈,政府应罢免企业领导人。采取上述措施,强化国有企业的财务约束,逐步使国有企业自负盈亏。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管理,总的来说,是以市场为基础,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为手段,采取间接管理的方法,企业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鉴于我国竞争性国有企业涉及的国民经济领域十分广泛,不同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宏观管理上也应有一定差别。对于那些生产经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钢铁、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的企业除了按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生产经营外,国家不能完全放弃计划管理。计划管理主要采取计划合同的形式,其主要内容是确定企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包括对企业生产经营目标,规定企业上缴税利、扩大再生产、就业、技术开发和技改投入资金、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价格变动等作出规定,让企业在国家规定的一系列计划指标的约束下选择最优经营方案。同时,合同还应规定国家为企业达到经营目标,在财政投资、政策性补贴和为企业创造外部环境方面承担义务。对于分布在加工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部门大量的竞争性国有企业,政府不直接控制,而是由企业完全按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和经营,企业拥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政府的作用仅限于依法对企业实施监督,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

其次从微观者管理层次上看,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微观管理,要按现

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设置董事会来实施对国有企业的微观管理,当然我国国有企业并不都适合搞公司制,这就要考虑到国有企业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对于同一类型的国有企业,由于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董事会构成人员也应有差别。据此,对国有企业微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作如下设想:对于垄断性国有企业不适合搞公司制,这类国有企业采取国家业主制,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经营管理者由各级政府首脑任命,企业经营管理者向政府首脑负责。全国人大、地方人大有关机构依法对此类国有企业实施监管。

对于竞争性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成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政府通过设置董事会来实施对国有企业的微观管理,关系到国计民生主要产业部门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会由政府指派董事、股东选举董事和企业职工代表组成董事会,由政府指派董事担任董事长;中型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则由政府指派董事、企业家和银行家、股东选举的董事和职工代表组成董事会,由企业界人士担任董事长。这类企业由相应的各级人大、政府、企业的党组织、职代会派员组成监事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管。至于小型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将逐渐被其他经济形式所取代,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其微观管理的问题,但政府要加强对小型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作者叶祥松,广东商学院社会科学理论部副教授(510320)

责任编辑:谭湛明

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

——从南海市看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吴赤锋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活动。”从南海市的实践来看，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时期，大力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顺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使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走进千家万户，真正成为广大群众自己的事业

精神文明建设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主体。要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常盛不衰，必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热情，以群众的需要为出发点，以群众的广泛参与为基础，以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为目的，不断开创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不等于文明。这是南海市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共识。南海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是广东省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少农民逐步富裕起来了，但也出现了一些亟须解决的新问题。主要是部分农民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素质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一些地方脏乱差严重，治安秩序混乱，社会风气不好，封建迷信蔓延。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人们过怕

了那种缺吃少穿的穷日子，但也不愿过那种虽然相对富裕却不文明的日子。南海人深刻地认识到，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基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牢牢把握，毫不动摇。但是精神文明搞不好，物质文明也要受破坏，社会也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既要富裕又要文明。作为党的各级基层组织，既要带领群众同贫穷作斗争，发展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又要引导群众同愚昧落后作斗争，提高人的素质，走向现代文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从1990年开始，南海在全市广泛、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并探索出一条“以城镇为龙头，以村户为基础，以道路为纽带，城乡一体，共建文明，同求安宁，共促繁荣”的创建路子。

为了使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真正成为广大群众自己的事业，成为牵动千家万户、覆盖全社会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活动，南海市在创建文明村、户活动中，十分注意从实际出发，把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从群众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创建文明。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的基础上，订出了评选文明村“七化”、“八风”的标准和文明户的十条标准。这些标准，既体现了党的农村政策的基本精神，又切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既定性，又定量；而且条文具体，简明扼要，可操作性强。实践证明，这样做对群众有吸引力，有号召力，深受群众拥护和欢迎。

人的个性心理品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方式，总是要受社会存在的影响和制

约的。只要形成人人讲文明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舆论,引发大多数群众的上进心理和从众心理,就能够最广泛地吸引广大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南海市委高度重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把思想工作摆在首位,干部搭台,群众唱戏,利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和思想阵地,创造有利于开展创建活动的社会舆论环境,形成文明光荣的社会风气。在评选文明村、户时,寓教于评,以评促创。整个评选过程做到评比标准、评比方法、预选名单和评比结果四公开,使整个过程成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激励、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互相监督的过程,形成了干部与群众、社会与家庭、大人与小孩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局面。评选文明村、户,着眼于建设,着眼于大多数,改变了过去评选先进只落到少数人和少数单位的做法,评选不限比例,凡是符合标准的都评。于是,文明成为时尚,成为大家追求的目标;不文明的行为被孤立,受到众人的唾弃。在这种促使人上进和从众的无形的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形成了一种文明光荣、不文明可耻的正气效应,激励着村村户户向现代文明目标迈进。评上了文明村、户的,为保持荣誉,再接再厉,不断进取,更上一层楼;没有被评上的,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激励他们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改正缺点,创造条件,达到目标。事实证明,广大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以多促少的办法有利于调动大多数群众参与创建活动,有利于发挥群体的优势,促进少数人的转化,形成先进促后进的良好风尚,收到整体效应。

为了使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常抓不懈,常抓常新,南海市还对文明村、户的创建和管理引进激励机制,实行动态管理。评上的不搞“终身制”,坚持每季度检查,半年复评,年终总评。达到标准就上,违反标准就下,改进了还可以再上。这就使干部群众始终感到有一种压力,一种推动力,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还把创建文明村、户同实行一定的物质奖励

和享有某些集体福利与优惠待遇结合起来,同干部岗位目标责任制结合起来。这种激励机制和动态管理,使群众性创建活动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二、以改造农村环境、树立文明新风为重点,建设现代文明新农村

人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反过来又影响改变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与传统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封闭、愚昧、落后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是影响、阻碍广大农民进入现代文明生活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广大农村努力建立一种适应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整洁、优美、和谐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树立健康文明、勤劳守法、好学上进、清正廉明的社会风气,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南海市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以改造农村环境,树立文明新风为重点,使农村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逐步走向现代文明。

马克思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精神文明的一般特征是先进还是落后,健康还是颓废,科学还是愚昧,文明还是野蛮。但是,精神文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物质文明发展了,不等于精神文明自然而然就会上去。80年代末,南海市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生活也富裕了,但是,不少村镇环境的建设却极为落后。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只见新屋,不见新村;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而精神生活却相对比较贫乏;部分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法制观念和集体观念有所下降,封建迷信和某些陈规陋习在一些群众中仍有很深厚的影响,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等等。这些现代文明的对立物,同不断发展的经济建设、同日益改善的人民物质生活极不协调。这使南海各级党组织深深体会到,脏乱差的村镇环境,落后的农民意识,是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严重障碍。不改善农村

的环境,不改变农民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不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要建设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只能是一句空话。于是,他们以改造农村环境、树立文明新风为重点,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改造农村环境从整治村容村貌开始。他们按照村头标志化、道路沟渠硬底化、吃水自来水化、厕所卫生化、禽畜专栏化、保洁经常化、村前村后绿化美化的要求,大搞环境建设。截至1995年底,全市在整治村容村貌方面累计投入资金6.97亿元,其中修筑村中水泥道路1131公里,铺设村中水泥街巷992公里,建桥467座,建无害化公厕1176座,建造村中大小公园126个,还有一大批花基、花圃等绿化、美化设施,使村容村貌大为改观。不仅大大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对经济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前些年一位新加坡客商想到里水镇里水管理区投资设厂,看到满村牛屎垃圾,厕所无立足之地,皱眉掩鼻而走。这件事使当地的干部群众深深认识到,农村的环境建设,不仅关系到群众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而且直接关系到投资环境的好坏,关系到经济建设的发展。他们发动群众大搞环境建设,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不仅那位新加坡客商高兴地回来设厂,还吸引了一批外商前来投资。为了不断提高村镇建设的水平,近年来,南海又提出努力创建一批适应农村现代化要求的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文明村镇,并很快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如南庄镇上元村,在新村建设中引入城市管理机制,新村统一规划,高标准建设,新村内道路畅通,环境优美,还建有田径场、足球场、网球场、游泳池、公园、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很快形成了一个拥有200多户村民的花园式新村。又如里水镇沙涌管理区,针对农民建房热情高涨和土地资源有限的矛盾,在全市率先进行农民公寓建设。目前,由集体统一规划建设的农民公寓——锦绣花园第一期工程的9栋120套住房已经竣工。楼群设计新颖别致,住房宽

敞明亮,公寓区内还将配套建设公园、运动场、停车场等各种设施。农民公寓的建设,既强化了新村的规划和管理,美化了村容村貌,改善了农民的居住条件;又节省了日益珍贵的土地资源。南海市正在推广他们的做法,要求有条件的村镇都要向他们学习,建设一批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城乡一体为特征的现代文明新村镇。

在改造农村环境的同时,他们大力移风易俗,坚持以爱国爱乡、遵纪守法、兴文重教、敬老爱幼、邻里和睦、计划生育、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为主要内容,制定乡规民约,破除陈规陋习,反对封建迷信,倡导文明新风,收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农民群众增强了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观念。增强了遵纪守法观念,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家庭和睦、邻里团结、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蔚然成风;讲文明、重礼貌、讲卫生、爱清洁、保护环境,逐步成为农民群众的行为准则;平等竞争、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敢于创新等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念逐步得到确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人们摒弃了那种只重物质生活而忽视精神生活的观念,只重享受而忽视发展的观念,只重金钱而忽视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的观念,以及封建迷信的观念等,提高了群众辨别真善美的能力。创文明活动还促进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积极发扬先锋模范作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少数一度涣散的基层党支部也重新凝聚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三、以提高农民素质为目标,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农村要现代化,关键是人要现代化,是农民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提高农民素质,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对于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的全面

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农民素质的提高,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宝贵、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南海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南海人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而实现的。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群众奔小康的致富热情高涨,为了振兴农村经济,南海制定了“五个轮子”一起转,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但是很快就面临着农民素质低下、各类人才匮乏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当时的主要方针是“筑巢引凤”,借助“外脑”,引进人才。可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单纯依靠引进人才已严重不敷需要,农民整体素质低下和农村现代化的矛盾日益尖锐。这就使南海人痛切感受到,不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就不可能有农村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不少农村出现的文明风气不好、道德行为失范、陈规陋习严重、封建迷信回潮、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等社会现象,从根本上说,也是由于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所导致的。

为了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南海市在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坚持不懈地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党员,教育干部和群众,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把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凝聚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上来。农村的思想教育,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通过举办骨干培训班、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和利用各种宣传舆论阵地,向农村干部群众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普及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大力弘扬新时期创业精神,教育农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为了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南海市立足长远发展,大办全民教育。早在

1988年,南海农村就已经实现了“普九”教育。进入90年代以后,南海人借助雄厚的经济实力,办教育更是气魄宏大,投资千万元办小学、投资几千万元办中学的村镇,比比皆是。仅从1991年到现在,南海市用于教育的投资就达16亿多元,新建和扩建中小学220所,新建改建校舍面积110万平方米。目前,全市已形成了布局、规模、结构比较合理,幼儿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多层次协调发展的教育格局。与此同时,他们大力普及科技知识,不断壮大科技队伍,推动科技事业迅速发展。高科技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批在国内颇具影响的高科技产业逐步形成。目前南海共拥有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4个,国家级星火项目4个,省级火炬项目和星火项目38个,开发出国家和省级科技新产品148个。文化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市有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镇村有文化活动中心、影剧院,广播、电视覆盖全市,全市19个镇(区)实现了有线电视联网。这一切,为宣传、教育群众,提高农民素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1995年,南海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75亿元,比1994年增长24.9%;工农业总产值354.2亿元,比1994年增长39.08%;财政总收入19.98亿元,比1994年增长29.3%;农民人均纯收入4702元,城镇职工人均货币收入9781元,分别比1994年增长21.65%和13.64%。现在,南海人民正在以全面提高人的现代文明素质,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达到经济繁荣、社会安定、风尚良好、科教领先、文体发达、环境优美、城乡一体为目标,而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可以预期:南海的明天会更美好。

作者吴赤锋,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510080)

责任编辑:冯生

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之我见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全党全社会都要十分关心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

想，培养优良品德”。为此必须要分别不同年龄阶段，根据大、中、小学的不同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

1、对小学生要进行“五心”（即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关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教育，《新三字经》、《社会公德四字歌》教育，引导学生做“好孩子”，当“好学生”，从小就培养他们养成文明礼貌、尊师敬长的良好习惯，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爱护公物、助人为乐、遵守纪律，使少年儿童从小就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2、中学生时代是长身体长知识时期，这时期他们的思想发展的可塑性很大。要加强正面引导，除了对他们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外，还要加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引导青年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远大理想，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3、对大学生除了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和上述“三个主义”、“三观”教育外，还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理论成熟是政治成熟的基础，对大学生要求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帮助他们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念，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要组织青年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锻炼，使他们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懂得国情。这对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很有帮助。如茂名教育学院，除了组织毕业生到各县区进行一个月的教学实习外，还积极动员在校学生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实践调查。很多学生通过深入生活，到农村、厂矿，与工人农民谈心，了解社会发展情况，写出了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和国情的调查报告。通过这些活动，加深了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深入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意义，从而使他们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5、开展形式多样、健康、活泼的校园文化教育,寓教于乐。学校是培养青年的重要场所,要创造良好环境让青年健康成长。近年来,茂名教育学院开展“文明宿舍”、“文明课室”、“文明校园”建设及“安全文明小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对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很有帮助,使学生改变了过去懒、松、散的生活作风,培养了有纪律的良好习惯。同时,学院还组织学生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活跃校园文化氛围。学院里有“北极光”文学社、书画沙龙、业余团校、业余党校、马列主义研读社等团体,定期开展上党课、团课、书画竞赛、征文比赛、文娱晚会、体育比赛等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通过这些健康活泼的活动,陶冶学生的情操,形成积极向上的风气,抵制了腐朽、庸俗文化的侵蚀。

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法制教育等方面。要加强党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的领导,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及有关各部门的作用,共同参与,形成全党重视、全社会关心的格局和机制,使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更有成效。

加强党的领导,主要是党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要有全盘的规划,有具体的步骤。党要协调各有关部门,形成全社会对青少年教育的合力,反对“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要发挥自己的职能,把对青少年的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具体来说要抓好以下四方面教育:

1、抓好学校教育,培养“四有”新人。

学校是教育青少年的重要阵地。《决议》指出:“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德育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教育和引导青少年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其次,学校要深化教育体

制改革。目前我们的学校是以应试教育为主,衡量一间学校办得好坏,以升学率为唯一标准。这种教育容易导致重智、轻其他各育的倾向,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利不利的。学校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输送合格的“四有”人才。

2、抓好社会教育,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

青少年生活在社会中,社会风气好坏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影响很大。目前学校出现的问题,很多是社会生活在学校中的反映,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密不可分。

抓好社会教育就是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目前我国的社会风气还存在不少问题,如黄赌毒、假冒伪劣严重,封建迷信和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有的道德领域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潜滋暗长等等。这些消极东西使部分青少年对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或动摇。因此,我们一定要积极开展“五心”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等活动,提倡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公益事业、扶贫帮困,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提倡树正气,压邪气,扬善抑恶,学英雄、见行动,使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

3、注重家庭教育,从娃娃抓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人的成长,从小到大都离不开家庭的教育。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忽视启蒙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家长及家庭环境对小孩的成长影响很大。家长能严于律己、扬善抑恶,身教言传,小孩就会健康地成长;家长如果损人利己,思想道德败坏,对子女就会产生不良影响。现在不少家庭对小孩智力投资大,但如何培养小孩良好的思想品德却很少过问,特别是一些“独生子女”,父母往往对其

关于卢卡奇的自然——历史观问题

□翁寒松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问题研究中,如何评价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的论者在充分肯定该书对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面目的贡献的同时,又说该书存在着一个“致命缺陷”,即所谓“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对立”。这样就提出了一个理论任务:对于卢卡奇研究中的这种高度评价却又“一分为二”的矛盾,需要通过再次剖析《历史和阶级意识》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来解决。

强调《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存在着“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对立”的论者,其重要理论依据,就是援引卢卡奇晚年对该书的自我评说,其中主要援引的就是卢卡奇在该书1967年英文版序言中的一小段话。这段话的诚实译法(不是跳跃的、随意

删略的、只取所需的)应当是:

“这个存在于两种对立的、并非总能轻易标榜谁胜谁败的智识倾向中的未解决的冲突,使得至今谁都难以对此书作出首尾一致的评价。但是,我们至少应当尝试将它的主旨提炼出来。这本书的最明显失败在于,与作者的主观意愿相反,客观上它又落入了以各种形式存在的‘马哲史’的俗套。所有这些俗套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无论它们是否喜欢如此,或无论它们的哲学根基或政治效果如何,它们都打击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真正基础。针对这种潮流,我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种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因而忽视或否认了它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的学说”。(《历史和阶级意识》1967年英文版第XVI页)

至少由于以往翻译的不严谨,导致了

过分溺爱,姑息迁就,对其错误行为也加以庇护,这些在“暖房”中成长起来的“小皇帝”、“小太阳”,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娇、懒、自私、怯懦等弱点。如果对他们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对他们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要加强对娃娃的教育,必须从家长及成人的规范行为做起,正人先正己。

4、加强法制教育,增强法制意识。

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除了靠教育手段外,还必须加强法制教育。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了人民的意志,良好的社会风尚,要靠人们自觉执行,但也离不开法制的管理。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使他们懂法、守法、自觉依法办事,这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安定团结的重要保证。同时,对一些违法分子要进行斗争,特别是

对一些毒害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要加大打击力度,以挽救失足青少年,这也是加强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方面。

总之,加强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又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法制教育,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都很重要。这四方面的教育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开来,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只要全党全社会形成对青少年教育的共识,共同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作者陈政绍,茂名教育学院教授(525000)

责任编辑:冯生

许多人的理解错误；主张《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存在着“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对立”的论者，就把卢卡奇所讲的“那些‘马哲史’俗套打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套换成了《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因“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的学说”而打击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这种由翻译不当而很容易导致的错误，需要在具体分析卢卡奇本人这段自我解剖之前先行排除。

根据卢卡奇这个自我解剖，主张《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存在着“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对立”的论者就大发议论说：必须看到卢卡奇所理解的历史概念与马克思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卢卡奇只看到了“自然的历史”一面，而忽视了“历史的自然”这另一面；他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确定为历史的时候，没有认识到唯物史观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他在批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用历史淹没了自然，而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深刻变革是同其历史观上的革命紧密相联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撇开翻译的错误及其影响不谈，这种似乎有卢卡奇自己的“金口玉言”为根据的评价是否就雄居于“最实事求是”的地位？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卢卡奇的自我解剖？我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理解卢卡奇对自然与历史的关系的解决及其后来对这种解决的评价。

首先，我们不能无条件地认为卢卡奇晚年的思想就是他的成熟思想，不能搞“老卢卡奇”对“小卢卡奇”的“两个凡是”。在卢卡奇晚年思想中存在着给人以倒退印象的因素（当然是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倒退），未加阐释地重新承认“自然辩证法”就是一例。因此，没有理由拿这样的因素来否定《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正确因素。

其次，从卢卡奇“倒退”的性质和程度来看，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地，相反毋宁说是在实践唯物

主义基地上为推进和完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所做工作的进一步探索。就拿他对“自然辩证法”的重新承认来说，通过对其思想总体的分析可以看到，他并不是简单地承认旧哲学教科书所理解和宣传的那种“自然辩证法”的存在，而是从实践本体的高度考虑如何确保自然——社会——人“三位一体”横向互导的历史普遍性，思考的中心仍是如何保障不在本体论方面犯错误，即保障实践本体的自然——社会——人“三位一体”的本质。也就是说，卢卡奇是在思考如何更完善地阐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如何避免从另一个极端重蹈旧哲学的因片面沉溺于自然而破坏了“实体即主体”这一结构、从而陷入思辩的经院哲学的覆辙。而在这种将自然纳入自然实践本体、作为普遍存在的一个有机部分的情况下，所承认的“自然”是“社会的自然”，因而所承认的“自然辩证法”当然也就不会是那种脱离人的活动而“优先存在”的、纯粹自然本身所“具有”的神秘主义“辩证法”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以实践唯物主义为精神背景来理解卢卡奇，这样就不至于那么轻率地以“老卢卡奇”来否定“小卢卡奇”了。

根据以上分析，自然就要否定简单地从卢卡奇的自我解剖中得出《历史和阶级意识》存在着“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对立”的结论。但问题还在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本身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方面究竟做得如何呢？它在解决自然和历史的关系方面的功过究竟如何呢？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我认为，从《历史和阶级意识》本身的立意和内容来看，并不存在有的论者所强调的那种“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对立”。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自己也特别指出，该书是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第二国际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自然主义化，……同第二国际的世界观反其道而行之就构成了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基本特点。……以历史来抵御自然主义，扩大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功

能”。这无疑就是承认,该书在当时的重要历史使命,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主义化、实物本体论化,因而它不可避免地要侧重于历史。

而且,《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历史概念,在内容上并未与马克思的自然——历史观相抵触。因为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特色,就是强调自然的属人性,就是强调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中,社会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的关系的复合体。如果不是有了属人意义上的自然,也就没有人类社会。但以自然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最终是要充当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因为社会要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设定和建立“为我的自然”。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人——社会——自然这一系统中相对于主体就存在着两个相关变量,而自然在这一系统中同样是“有生命的”;正像社会的人类学属性是个体人类性的结构性存在、否则人类社会就无异于动物集群一样,作为要素和结构存在的、本身无生命意识和伦理精神可言的自然,却由于在客体主体化以后折射或映现了个体的人类本质,并经过社会中介的作用反馈性调整主体本身而“活化”了。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不单单是“物”,而且也是结构化了的人的关系,是以社会为中介的人的关系的复合体。马克思就曾清楚地指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

来才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正因为马克思具有这样的思想特色,因而才有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即实践本论对自然本体论、实物本体论的超越。而由此就可看到,如果是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自然“同格”观立场,为着纠正执自然之一端的偏向而着重谈论哲学本体的社会历史内涵,以及后来为避免这种侧重又有执历史之一端的危险而补充强调一些问题,那就都是在努力维护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历史“同格”观,决不是在制造“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对立”。而这就是卢卡奇的包括《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在内的一生理论探索的真实图景。

评价《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正确标准,只能是看它究竟有没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权威。而评价卢卡奇后来对该书的自我解剖的正确标准,则要看他的这样那样的说法究竟有没有动摇这个业已恢复了的权威。依据这样的标准、注重从精神实质方面看问题,我们就不难看出:该书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面目方面的不朽功勋,恰恰是建筑在解决“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对立”的努力之中的。我们不应以中国学术界不习惯说“我错了”、一旦这样说就将被认为是错得无以复加的习气,来看待世界级伟大学者为了精益求精而作的自我解剖,而是应当从这种自我解剖精神中学习对探索真理的严谨态度,包括在翻译、引用材料方面的严谨态度。

作者翁寒松,中国邮电部高级工程师
(100077)

责任编辑:冯 生

现代的召唤：

走出伦理中心主义困境

□任剑涛

一

伦理中心主义，是中国古代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以伦理关系的处置为社会生活的中轴，并以达成某一伦理目标为社会生活与个人追求的最后目的，从而贯通了思想—制度—行为各个层面的心理—行为体系。它的特点是：第一，道德理想主义构成社会思考的起点与归宿。人们从一种良善的道德愿望出发，构想出一套以道德启发为动力的社会运转结构，最终又达成一个妥善安排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感人道德目标。一切都因道德的纯洁性、崇高性、神圣性而表现出思考的理想性。第二，将社会运动的一切要素都直接化约为道德因素，政治是围绕伦理道德目标运转的伦理政治，经济是为达到老安少怀的平均主义目标而展开的伦常性活动，教育是为了培养富忠行孝悌观念的伦理人，文化也围绕是否认同文明道德规范而界分出与野蛮的界限。至于人们的思考，也沉浸于伦理化的氛围之中，哲学烙上了鲜明的伦理印记，本体追问与知识深究非旨趣所在；史学变成以道德规范臧否人物的“通鉴”学问，史事记载与历史通观反居其次；文学更是以教化为主要创作目的，人物塑造与创作技巧反不构成关心中心。于此，社会的运作变成为伦理道德一元化复制的状态，而见不到本应独立发生作用的其他社会要素与道德健康互动的健全社会运动的景象。第三，伦理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造成观察社会、评价人生、构想未来的伦理化定势，人们的期望、赞许总是偏向于合于理想的道德既有规范一边的，人们的贬斥、批评则又老是偏向于超逾伦理戒条富有新意蕴的一端。只要是以维护伦理既有状态，为了

单纯地提升道德情操，且完全不考虑社会其他要素对之支持作用的决策及决策的执行活动，也就成为人们普遍期评的行为模式。由此，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纯粹以理想性的伦理规范来维系的静态，而缺乏成为社会要素健康互动的动态社会的基本条件。

当然，在古典社会的范畴内来讲，伦理中心主义的效用还是明显可见的，这不单从中国古典社会以伦理中心主义作为运转中轴，而长期保持了自身不变的稳定功能上可以看出；更可以从当代人们对伦理中心主义营造出的以亲情、人情、乡情为标志的温情的古典中国社会的礼赞上看出。我们确实应不抱偏见地承认，伦理中心主义曾对中国社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一，它推动了中国人进入崇高而圣洁的道德境界，从而在相当高的层次上揭示了道德理念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建构起了极富中国特色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伦理观念体系；其二，它推动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注重道德思虑，从而认真地对待人生，积极地介入生活，认真地履行责任等等德性的形成与弘扬，从而极大地保存了人性的尊严；其三，它推动了中国人自觉地拒斥恶的观念，主动地以善的德性去构想一套社会生活的规则体系，从而，使人们不致于拘执于制度化生活中的丑恶，因之减少人生的失意、精神的分裂、社会的对立、生命的自戕，创造出特具维系人心、凝聚民族的生活模式与制度体系。就此而言，全盘地否定伦理中心主义，在理论上至少是不合理的，在历史上至少是不公正的。

二

然而，历史的运动并非线性的。中国

社会在伦理中心主义的轨道上滑行了三千余年之后,碰上了一个完全异质的社会文化的挑战。西方社会在完成了自身的经济跃升、民主转型、法治构造的任务后,形成了一个以实力向外扩张的社会运转体系:市场经济带来了巨大财富,当其要充分实现生产利润、从而要寻找最广泛的市场的时候,狭小并且迅速被挤占的国内市场必然被“撑破”,而亟需一个国际市场来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活动空间;民主政治则以消除传统社会的等级制为前提,最广泛地给予了民众社会参与的机会,最富主人感地制约权力机构官员的权利,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社会介入的积极性,这对那些长期以单一的忠诚来约束自己行为的民众来说,不知会有多么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而法治社会的构造,则带给人类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感,过去那种无序、混乱、随意宰制的现象渐被克服,一种因法治而使人觉得安全自有保障的愉悦感油然而生,这种生活状态对那些权力设有外在制度系统保护的人们来说,吸引力也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社会形成的经济跃升—民主转型—法治构造相贯通的社会结构,由经济普遍发展发展出了一套以交易伦理为中心的新型道德体系、以民主政治的广泛推行蕴生一套以追求正义为核心的新型公德观念、以法治构造的现实实施产生出以平等、职责与义务相联系的新型德性意识。这样,既导致出一个完全不同于自身历史、又异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同时,也引生出了一套完全不同于中国社会的现代道德系统。

当然,中西社会与道德文化相遇的早期历史的悲剧性,很容易使人们的视线集中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上去,还不容易看到西人东来、西方文化东渐的历史意蕴。只有当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取得了民族独立,实现了革命目标、完成了社会制度转型任务,而出现了和平的建设时期,出现了客观地评价中西文化冲撞的意义,出现了追求现代化而非西方化的健全理智,我们才会幡然省觉:我

们遭遇了伦理中心主义的困境,除了走出这一困境外,别无它路可以实现现代化,别无它路可以完成建构现代道德理性的任务。

伦理中心主义的困境,从三个方面体现了出来:首先,由于伦理中心主义将社会一切要素化约为伦理道德,从而遮蔽了人们观察社会各要素独立而又相互影响的互动情形,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唯伦理或泛伦理化思维,对经济发展、现实物质生活条件及其改善进程完全无视,这既使我们看不到道德的现实物质支撑条件,也使我们看不到发展经济构成道德进步、社会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从而,妨碍了物质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其次,由于伦理中心主义将道德视为制度化社会生活的调节中轴,故尔,会使人们相对忽略人心以外的外在规范与制度措施的巨大作用,以为只有人人良心发动,社会生活的一切矛盾与冲突也就可以化解,至于带强制性、外在保护性的社会规范也就成了不得不有,但绝对不是不可替代的道德规范的辅助性、依附性条例了,从而,妨碍了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再次,由于伦理中心主义将道德评价视为一切评价的基准,进而造成人们的泛道德乃至唯道德的思维定势,一切社会思考都被纳入道德思虑的格局,造成人们对道德规范谨小慎微地遵从的心理,造成人们小心翼翼地维护已有道德戒条的惶恐心态,对道德以外的其他观念要素则难以合理衡量,这样,合乎社会需要的健全理智的生长也就滞迟或搁置了,从而,妨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可见,走出伦理中心主义困境,是回应现代化的召唤的前提条件之一。而真正能够摆脱困境,则需要:第一,校正现代化座标、找准现代化的参考系。首先意识到以伦理中心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中国社会的非现代化性质;其次确认现代化乃是一种政、经、文、教、科、技、德性健康互动的过程,它不是一种社会要素吞并另一种社会要素的活动及其结果,也不是一种均平地对待各种社会要素的折衷行动,它是经济先导,

其他社会要素相辅互动的历史进程；再次相信，一种合现代化综合指标体系的社会乃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所在。第二，实现现代化，非得突破伦理中心主义的藩篱不可。这种突破，以市场经济发展的交易伦理为前锋，从而建立起一套完全不同于传统伦理蔑视交易规范的伦理观念；同时，以民主政治发展的正义伦理为中轴，走出传统伦理重视私德而忽略公德的格局，而建构出一套合理指导社会生活的公共道德规范；再者，以法治推行发展的平等伦理为核心，克服宗法伦理造成的等级心态，营造出一套以社会平等引导的愉悦生活的道德行为法则。第三，合理地估价传统伦理文化，在走出伦理中心主义的心理—行为困境的基础上，理智地评估伦理中心主义所蕴含的理想性、崇高性、圣洁性所具有的时代价值。从中，析出有助于现代伦理建设，社会现代转型的因素，并以这种辩证的思考，提供给中国回应现代召唤的最充足的动力。

诚然，要走出伦理中心主义的困境，是不那么轻而易举的，一方面传统思维方式的顽强影响力，不是一下子可以清除的；另一方面，走出伦理中心主义本身就意味着道德转型，转型中特有的紊乱会导致道德法度的失措；再一方面，伦理中心主义的突破还要求现实社会的发展为其提供支持，而社会自身的转型，有时不能不以一定的道德代价换取，这更增强了人们难以容忍的道德裂变危机。但是，基于对社会整体发展即社会现代化必要性的认识，基于对道德因素解除了过重承荷反可发挥更大效用的醒觉，基于对道德文化更新意义的确证，我们是可以对走出伦理中心主义困境怀抱信心的。

三

我们之所以对走出伦理中心主义困境抱有信心，具体地说来，是有三重现实根据的：一是人类活动已有经验的支持；二是现当代中国人观念批判与思想转向的支持；三是市场经济推行的当下进程，导致的中国社会积极变化的支持。

从人类活动已有经验的角度来讲，它

得到了人类现代化整体进程的支持。现代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走出人类封闭自己的境界，开辟出一个广泛发展自己的天地的过程。它以工业化和机械化为动力，带动了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则广泛地体现于：开放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增加社会流动、教育的发展、工业谈判的新程序、公民权的扩大、社会服务的发展等等。（参见《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第36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这些发展，从两个方向上推进着人类生活的现代进程：一是推动人们走出虚幻化、理想化、封闭化的传统社会，以率先开始并较早完成这一进程的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来看，正是现代化疾速展开，西方传统中固有的以某一教条或某一神圣原则为社会运转的原则的固有模式被打破了。这在它的经典社会阶段，曾体现为对理想国的追求，而理想国恰好似一个秩序井然、各安本分、各守道德规范的伦理王国；这在它的中古阶段，曾反映为对神圣天国的构造，而神圣天国又好比一个合谐有致、各得其所、各获圣德抚慰的道德世界。这两种社会运转程式，曾支配性地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但是，经过文艺复兴对神圣天国说教的社会学批判，再经过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理性检讨，更经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的荡涤，西方国家成功地走出一条不以道德为主要动力，而以经济带动的社会整体发展的现代新路，并将德性规范由主要是私德或圣德的戒条改换成为以人为中心的、以公正为主导的现代道德体系。这一变化正是西方社会走出传统走进现代的进程；这一变化，正是给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以启示和鼓舞的地方。

从现当代中国人观念批判与思想转向的角度来看，它得到了中国思想史进程的支持。在古典社会阶段，中国形成了“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的伦理中心主义格局，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仁义之心一类的道德规范，制约社会变化实施政治控制的是仁政措施（若遇不仁不义的统治者，被统治者则会“揭竿而起”，从而造成混乱

的恶性循环),而社会运动的目标模式则是博施济众、老安少怀的至德之世,统治社会的人员素质要求当然就必须形成内圣外王之势,德性的全面制约与宰夺,则使社会广泛认同不争利益而求合谐的追求“中庸”的态势。发展当然无从谈起,社会缺乏质上的更新,多只是量上的增减;进步自不必论,道德竟成为约束人的规范,而不是提升人发展水平的杠杆。西学东渐加西力东侵,才使人们觉察了,坚船利炮与夫政经法度,不是中国社会可以随拿随用的,非经一个伦理的最后之觉悟,是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固有德化的封闭状态的。因此,知识界清醒地看到了伦理中心主义的严重局限,如陈独秀,则要求三个层面(观念、制度、生活)的共同现代化;如李大钊,则看到了经济因素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作用;更如早期的康有为,明确指出了“全变则存、小变仍亡”的现实。这一转变,正是中国人思想趋近现代的表现;这一转变,正是中国人正走出伦理中心主义困境的表现。

从当代中国推行市场经济的现实进程的角度而言,它得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大约经历了三个历程,早期构成是以思想批判为核心的,中经以政治现代化的运动带动社会现代化的广泛尝试,当代才真正落实在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层面——经济现代化,也才真正走上了真实地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之路。早期阶段,因为注重的思想文化批判、表达的是对现代化转型的强烈要求,其中复杂的情绪、多变的幻想,都不足为怪。而当其以务虚启发务实——即以思想批判推动现代要求的进程受挫以后,“武器的批判”取代思想的批判,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变成纯对主导性的社会运动时,一种以伦理目标为鹄的的泛政治化思维和泛政治化运动又成为现代化的主流。但是,政治毕竟

不是社会进步的最强推动力,它始终受经济这只强有力的手左右。因此,其间所受挫折,经验教训,亦事属必然。只是到了以市场经济的推行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的阶段,人们才意识到,市场经济乃是人类选择的经济模式中“最不坏的”一种,才是最佳地组织资源并加以合理配置的最有效方式。它不唯能产出相对以往经济形式的最大量的财富,而且还要求并达到广泛的社会变化:市场经济是一种要求高度秩序的经济,它必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与之匹配;市场经济是纳最丰厚的人力资源于其中的经济,它必然要求民众最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介入社会事务,学习掌握并牢牢依托于现代民主;市场经济是从生产、分配到交易、消费完整合一的经济形式,它不仅要求人们有高度的生产创造性,有公正的分配机制,而且,还要求有合乎德性的交易伦理、合乎人的发展消费方式。从而既推动人们提高自我素质、又推动人们努力关注社会状况、对人的教育、文化、科技诸方面的素质构成一个全面提高的过程,进而达成一个最符合道德的现代目标。这也就更现实地要求中国人打破唯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与行为格局,在看清楚现代社会乃是各社会要素健康互动的基础上,明察经济重心论的现代价值,明察德性相辅论的时代效用,明察道德境界提升的自身动力与外部动力的辩证关系。从而,重新厘定个人伦理规范与社会公德规则,以期成为真正的现代人,成为现代化社会的一分子。

走出伦理中心主义困境,业已构成中国人回应现代召唤的时代主旋律。

作者任剑涛,中山大学理论部博士生(510275)

责任编辑:冯 生

欧阳康博士访谈录

□本刊特约记者：冯 平

编者按：

1981年末，我国开始执行博士生导师遴选制度，有了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2年，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入学。转眼间，15年过去了。最初的几批博士研究生，凡是留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的，大都成了那里的学术骨干和新一代的学术带头人，而凡是留在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的，大都自己也成了博士生导师，有了自己的博士研究生。而没有留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的，大多也难解哲学之情结，正以不同的方式演绎着哲学。当我们面临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之时，追寻这几批哲学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足迹，探究他们的哲学理想、哲学观念，了解他们曾经进行过的、目前正在进行的和准备进行的研究，也许会使我们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洞悉我国新时期哲学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并且更切实地把握我国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为此，从本期起，本刊将陆续刊出哲学博士访谈录，敬请读者垂注。

欧阳康，男，1953年出生。1977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1981年师从刘修水教授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1984年12月获哲学硕士学位，留系任教。1985年3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李秀林、夏甄陶教授的指导下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方向博士学位，1988年1月获博士学位。1992年2月破格晋升教授。1993年被批准为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1996年12月就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第一任院长。

欧阳康博士将“建设性地做学问”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原则，在十多年的研究中主要探索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其一，反思和建构哲学研究方法。欧阳康认为，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是哲学改革的突破口，对哲学研究方法的特殊关注，是自觉从事哲学研究的重要起点，也是哲学思考的重要特点。1987年《中国哲学年鉴》学术进展栏目介绍了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其二，研究哲学形态学。1988年他承担了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哲学形态学与哲学观念的变更”，并完成了《哲学形态学》一书。其三，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原则，并提出一个以实践的唯物

主义为理论基石，以现代社会实践为现实基础，以人与世界总体关系为基本对象和基本内容，将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内在统一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初步设想。其四，参加了夏甄陶教授主编的《发生认识论》的写作，提出了建立多项式和多级中间变量的多元复合认识模型的见解。其五，在《哲学研究》等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探析主体性与主体性原则的论文。其六，较系统全面地研究了社会认识论。

可以说，关于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是欧阳康十几年研究中最杰出的成果。1990年他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社会认识论导

论》，这是国内社会认识论研究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该书的出版在国内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学术反响。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发表了书评和书讯。英、美、法、日等国合编的国际性英文学术刊物《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的主编得知该书发表后，特地致函约请欧阳康博士为该刊撰写了题为《中国的社会认识论研究》(The Research of Social Epistemology In China)的长篇英文稿。《社会认识论》1993年第2期连同《社会认识论导论》的目录，和对该书的评论文章发表了这篇文章。对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成为欧阳康博士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他承担了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认识方法论”，并以此为研究方向，指导三名硕士研究生和三名博士研究生撰写了一系列社会认识论研究论文。

注重与国际哲学界的联系与交流，是欧阳康博士的一大特点。他曾两次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多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论文。1992年他撰写的《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研究方法》一文，获加拿大政府所设“1992年加拿大研究与出版奖”，并应邀赴加拿大七个城市访问五周。1995年9月，他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受国家教委的派遣，到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哲学系，在英国著名哲学家TED HONDERICH的指导下，以心灵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为主修方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博士后访问研究。这一年的访学，欧阳康博士收获颇丰。他频频参加英国和国际哲学界的多种学术会议，曾到希腊、意大利等国参观。在罗马他还见到了教皇。1996年11月，在他到珠海参加学术会议期间，笔者就他访英的情况、他准备进行的研究和他对我国哲学未来走向的见解等问题采访了他。

谈到这一年的访学，欧阳康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他在英国的一个“大动作”。他说，他此次访学最有意义的事也许就是设计和主持了“向中国介绍当代英美哲学和

哲学家”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这一项目的提出和设计，是为了在中国哲学家和英美哲学家之间架起一座有效联系的桥梁：一方面使西方学者能够关注中国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中国哲学家了解西方哲学的当代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该课题的设计颇为宏伟，它将邀请当代仍健在的国际一流哲学家和中国哲学界合著《当代英美哲学和英美哲学家》一书。该书分为三部分：一，当代英美哲学概况，包括当代英国哲学、当代美国哲学、大陆哲学在英美、中国哲学在英美等。二，各分支哲学发展动向，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哲学、语言哲学、道德哲学、逻辑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宗教哲学、西方哲学史、数学哲学、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女性哲学等16个分支哲学。该部分均由国际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头者主笔。三，当代英美哲学家的学术自述。这不仅有助于了解他们的治学之道，也有助于日后澄清对他们学术观点的歧见。该课题于1996年2月开始操作。当时有英国著名哲学家说，如果欧阳康的第一批邀请名单上的5位哲学家接受邀请，该课题已属成功了。但目前已有40多位当代非常著名的英美哲学家接受了邀请，其中属于第一批邀请名单上的竟有30多位。不少英美哲学家为有如此众多的著名哲学家参与此课题感到惊叹和振奋。据英国出版界人士说，这本书也许是相当长时间以来，由如此众多的著名哲学家共同写作的第一部书。Quine, Strawson, Dummett, Berlin, Davidson, Dennett, Taylor, Armstrong, Quinton, Williams, Singer, Honderich等。仅英国作家中便有1名勋爵、2名爵士、7名英国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国和澳大利亚作家中不少人是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该书预计在1998年可出版中、英两种版本。欧阳康已在筹备1998年在中国(北京或武汉)召开该书的首发式和“当代英美哲学和哲学家”的国际研讨会。此会将邀请作者、中文译者、中英文版编者、出版者和中国哲学界学者参加，共同研讨21世纪的哲学和

中西哲学交流。如果此项计划实施成功,将对中国哲学界和英美哲学界的相互了解,对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奠定一个重要基础。

在谈及访学体会时,欧阳康说,在他与英国哲学家的接触中,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他们治学严谨,文风朴实,求实多于浮华,这值得目前我国多少有些浮躁的学术界借鉴。另外,他认为,客观地说,英美哲学界对哲学大部分领域的研究是领先于我们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也必须认真地研究英美哲学,吸收英美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同时,我们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品位,加强我们在学术交流中向对方输出信息和学术见解的势能。欧阳康认为,要想使我们的哲学达到与世界哲学对话的水准,我们还要注意加强对当代世界哲学的同步跟踪。我国的哲学应该面向世界哲学,这已是我们的共识。但还应强调真正面向当代世界哲学。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目前对当代世界哲学的了解,实际上存在着20—30年的时间差,要做到与当代世界哲学的同步对话与同步发展,还需要付出相当艰巨的努力。

在谈到我国哲学跨世纪发展战略时,欧阳康说,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我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当今世界哲学研究的趋向。他认为,我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各分支哲学及其研究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分离,彼此漠视的缺陷。各分支哲学的研究者主要在学科内活动而少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对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探讨也仅仅从各自所在的分支哲学出发,并局限于自己所熟悉的学科内部,而缺乏对于哲学发展的整体视野和整体规划。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多年来大家一直关注的体系探索与建构问题,实际这是在脱离当代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背景下展开的,是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与发展,而这难以有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突破与进展。目前世界哲学的发展趋势,

是在深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所谓深度分化,即哲学内部和哲学与非哲学之间以越来越具体的方式联系起来,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新的分支哲学,使当代哲学表现出主体分化和个性强化的发展趋向。所谓高度综合,则是随着当代人类实践的全球化和科学的一体化发展,各种哲学流派之间的交织与互渗日益加强,哲学规范的通约和转换渠道增加,哲学方法的互鉴和互通增多,人类哲学思维在分化的基础上正向着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融合,表明当代哲学研究观念的转变和不同思潮在元哲学层面的融通与提升。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各分支哲学均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展示出时代内涵和生命力。而这各种分支哲学又以不同方式包含着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不同方面,它们之间相互交织,同时与当代科学和当代实践密切结合,形成了具有多方面、多层次、多分支,并且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哲学学科群。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实际,欧阳康认为,强化哲学发展研究的“学科群”意识,高度重视并自觉建设具有一流水准的哲学学科群,应当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在欧阳康看来,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人类文明活的灵魂,其发展既依赖于其对象世界的发展,也依赖于哲学思维主体的自觉创造。哲学的对象世界,既有实践世界,也有科学世界,还有哲学自身世界。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作为哲学发展的对象性前提和基础,既为哲学的发展提出了要求,提供了动力,也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材料。当代实践和科学,在深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实践和大科学,这在客观上要求和促使了当代大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哲学学科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正是对于当代大实践和大科学的一种哲学观照与哲学反思。正是对于当代大实践和大科学中所蕴涵的种种问题的哲学思考,产生出当代大哲学体系中的许

多分支哲学与流派,形成了当代哲学学科群的内在层次结构。

欧阳康说,在我国,建设具有一流水准的哲学学科群,从根本上说,就是按照哲学学科的内部逻辑和内部关系结构,从整体上研究和发展哲学,自觉促进我国哲学研究的深度分化和高度结合。这种研究有必要从以下四个层面展开。

一,元哲学层面。要加强对哲学观、哲学形态学、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注意哲学观念的时代性变迁及在各分支哲学中的具体延伸,注意解决哲学自身发展中的元问题,注意以真正哲学的态度和方式研究哲学及发展哲学。

二,分支哲学间的关系层面。要注意研究与理顺各分支哲学间的关系。按照目前我国国务院颁发的学科目录,哲学的9个二级学科的分类实际上是国别区域标准与学科性质内容混用的,其间难免留下一些空档,这需要我们着力研究和解决,尽快理顺这些分支哲学之间的关系,使其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建构,形成有机系统。

三,分支哲学形态层面。要注意解决分支哲学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著作、体系与问题等的内在关系。只有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综合性的考察与整体性的建构,才能建设起结构合理的分支哲学体系。

四,亚分支哲学层面。要努力在哲学与实践、科学、文化等的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关系中建立和发展各种新兴的亚分支哲学。如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又如社会认识论、科学认识论、道德认识论、文化认识论等;再如社会本体论、社会评价论、社会进步论、社会风俗论、社会心态论、社会理解论、社会理想论、社会决策论、社会认识方法论、社会认识进化论等等。一方面,通过这众多的亚分支哲学系列而与现实的社会实践与科学之间达到更加细致的相互沟通与渗透,使哲学能有更坚实的实践和科学基础。另一

方面,通过这众多的亚分支哲学而使原来处于内部分离状态的哲学分支学科之间更加有机地结为一体,形成网络体系。

欧阳康认为,我国的哲学学科群建设,不应该也不可能是闭关自守的。我们应该以一种高度开放的心态来自觉地注意与世界主干哲学对话,与国际哲学发展趋势保持一致,为此应尤其重视推进哲学研究的世界化和个性化进程。在哲学学科群建设中,我们必须自觉破除哲学研究中的狭隘的自我中心化状态,拓展我们的哲学胸怀,从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和哲学思维个性化展开的角度,来看待当今世界五彩纷呈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学说。崇尚谦虚、宽容、自由,提倡求实、探索、建设,鼓励发现、发展与创造,聚细流,纳百川,注重研究规范的转换与更新,倡导一种真正个性化的创造性研究,不断提高我们在国际学术交往中的特色和势能。

欧阳康认为,我国的哲学学科群建设,应当立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龙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内在地结合起来,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创造。只有这样我国的哲学才能走向世界。

在谈到哲学教育时,欧阳康说,哲学学科群的建设,不仅是哲学研究的发展战略,也应当成为哲学教育的发展战略,成为我国哲学教学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创建74周年之际,武汉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哲学学院。

着力于哲学学科群的建设,着力于分支哲学问题尤其是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着力于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的介绍,将是欧阳康博士目前和本世纪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

作者冯平,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冯 生

试论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挑战

□刘超球

一

自 70 年代以来,战后开始的科学技术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它的影响下,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最突出的就是应用性大大加强,出现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某些学科甚至超过的趋势。所谓社会科学的应用性是,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在社会实践中成为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可操作的具体技术和方法。当今以电子计算机、通讯和网络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普及和应用,信息的地位在人类社会发展不断上升,信息领域已成为热门领域。表现为:一是“信息”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吸引了许多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以信息为对象的多学科、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明显增加;二是信息作为热门领域还反映在职业兴趣上。本世纪中叶从发达国家开始,由于社会信息需求的增长,信息职业在各个方面都成为显要和具有生命力的一种职业,以至不少商业团体都把目光投向信息领域,从不同的专业角度介入信息领域,造成了信息领域的多元化局面。信息技术是对各种形式的信息(文字、声音、图像或数码等)进行收集、加工、存储、转换、传播和利用的技术群。现实生活中,信息吸收利用问题不仅涉及到信息的一面、技术的一面,还涉及到人和社会的一面,与人的认知机制、人的行为和 Information 心理等人文因素和多种社会环境不可分割,需要研究“人——信息——技术——社会”相互作用的各方面,因此,这是跨学科领域的复杂问题,社会科学参与研究更是责无旁贷。本文针对我国信息技术的普及

和发展,向社会科学界提出急需研究的课题进行一些探讨。

二

当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兴起及其在全球范围的普及,使得当今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在产业结构方面,信息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资源结构方面,信息同能源、材料一样,成为人类社会三大资源之一;在就业结构方面,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不断上升,成为劳动力的主体;在企业结构方面,从事信息经营的企业不断涌现;在市场方面,电信市场推动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迅速发展;在生活方式方面,信息网络提高了信息的渗透率和覆盖率,扩大了人类对信息的接受能力,使每个人的智慧和技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代信息技术已成为从根本上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第四社会技术(前三种社会技术是:狩猎技术、农业技术、工业技术),而且它比前三种社会性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更加猛烈,更富有革命性,席卷社会的速度更快,其应用渗透到了各行各业,成为当代科技发展的“推进剂”和经济发展的“倍增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我国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开发起步较迟,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据日本情报学家山下甫称,目前美国、日本、西欧主要国家已进入信息社会的第二阶段,即智慧创造阶段。我们国家的状况如何呢?在国际社会中,仅仅相当于美国 30 年代、日本 50 年代的水平。①如果说山下甫的一家之言难免有失偏颇,但是,不久前美国、欧洲、新加坡

不少大公司纷纷向我国有关部门提出,中国还不建立起国际网络就推迟甚至不与我们做生意了。②这些信号却不能不使我们警醒。我们如果不迅速发展计算机网络、建立信息产业或这方面稍有犹豫、懈怠,就会直接影响对外贸易,影响改革开放,以至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毫无疑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即将或正在来临的新的产业革命,发展计算机通讯技术应该是重点和基础。因此,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发展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可是迎接这场带有根本性的、有广泛影响的新技术的洗礼,是不是使用一下计算机或搞几个网络,就算与信息技术接轨了呢?当然不是。即便是有巨型计算机、全自动生产线等,也不等于就掌握了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内容的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和社会成果。仅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一项,我们就有不少值得总结和记取的教训。就拿我国高校图书馆来说,大部分综合性大学图书馆从8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电脑管理,尽管取得一些实用性成果,但有不少图书馆至今仍举步维艰。表现为:(1)建立以计算机处理为基础的管理信息系统,事先不作系统分析与设计,对应用计算机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什么功能、发展前景如何心中无数;(2)应用一台计算机并没有相应减少人力,反而要增加一至二个人力;(3)应用软件不配套,一套管理系统尚未开发完成、运转便被推倒重来,或不得不引入另一套软件系统;(4)设备订购无计划和论证,一些设备尚未进入实用只是陈列了一阵就遭淘汰;(5)对现有的设备、应用软件和数据利用率不高,应用系统脱离工作实际,软件变化参数太少,计算机管理只限于维持简单功能的运行。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应有功能的发挥,影响原有的服务质量。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除了资金、专业人员的因素外,关键还是缺乏对计算机运行所必备的人文环境的深入了解和高度重视;缺乏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包括对目标、队伍素质、时间、规章

制度等的合理规划和组织。应用计算机管理,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专门人员、设备和软件上,让计算机适应组织机构,而不是设法让整个组织去适应计算机;看不到计算机只是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一个方便有效的手段而已,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及其素质,从而忽视了组织内部信息环境的培育及信息环境各要素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忽视了在信息技术浪潮中寻求管理方法的变革、思想观念的转变、知识的更新和积累。必须知道,“物”的现代化并非现代化的全部含义,甚至不是主要含义,如果在现代化物质手段的氛围中,却仍然生活着“传统人”:传统的观念、传统的行为方式、传统的知识结构,纵使技术再先进,设备再精良,现代化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畸型的人文环境,同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

现代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人的现代化。当代信息技术所引发的革命,不只是体现在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中,不只体现在工厂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和家庭自动化中,还尤其体现在人类的精神文明活动中。如果说近代产业革命时期的技术革命直接作用于人的物质、经济生活,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与文化,信息技术所引起的新技术革命则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以更鲜明的姿态间接作用于物质、经济生活。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这场革命,才能明确它对于人类生活的巨大冲击作用绝不只限于经济信息作业的范围。新技术革命深入到精神文明的活动中,是一个真正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仅从技术的巨大变革和对经济、国防的巨大作用,来理解这场新技术的伟大远远不够,它必将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通讯、能源、教育、文化、人口、人才、科学技术、社会生活和国防建设各个方面,导致生产体系、组织结构以及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发生变革,道德观念、法律制度、价值取向也将受到冲击。如何使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科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

展,提高综合国力,社会系统工程面临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许多新领域有赖社会科学积极参与、深入研究。

计算机、通讯和网络的发展还迫切要求我们对信息资源管理重新认识。吸收与利用信息的能力是当今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种重要标志,经济的竞争实质就是信息的竞争。信息、材料、能源是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正日益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然而,随着新的传播手段和新的信息媒介多元化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信息技术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1. 信息过渡增长,泛滥成灾。据世界科技情报系统(UNISIST)估计,世界信息产量在 1957—1967 年间的增长率为 9.5%,1967—1971 年为 10.6%,1985—1987 年则达到 12.5%。如此庞大的信息源,一方面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信息动力;另一方面,人们身处信息的汪洋大海却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致使社会信息吸收率反而下降,信息利用量与信息生产量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就连信息技术发达的美国和日本,近 30 年来信息吸收率也一直为 10% 左右。③过量的信息流冲击着人类,使人们处于一种信息超载的状态。2. 信息失真和“噪音”,严重干扰、污染信息环境。信息干扰和污染是指,社会信息流中混杂着许多陈旧过时、虚假错误或荒诞离奇、色情迷信的信息,妨害人们对有用信息的吸收利用。出现信息的失真和“噪音”现象除了受文献老化因素的影响外,更多是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竞争日益激烈、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而造成的。为了在竞争中占有优先地位,有些所谓“科学”的信息尚未经过严格的实践检验就公诸于众,更有甚者,有的信息生产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伪造虚假信息来欺骗、迷惑或毒害他人。一些专家认为,实际上无用、有时甚至有害的信息不少于 50%,在个别领域甚至达到 80%。④80 年代出现的电子病毒,使信息污染向技术化方向渗透,成为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3. 知识产权受到侵害。信息技术完全突破了

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拷贝技术的发展,印刷体形式、磁存储形式和电子存储形式的信息都极易被多次复制和扩散,为大规模侵权提供了方便;在联机检索系统中,“套录”也容易产生知识产权纠纷。信息使用者通过终端从远方的数据库中分批拷贝其数据并偷偷存储到自己的计算机中占为己有,使知识生产者和数据库生产者的利益受到威胁和侵害。4. 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从军事领域扩展到信息领域。当代信息技术已成为构成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战略武器。由于掌握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处于有利的支配地位,对信息资源的控制使其他国家增加对它的依赖性,过分的依赖则潜伏着有损国家主权的危险,因此敦促人们重新审视和认识国家安全问题。当今维系国家安全不只是靠先进而强大的军事力量,数据库的占有和核心信息技术的领先和控制,同样成为国家实力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如果失去了对信息资源的支配和控制,就等于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在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中,人们不得不更加关注国家主权和文化主权。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出于发展的需要期望引进技术和信息,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过多的依赖而受制于人,防止某些发达国家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5. 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信息差距问题。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是,把整个世界建成通讯联络快速、高效、便捷的“地球村”。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存在“马太效应”,即技术基础好的国家发展更快,技术基础弱的国家发展更慢。这使得国与国之间信息资源的分布、流通和获取极端不平衡。从全球范围来看,信息差距是非常明显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估计,北美、欧洲、日本和前苏联等国的总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 30%,却拥有全球电话机总量的 90%,收音机总数的 83%,电视机总量的 80%;报纸发行量的 78%,书刊发行量的 83%,邮件总量的 95%,电视发射台的 95%;80% 以上的数据处理设

备集中在美、日、西欧。西方四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每日发稿总量高达 3500 万字,相当于其它国家新闻通讯社提供的信息总量的 1000 倍,从西方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流量,超过从发展中国家流向西方国家的 100 倍。⑤表明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但存在着工业化的差距,而且还存在信息化的差距。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化程度上,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就本国范围内,也严重存在着“信息贫富”悬殊的现象,东部沿海地区信息源占有量和信息处理能力比西部内陆地区有明显的优势。此外,还有电子犯罪问题、信息经济利益分配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单是技术的问题,更主要是经济、社会的问题,且错综复杂,层出不穷,日益尖锐。这些经济的、社会的问题仅靠自然科学技术也是不能解决的,需要有自然科学技术之外的力量协调综合解决,由此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迫切的管理要求。以单项技术为目的的信息管理方法,将被由技术因素和人文因素相结合的综合信息资源管理模式所取代。现代信息管理不仅是对信息本身的管理,而是要对涉及信息活动的各种要素——人、信息、信息技术、组织机构等进行合理的组织和控制,以实现信息及有关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有效地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现代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在我国是一个新的领域,必须找出适合国情的模式和制定相应的对策,揭示社会信息活动各种因素之间内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着重研究信息环境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

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向我国社会科学提出了如下研究课题。

(一)宏观研究课题:

1. 如何改善信息技术与人民大众之间互不了解或相互隔绝的情况,将当代信息技术成就纳入现实文化之中,受到社会的普遍理解和接受。

2.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我国未来经济的

影响。包括经济体制、产业结构、计划形式、金融机制、商业贸易,等等。

3.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我国未来社会的影响。包括社会组织结构与组织形式、社会生活、教育体制、公共政策、法律、社会伦理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变化。

4. 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将产生的观念变革。包括知识观念、价值观念、劳动观念等,以及人的品质、作风、志向等非智力因素的变化。

5. 如何使信息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将信息管理中的技术因素和人文因素结合起来。包括信息技术的综合管理(含危害管理)、新的信息系统和新的系统设计思想、信息政策、信息法律、人们信息行为和信心理分析等。

6. 如何从经济的角度促进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包括信息的合理配置、信息的成本价格的研究、信息市场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生产、流通和利用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问题等。

(二)微观研究课题:

1. 如何完善单体组织机构层面的信息管理。包括组织的信息环境分析、信息构架问题、更有效支持战略决策的信息管理、信息资源与组织机构等。

2. 如何使组织机构信息环境内部诸因素的协调及信息环境整体与社会发展同步。

注释和参考文献目录:

①周清荣《当代图书情报管理与实践》,(北京)兵器出版社,1993年版,12页。

②拍幸《漫话 EDI》,广州日报,1994.9.2.15版。

③岳剑波《从信息资源论到信息环境论》,图书馆学、情报学、资料工作,1992.9。

④同③。

⑤卢泰宏《国家信息政策》,(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98页。

作者刘超球,广东广播电视大学讲师(510091)

责任编辑:童 轩

汉学研究在瑞典

□[瑞典]罗多弼

一

瑞典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至少可追溯到17世纪。1654年瑞典人席欧平随荷兰商人首次到达中国的福建,回国后发表了其撰写的旅行报告,盛赞中国的文明与富庶。17世纪瑞典还出现了两篇以中国研究为课题的博士论文,即《长城简述》和《论中华大帝国》,两文都反映了当时欧洲流行的把中国理想化的倾向。

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亦传到瑞典。自此到19世纪,瑞典出版了许多研究中国的著述。1710年瑞典乌普撒拉东方学家奥拉瓦·赛修斯完成《略论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博士论文。1758年雅各布·洛丁出版了第一部用瑞典语写成的中国历史专著《支那近事闻》。18世纪上叶,瑞典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开始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瑞典的一些学者也随贸易船只来到中国。这些人回国后均撰写并发表有关在中国游历的著作,如佩尔·奥斯贝克于1757年发表

《1750至1752年东印度旅行日记》,书中记录了大量有关中国自然与文化的资料。同年,卡尔·艾克贝发表《中国农业简况》一文,该文对瑞典的重农主义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国文化爱好者卡尔·舍菲尔强调农业应被视为经济的基础,社会应像一个扩大的家庭,君主则是具有绝对权力的家长。他认为这些方面中国是值得欧洲国家效仿的典范。19世纪中叶,瑞典传教士到达香港,其中一名叫哈姆贝的传教士还结识了洪仁玕,并向洪仁玕传授基督教义,洪仁玕则向他讲述了有关太平天国起义的情况。哈姆贝后来据此撰写了《中国叛乱领袖洪秀全和广西暴动起源》一书,这是瑞典汉学研究中较有影响的专著之一。19世纪70年代,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图书馆还收藏了一批中文图书。19世纪末汉斯·拉尔松出版了第一本被译成瑞典文的中国诗——《汉诗瑞译》。从17世纪至19世纪在瑞典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述,主要侧重于介绍中国各方面的知识,因这些知识带给瑞典人以启迪而受到欢迎。

二

到20世纪初瑞典人才开始真正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其首功应推地理学家兼探险家斯文·赫定。他曾组织过三次中亚探险,考察了塔里木盆地和罗布泊,并发现了楼兰古城遗址,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其第三次考察的材料已被定为《1927至1935年斯文·赫定博士主持的中国西北地区科学考察报告》付诸出版,有些材料仍在整理出版之中。他是第一位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瑞典人。1992年秋,由瑞典赫定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织,在中国举办了“赫定学术研讨会”。本世纪初一些传教士还将中国的经典书籍,如《庄子》、《老子》等译为瑞典语传入瑞典。

1907年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开始研究和收藏中国艺术品,并于1914年举办了首次中国艺术品展览,展品显示了

中国自周代至晚清各个时期的艺术风貌。后来这位王太子还担任了瑞典的中国研究委员会主席,对促进瑞典的汉学研究起了重大作用。19世纪上半叶汉学家奥斯瓦·施仁由早年研究瑞典和意大利艺术转向研究中国艺术,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加强了瑞典人对中国艺术的了解。其主要著作有《3000年的中国艺术》、《中国园艺及其对18世纪欧洲的影响》、《中国人论绘画艺术》等。施仁的著作至今在瑞典还颇有影响。这之后,有关中国艺术的著述还有:远东博物馆馆长吉伦斯魏德教授的博士论文《唐代的金银器》、韦俊博士的《宋代的瓷器设计》等。

瑞典人将汉学作为一门专门性学科加以研究,是从高本汉开始的。高氏不仅是本世纪以来瑞典最杰出的汉学家,也是西方世界最优秀的汉学家之一。他以毕生精力研习中国文化,尤致力于汉语音韵训诂探究。他采用20世纪初欧洲流行的历史音韵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汉语。由于当时瑞典的大学尚未开设汉语课,1909年他从乌普撒拉大学俄语专业毕业后,获资到圣·彼得堡学习汉语。次年又获资到中国进行方言研究。1912年回到欧洲,并在巴黎结识了伯希和。3年后在瑞典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音韵学研究》。该文运用了欧洲语言研究中的比较音韵学原理,根据中国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重新构拟了以唐代长安方言为基础的中国古汉语语音系统,是一部不朽的巨著。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将此书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出版。1918年高本汉出任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教授,讲授汉语和日语。1922年他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访华。1931年至1936年任哥德堡大学校长,1939年到斯德哥尔摩出任远东博物馆馆长和东亚考古学教授。在重新构拟了中古汉语的语音之后,他又着手进行上古汉语即春秋时期的汉语语音的构拟工作。他依据的史料主要是《诗经》韵律以及谐声字的声旁。他的上述两项研究成果,于1940年收入《古

汉语汇释》一书出版,1957年该书又修订再版。1954年还出版了《汉语中古音与上古音概要》一书,叙述了他进行语音重建时使用的材料、方法以及研究成果。

高本汉除在构拟中古和上古汉语语音系统成就卓著外,在其它方面也处于学术领先地位:一是经典译注,如《诗经英译》与《诗经注释》、《书经英译》与《书经注释》,至今这些译注仍是西方学者必备的参考书。此外尚有《左传注》、《老子注》等。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先生即对《老子注》较为推崇。二是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发表过《中国古镜铭文考》、《中国青铜器年代考》和《殷代武器和工具》等极具份量的学术论文。三是对中国古代宗教的研究,发表过《中国古代的传说与崇拜》、《周朝献祭仪式考》等重要论文。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高本汉资金,让他培养一批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的汉学学者。自此直至1965年,他一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汉学。他的学生主要来自丹麦、挪威和瑞典等国。这些人日后均成为西方重要的汉学研究者,如索仁·艾格诺德,亨利·海尼和马悦然分别为奥斯陆、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汉学教授,对这些国家汉学研究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马悦然是瑞典汉学研究中可与高本汉相提并论的一位巨擘式人物。以1970年为界,这之前他注重研究中国的四川方言和中国古文学。1948年至1950年他到中国搜集四川方言材料,著有《四川方言语法》和《西南官话音位研究》等文。他严守高本汉的治学传统,对《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文本进行过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于1970年被结集出版。马悦然还发表过一些关于汉语语法、中国古诗以及中国历史和文学的论著。1970年以后,他愈来愈注重向英语和瑞典语世界介绍和翻译中国文学工作。早在1948年他曾翻译出版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据统计,1970年至1984年间,他翻译了至少33部中国文学作品,如《水浒》全文,《毛泽东诗词》38

首以及四卷本的 20 世纪中国诗歌和散文选集。1984 年以后,他翻译了诗人北岛已发表的全部诗作、沈从文的《边城》等,最近又完成了《西游记》全书的翻译。1985 年马悦然当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作为一位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家,他在过去的 20 年中,促成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瑞典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对推动中国与瑞典相互了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悦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期间,培养出许多汉学学生,其中有 13 位已在瑞典被授予博士学位,也有学生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尽管他已退休,但他的学生目前仍在写有关中国研究的博士论文,且选题范围很广,包括古文献训诂、历史人物与事件、现代历史与政治、现代文学与文学理论等等。这不仅反映了瑞典汉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也反映了瑞典汉学研究注意向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轨。这种转轨是与本世纪 60 年代西方的左倾运动相联系的。在左倾运动下人们把注意力放在第三世界,并开始关注中国的“文革”。

70 至 80 年代,除马悦然及其学生群体之外,瑞典还有其他以中国研究为题的汉学者,如对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国教育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研究、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等。

三

为了促进和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研究,瑞典于 1984 年成立了亚洲及太平洋研究中心。亚太中心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心,名义上虽属斯德哥尔摩大学管理,实际上是瑞典整个学术界研究亚太地区的代表。1986 年斯德哥尔摩大学、瑞典皇家图书馆和远东博物馆的中文图书合并组建了远东图书馆。该馆与远东博物馆共处一楼之中。1993 年亚太中心与东方语言学院搬迁一道,形成一座“亚洲楼”。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亚洲研究大楼。

1980 年以后,东方语言学院中国研究系把重点放在中国思想史、当代文学和通俗文化研究方面。选题的范围也日趋广泛,包括《诗经》、先秦哲学、《黄帝内经》、李清照诗词、中国相声、现代中国的广告、中国妇女、毛泽东以后的通俗文学、毛泽东以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冯友兰哲学思想、中国古代人文思想、中国军阀史等多个研究领域。而亚太中心则关注对中国当代政治研究,如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文化大革命、中国吸收与消化外来科技问题、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经济中的作用等。上述单位还邀请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研究人员到瑞典作访问研究。

我于 1968 年开始学习汉语,1970 年到香港中文大学进修,一年后回瑞典读研究生,研究历史哲学,尤注意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问题,后因到北京的瑞典大使馆工作而中断研究。我对 20 世纪初中国意识形态领域较感兴趣,处女作是《20 世纪初的中国》。后来又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于是以戴震哲学为题,发表了一些文章。1980 年以后,出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院长。现正从事《从毛泽东到财神》课题研究,内容较为庞大,涉及到马列毛思想的来源以及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官方对马列毛思想的解释、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回归传统的某些迹象、中国文化的商业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等。我认为高本汉的汉学研究注重的是解决知识之迷,马悦然前期继承高氏的汉学研究传统,后期则开始一项可称之为“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型汉学研究。从历史发展来看,文化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是根据 1996 年 11 月 30 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教授罗多弼先生在广东省社科院所作关于瑞典汉学研究的学术报告,由暨南大学历史系刘正刚记录整理而成。)

区域文化是近来史学研究的重点和热门,而区域文化比较研究则是将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比较研究自有它的难点和苦衷,如费力劳而成果少,易肤浅而难深入等。本文尝试将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作一比较研究,以期抛砖引玉,还望方家指正。

一、巴蜀与岭南社会历史环境之相同点

战国、秦汉时期巴蜀、岭南范围虽变动不居,但巴蜀大致在今四川省,而岭南大致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北部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巴蜀与岭南尽管发展程度不同,情况千差万别,但仍有些相同点。

第一,地理环境特殊。巴蜀在地形上以龙门山——峨嵋山——大凉山为界划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为四川盆地,西部为川西高原和高山峡谷。岭南在地形上北倚南岭(又称五岭),南临大海,南岭横亘东西,隔绝南北。因此巴蜀和岭南在地理环境上都是崇山峻岭,万山重迭,形成天然的屏障和界限,与中原地区隔绝,交通十分困难。

第二,偏僻落后。巴蜀僻处西南一隅,岭南孤悬海滨之地,在中国历史上同属于所谓边远蛮荒之区,开发较晚,进步较迟。与中原地区相比,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例如开明王朝时期(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316年),巴蜀的社会经济虽有不小进步,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秦举巴蜀以前的铁器,^①而这时的中原地区已有较高的冶铁技术,而且已相当普遍地使用铁器了。其次,开明王朝到九世开明之时(大约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②立宗庙在华夏国家中是一件大事,开明建立宗庙,标志着更进一步吸取中原文化,国家机器逐

步健全,礼乐制度日趋完备。但从政治上讲,仍比中原各国落后若干世纪。此外,虽然巴蜀青铜器上常有一种特殊的图画符号,有人称为“巴蜀图语”。但即使承认其为真正文字,也无法与商周发达的甲骨文、金文相提并论。至于岭南,则比巴蜀还要落后,虽有“番禺”、“缚娄”及“阳禺”诸城邦小国,^③但既无铁器,也无文字。

第三,少数民族众多。巴蜀与岭南都是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如巴地“其属有濮、賚、苴、共、奴、獯、夷蛮之蛮”。^④蜀地则有“滇、僚、賚、僰、僮仆,六百之富”。^⑤当时居于川西山地的居民主要是戎羌系统的夷系各族,如冉駹夷、青衣夷、和夷、笮人、邛人等。岭南地区少数民族则泛称为百越,所谓“自岭而南,当唐尧三代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⑥其中包括西瓯、骆越及南越等。战国、秦汉以来,中原华夏族或汉族开始大量迁入,民族融合进程加快,华夏族数量迅速增长,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民族融合的方向是华夏化或汉化,这一趋势,巴蜀与岭南相同。

二、巴蜀与岭南社会历史环境之相异点

秦汉时期,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主要是从中原地区传播、输入而来。但是,要接收和输入先进的中原文化,需要有一定的基础和外部条件,包括行政区划的设置、交通的开发、移民的迁入等。而在这几个关键因素上,巴蜀与岭南又显示出差异。

1、行政区划的设置:即隶属于中原王朝版图,纳入其统治之下。公元前316年,秦派张仪、司马错伐蜀,灭之,不久又取巴。秦在统一巴蜀后,初立巴、蜀二郡,后分巴蜀置汉中郡,从此巴蜀皆置于秦的郡县制度统治之下。岭南地区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南越,在岭南设置桂林、象、南

海三郡。这是岭南历史上第一次划分行政区,但比巴蜀晚了 100 余年。

隶属于中原王朝版图和行政区划的设置,对于边远落后地区来说,关系重大,影响极深。首先,巴蜀与岭南各级地方行政长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委派,他们在任职期间推行贯彻中央政府的制度命令,直接推动了落后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两汉官吏,自汉武帝尊崇儒术后,多为读书人出身。他们多来自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自身又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和教养。不少人服膺儒学,任职期内努力布德化民,传播礼仪,以教化为己任。这些举措与落后地区的文化发展、移风易俗关系极大。其三,两汉选举辟荐制度,多以州郡为单位进行。所有孝廉、秀才、贤良方正、明经等,都由各州郡在所属吏民中荐举,是汉代仕进者必由之路。落后地区的土民一旦步入仕途,诣阙京师或宦游他乡,就为直接接触和吸收先进的学术文化提供了条件和便利。而考试制度的规定无疑又是对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化知识的强有力的激励。

2、交通的开发:巴蜀与岭南地理上与中原地区阻隔,因此交通的开发一直是个重大问题。交通是联系中原的命脉,也是从中原输入先进政治制度、经济技术、文化知识及人员交流的基础和前提。

巴蜀与中原地区交通,主要依靠北面通过秦岭中的几条谷道,俗称蜀道。这几条谷道最初发现和利用,或早在春秋以前,但大规模的加工修筑却是后来的事情。巴蜀与关中,以汉中为中介,分南北二段,南段即巴蜀至汉中,主要有石牛道。此路由今陕西勉县西南越七盘岭进入川境,至今广元朝天驿入嘉陵江河谷,这是历代由汉中入蜀的大道。

北段即关中至汉中,道路非一,主要有:(1)褒斜道:由陕西眉县入斜谷,过分水岭,再沿褒水至褒城,此为关中与汉中交通大道,“也是西汉以前关中与汉中交通之唯一交通大道”。⑦楚汉战争,褒斜道损毁,故至汉武帝时“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⑧(2)故道:又名陈仓道,

起至今陕西宝鸡,西南行出散关,沿故道水谷道至今凤县,折东南入褒谷,出抵汉中。传说公元前 206 年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还定三秦,即此道。楚汉战争褒斜道毁损,故西汉前期皆“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陂,回远”。⑨(3)子午道:汉哀帝时王莽开通,从杜陵(今西安)直绝南山(秦岭)至汉中。子午道与褒斜道相比,优点在于其北谷口离京师长安甚近。自王莽开子午道后,以子午道为大道,褒斜道则时塞时通。东汉顺帝初,又诏罢子午道,通褒斜道。⑩

岭南与中原交通,主要为翻越五岭的几条道路。五岭位置,前人众说纷纭,颇多歧见。宋周去非谓:“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⑪此说极有见地。据今人覃圣敏考证,五岭自西向东依次为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骑田岭、大庾岭。⑫据史载,秦汉时五岭交通有以下几次大的开发:(1)凿灵渠:越城岭在今广西兴安县北,岭之东麓余脉海洋山,为湘、漓二水分水岭。秦攻南越,命监御史禄于此凿灵渠,以便于运饷,长江、珠江水系为之沟通。不仅保障了当时军事运输,而且从秦汉到隋唐一直是中原入岭南的重要渠道。(2)开峽岭:东汉章帝建初时,郑弘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汎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峽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⑬此开峽岭不知具体所指,但根据“出零陵,下漓水”和“出桂阳,下湟水”⑭来看,当指越城岭和都庞岭。(3)疏六泷:东汉桂阳郡治在今湖南郴州。从郴州入粤,可越骑田岭或都庞岭,再沿武水或连江南下至广州。但连江绕道而武水捷径,故商旅来往多沿武水而不会舍近求远。但武水穿越崇山峻岭,水流湍激,流经坪石至乐昌一段,号称六泷,最为险恶。东汉灵帝时,周憬为桂阳太守,仍命人夷高填下,截弯取直,疏浚河床。从此骑田岭成为南北交通大道。

巴蜀与中原交通的开发,时间上比岭南要早得多。石牛道、褒斜道早在战国中后期已开通整治,范睢相秦,曾大力修整蜀

道,所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⑮而故道、子午道最迟在西汉也已开通。秦汉时期,曾对褒斜道、故道、子午道进行过多次修整,因此巴蜀与中原交通一直畅通无阻。而岭南除越城岭灵渠开凿较早外,其余诸岭道开通修整,多发生于东汉,时间上与巴蜀差距较大。

3、中原人民的迁入:人的迁徙和流动是文化交流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中原华夏族人民迁入巴蜀虽早已发生,但罕见诸史载。秦并巴蜀,华夏族迁入始大规模进行,“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⑯此后,迁移之事屡见不鲜。华夏族的大量迁入,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民族结构,所谓“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⑰即巴蜀地区逐步放弃了原来的民族语言及一些固有的风俗习惯,逐渐华夏化或汉化。

岭南地区移民,最早见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⑱徐广注曰:“五十万人守五岭。”^⑲此后,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⑳这是中原人民大规模迁入岭南的开始,时间上要比巴蜀晚100余年。

战国、秦汉时期,中原人民迁入巴蜀、岭南等边远落后地区,有留戍落籍、迁徙豪强、谪宦流放、避难迁移等多种形式。其中巴蜀以豪强、谪宦为多。著名的蜀卓氏、程郑,正是六国灭亡后被迁入蜀,他们后来都以冶铸致富。谪宦如嫪毐舍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㉑吕不韦死,舍人也多徙蜀处,而史载其舍人食客有三千之众。舍人多为知识分子,故蒙文通先生说:“迁蜀的工商业者,既然提高了巴蜀的经济,迁蜀的知识分子,自然也要提高巴蜀的文化。”^㉒此外还有世族避难迁入,如扬雄的先祖,张良的后人。

岭南移民特色,多留戍落籍,罕闻豪强迁徙。留戍落籍除前述“五十万人守五岭”外,还有东汉初年青州人黄万定随马援南征,留家合浦,其后裔世代充当诸洞首领。^㉓至于谪宦流放,始见于西汉末年,如张

由,哀帝时宦至中郎谒者,赐爵关内侯,后获罪免为庶人,徙合浦。^㉔据《汉书》记载,西汉末徙合浦者还有京兆尹毋将隆、孔乡侯傅晏、少府董恭、中山王后、中太仆史立、泰山太守丁玄等及家属。东汉灵帝时,大将军窦武因诛宦官失败自杀,家属徙日南。^㉕世族避难南迁,也以西汉末年王莽之乱与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为两个高潮。毋庸置疑,谪宦和世族与学术文化关系最大,从时间上看,此二类移民岭南也比巴蜀为晚。

此外,巴蜀与岭南地理条件特殊,自成体系,易于割据独立。公元前206年,南海尉赵佗割据自立,是为南越国。南越五主,前后95年,直至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在其地置南海九郡,岭南才又重新回归中央王朝。

巴蜀情况则有所不同。自秦并巴蜀后,整个秦汉时期,巴蜀割据独立共有二次,即西汉末年,公孙述割据益州12年;东汉末年,刘焉、刘璋父子割据益州前后25年。比较起来,岭南割据独立,不仅时间长,几近百年,而且是在岭南刚开始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不久发生,客观上延误了中原先进文化的输入传播,因而关系重大,后果严重;而巴蜀二次割据独立,不但时间短,而且是在中原先进文化已在巴蜀牢牢扎根之后发生,因而影响甚微。这是两者极大的不同。

三、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之比较

由于以上诸因素,巴蜀与岭南接受中原先进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就很不平衡,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两汉时期巴蜀地区与岭南地区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主要是巴蜀先进、繁荣,而岭南则发展迟缓、落后。以下从几方面加以比较。

1、公私教育:两汉时期,巴蜀为全国教育先进发达地区,以文翁兴学为代表。文翁,庐江舒人。少好学,能《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皆成就还归。又修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读

书其中,给予优厚待遇。数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争欲为学官弟子,“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②6}

文翁之后,蜀中除各郡皆设学校外,州及一些县也有学校。如东汉安帝时,“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②7}顺、桓时,冯颢为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人。”^{②8}

以上为官学,此外私人授徒讲学和游学的风气也很盛行。汉成帝时,什邡杨宣“教授弟子以百数”。^{②9}东汉明、章时,武阳杜抚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③0}顺帝时,新都杨厚归家,“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③1}也有外出游学者,如梓潼景鸾“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③2}雒人段恭“少周流七十余郡,求师受学,经三十年”。^{③3}这些都反映了两汉巴蜀人士好学之风。

尤可注意者,两汉巴蜀人士游学京师者人数众多。除前述文翁遣张叔十余人外,还有西汉何武、东汉杨终、张皓、董扶、任安、任末等。京师为全国政治文化学术中心,落后地区士人游学京师,受业博士或师从名流学者,是加强文化交流、提高学术水平的最佳途径。所谓“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正是两汉巴蜀学术文化繁荣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巴蜀文翁兴学之时,岭南为南越国统治,与中原隔绝,谈不上学术教育。岭南地方官学见诸史载最早为东汉,建武初,卫飒“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数,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③4}顺帝时,栾巴迁桂阳太守,“以郡处南垂,不闲典训。为吏人定婚姻丧祀之礼,兴立学校,以奖进之。虽鞞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式殿最,随能升授。”^{③5}今广东曲江、连县等粤北地区东汉时属桂阳郡。东汉地方教育很发达、普遍,前引交趾锡光、九真任延曾“建立学校,导之礼义”。交趾、九真为岭南南部荒远边陲之地,已有学校设立,则其余北部、中部经济条件较好,开发较早地区,学校教育理应更为发达一些。

岭南私人教育,正史不见记载。据明黄佐《广州人物传》,有“董正,字伯和,番禺人。年十五通毛诗、三礼,《春秋》。子立躬耕以供父母衣食,暇即讲诗书,陈礼法,远近多从之游。”^{③6}有黄豪,字子微,南海人。“少好学,年十六通《论语》、毛诗,弱冠诣交趾部刺史,举茂才,因寓广信,教授生徒。”^{③7}此皆东汉后期人士。而岭南游学京师者,正史仅见于汉末桓、灵时广信士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③8}此外还有二三人如陈孚等,事涉游学,但史无明载,语焉不详。

2、文人学者:两汉时期,巴蜀涌现出一批著名人物,其中有不少属于文人学者。据《汉书》统计,巴蜀人物立传者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何武4人。东汉更多,据《后汉书》统计,立专传者有杨终、张霸、赵典、杨厚、王堂、张皓、翟酺7人;儒林传有任安、任末、景鸾、杜抚、杨仁、董钧6人;文苑传有李尤、李胜2人;方术传有任文公、杨由、段翳、折像、董扶、郭玉6人;循吏传有王涣1人;独行传有谯玄、李业、王饨、谅辅4人(列女不计),其余附传及纪传表志涉及巴蜀人士者不可胜数。这中间,有文学家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经学家景鸾、冯颢、杜抚,史学家杨终、李尤,天文历数家落下闳、翟酺,道家严遵,医学家涪翁、郭玉,水利专家王延世等。其中司马相如、扬雄、落下闳、王延世堪称全国一流文人学者,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均巨大而深远。另外,两汉巴蜀文人学者,有不少参与或推动了重大的学术文化活动,司马相如、扬雄自不用说,像西汉武帝时落下闳造太初历,东汉章帝时杨终奏请诏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和帝时李尤受诏与刘珍等撰《汉纪》,皆中国学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

相比之下,两汉岭南文人学者就少得多了。《汉书》无岭南人物列传,仅广信陈钦附见于《王莽传》及《儒林传》中。《后汉书》岭南人物有传者仅陈钦子陈元一人,作者称“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③9}可见跻身于全国一流学者之列。若把《三国志》广信士燮也算入,则两

汉岭南文人学者见于正史者仅陈钦、陈元父子及士燮三四人,从数量上讲,不能望巴蜀项背。而从学术门类专业来看,陈钦、陈元父子皆以治《左传》著称,士燮也是“治《左氏春秋》”,“官事小闲,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④⑩}可见两汉岭南虽出现二三位全国一流学者,但偏于经学,尤其《左传》。而其他学科如天文、历法、史学、文学、医学等皆属空白,学术门类比较单薄。因天文、历法等专门学科需要专门知识和一定的物质条件的支持,如师法传授、家学渊源及丰富的藏书、资料等。两汉岭南学术文化刚刚起步,积累不深,对此自然无能为力。而经学在两汉是官方显学,统治者大力提倡,“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④⑪}故岭南学术偏于经学也就容易理解了。

3、著述成就:先秦时巴蜀或有著述传世,如苾弘、尸佼等人作品,但零星罕见。巴蜀著述大量问世始于西汉。班固《汉书》因刘歆《七略》而作《艺文志》,西汉书籍著述略见梗概。今检《汉书·艺文志》,巴蜀著述记录者有:司马相如《凡将》1篇,赋29篇;扬雄《训纂》1篇、《苍颉训纂》1篇、赋12篇,《太玄》、《法言》等38篇;王褒赋16篇。据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还有赵宾《易说》、张宽《春秋章句》、犍为文学《尔雅注》3卷、扬雄《方言》15篇、《自序》、《天问解》、《蜀王本纪》1卷、《扬雄集》5卷、严遵《老子注》2卷、《老子指归》14卷、司马相如《蜀本纪》、《司马相如集》2卷、阳成子玄《蜀本纪》、落下闳《太初员仪》及《王褒集》5卷等。其中有些不免牵强重复,但西汉巴蜀之著述成就,于此可略窥一斑。

据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巴蜀著述共45种,其中经类14种,以景鸾《易说》、冯颢《易章句》、张楷《古文尚书注》、杜抚《韩诗章句》、翟酺《援神钩命解诂》12篇为代表。史类12种,以杨终《删太史公书》、《哀牢传》、何英《汉德春秋》15卷、赵谦《巴蜀耆旧传》为代表。子类13种,以李尤《政事论》7篇、杨由《兵云图》、段恭《天文书》2卷、郭玉《经方颂说》及《涪翁针经》、《涪翁

诊脉法》为代表。集部6种,以《李尤集》、《李胜集》、《张纲集》、《杨厚集》为代表。著述学科涉及《易》、《诗》、《书》、《礼》、讖纬、《春秋》、职官、地方史、天文、医学、文学等,门类整齐,内容广泛。

“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所上汉文帝书,辞甚醇雅,其中国人代为之耶?抑出于南越人之手也?”^{④⑫}不得而知。《汉书·艺文志》无岭南著述著录,据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则有陈钦《春秋左氏传》(亦称《陈氏春秋》)一种。东汉岭南著述稍多,据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有陈元《春秋左氏训诂》、《春秋左氏同异》、《陈元集》1卷,杨孚《异物志》1卷、《交州异物志》1卷、士燮《春秋注》11卷、《士燮集》5卷、《交州人物志》、牟子《理惑论》37篇等,其中有些还有疑问。从学科来看,涉及《左传》、地方史、宗教、文集几方面。无论就著述数量、种类或涉及学科领域范围来看,岭南较之巴蜀都相去甚远。

两汉巴蜀学术,以天文、历算、文学的特长居于全国之首,而当时流行的经学在巴蜀却不甚突出。因秦燔《诗》、《书》以愚黔首,惟《易》、卜筮、药、种树之书不在禁例,故巴蜀在此数领域应有传统可言。而经学乃文翁遣学之后事情,基础不太深厚。即以经学而言,“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④⑬}这与岭南恰成对照。两汉岭南学术偏重古文经,尤其《左传》,故《三辅决录》谓:“陈钦传《左氏》,远在苍梧”。^{④⑭}另外陈元还传《费氏易》,因“费氏经与古文同。”^{④⑮}这是两汉巴蜀与岭南学术的各自特点。

四、余论

巴蜀与岭南在战国中期以前发展程度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但自秦并巴蜀后,巴蜀社会进步迅猛,加之作为秦国和汉王刘邦的战略后方,战乱较少,长期保持稳定繁荣,中原文化的输入一直畅通,未曾中断。正是在此基础上,至西汉中后期,巴蜀已成为全国先进地区,学术文化大放异彩。

岭南并入中原王朝版图比巴蜀晚了100余年,加之赵佗南越国割据近百年,前后相加,使得中原先进文化输入的进程比

巴蜀晚约 200 年。两汉岭南学术文化比巴蜀落后,其关键因素即在于此。故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谓:“佗之自王,不以礼乐自治以治其民,仍然椎结箕踞,为蛮中大长,与西瓯骆越之王为伍,使南越人九十余年不得被大汉教化,则尉佗之罪也。”^{④⑥}语虽激烈,却切指要害。

西汉后期岭南文化才开始起步,至东汉始有一些学术文化成就可称述,这个进步是缓慢的。东汉末年,因中原大乱,不少文人学者避难南迁。加之交趾太守士燮“保全一郡,二十余年……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④⑦}在这个背景下,岭南学术文化开始有了转机,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如:刘熙,字成固,北海人。博览多识,名重州党。建安中辟不就,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④⑧}

此外还有程秉、薛综、许靖、许慈、袁徽、袁沛、徐元贤、邓子孝诸人。“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④⑨}远离中原战火纷乱的岭南,在当时不啻为一处难得的净土和世外桃源。避难其地的文人学者,或聚徒讲学,或考论大义,或著述不辍。一时名流辐辏,学者云集,形成岭南学术文化第一次繁荣兴旺的局面。加之此时陆绩为郁林太守,“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⑤⑩}虞翻流徙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⑤⑪}此种因流寓而造成学术文化高潮的出现,正反映岭南为输入文化的典型。但此时已为两汉末期,大一统的局面行将结束,历史快进入分裂混战的三国鼎立时期了。

①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68年42页。

②④⑤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华阳国志》卷3、1、3、3、3、3、10中、10中。

③⑳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52—53、75页。

⑥马端临:《文南通考》卷323。

⑦林超、孙承烈:《蜀道考》,《文史杂志》第3卷,5—6期,中华书局,1944年。

⑧⑨《史记·河渠书》卷29。

⑩《后汉书·顺帝纪》卷6。

⑪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

⑫覃圣敏:《五岭辨正》,《文史》32辑,中华书局1990年。

⑬《后汉书·郑弘传》卷33。

⑭《汉书·武帝纪》卷6。

⑮《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卷79。

⑯刘逵注《蜀都赋》引《地理志》说,《文选》卷4。

⑰⑱《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

⑲《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

⑳《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卷118。

㉑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8页。

㉒《汉书·外戚传》卷97下。

㉓《后汉书·窦武传》卷69。

㉔《汉书·循吏传·文翁传》卷89。

㉕《后汉书·儒林列传·杜抚传》卷79下。

㉖《后汉书·杨厚传》卷30上。

㉗《后汉书·儒林列传·景鸾传》卷79下。

㉘《后汉书·循吏传·卫飒传》卷76。

㉙《后汉书·栾巴传》卷57。

㉚㉛见阮元:《广东通志》卷268。

㉜④⑦《三国志·吴书·士燮传》卷49。

㉝《后汉书·陈元传》卷36。

④①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103页。

④②④⑥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1、7。

④③《三国志·蜀书·尹默传》卷42。

④④赵歧纂、挚虞注:《三辅决录》卷2。

④⑤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1984年29页。

④⑧阮元:《广东通志》卷327。

④⑨《理惑论自序》,见释僧佑《弘明集》卷1。

⑤⑩《三国志·吴书·陆绩传》卷57。

⑤⑪《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卷57。

作者李绪柏,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郭林

天地会组织产生于清康熙年间,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入广西。广西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天地会生长扩展的重要省区。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天地会反清武装起义,①其中就有两次发生在广西,一次是太平天国前后两广天地会起义(1847—1866年),另一次是光绪末年广西天地会起义(1897—1905年)。这两次起义有许多相同之处,且有历史的继承关系,本文拟就此作一比较。

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是两次起义的共同原因

广西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都比较落后。鸦片战争后,广西人民既受本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又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加上天灾又多,土地兼并十分严重,从而造成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大量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无数散兵游勇无以谋生。1847年雷再浩、李世得起义,使早已潜伏于各府州县的各种反抗力量“乘机窃发,寝成燎原之势”。1848年雷再浩起义失败后,浔江、玉林、南宁、镇安、柳州、太平、思恩等地均有起义,就连地主阶级下层的少数分子也逐步加入反清的行列。据文献记载,道光二十七年至三十

年(1847—1850年)广西天地会造反队伍多达二三十支。这些起义队伍“随起随灭,随灭随起”,“忽起忽散”,“东奔西突,此拿彼窜”。②他们“皆用红布裹头,所竖旗帜上有‘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字样,枪炮、器械、马匹俱全”。③道光三十年,广西的南宁、柳州、浔洲、梧州、思恩等府的举人和绅士向北京都察院呈控广西匪乱情形,都察院据以上奏说,广西“逆匪横行,延及七府一州”。④这里说的匪就是天地会。早期广西天地会起义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全国的失败,起义也相继失败。失败后的天地会组织迫于清军的进攻,纷纷向南退却,进入越北地区。天地会退入越北以后,广西许多地区的农民仍大批“转红”,加入天地会,曾出现“三里内转红蓄发者至九十六村,五十余村皆长发转红”的局面。⑤

清末第二次会党大起义,是发生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相继失败后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前后。中法战争中国失败,既加深了国家民族危机,也进一步激

发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反对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成为人民群众和爱国士绅更加强烈的要求。加之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大量裁军撤勇,使一大批在反侵略战场上出生入

清末广西两次会党大起义的比较研究

□蒋玲

死的英雄好汉们顿失生计。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巨额赔款,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加之广西自然灾害频繁,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这一切终于导致了光绪末年广西人民的再次起义。这次大起义的组织核心仍然是会党,他们继续沿用天地会“反清复明”和“劫富济贫”的传统口号。起义之初,天地会武装聚集在广西和越南交界的南边六属,^⑥然后逐渐向东西两边聚拢。边界会党渗入内地后,1898年爆发了郁林李立延起义。嗣后,钦州、郁林地区会党遍及南宁、浔州等府,且愈演愈烈,于1902年到1905年达到高潮,形成了三个中心。1902年左、右江各县起义,1902—1903年爆发南宁起义,1904年爆发柳州起义、钦州防城起义、梧州怀集起义。1905年春各大股起义军或败或散,或降或叛,小股起义军则分散、隐匿各地,起义走向失败。

综观清末广西两次会党大起义,它们虽然相隔了30年,但爆发的原因是非常相似的。第一、都是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第二、都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掠夺、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结果;第三、清王朝的黑暗腐败,官府和清军的野蛮剿杀,使广大农民和游民丧失生存之本;第四,自然灾害的频发横生,使他们生活无着,只能铤而走险。

二、两次起义有历史继承性

清末广西两次会党大起义存在着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即1897—1905年的会党起义是1847—1866年两广天地会的子孙后代发动的一次新的反抗清政府的武装斗争。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军集中力量对广西各股天地会进行大肆镇压,天地会武装有的被歼灭,有的被迫向南退却,进入越南北部。他们远离家乡,丧失了衣食来源。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继续以武力为后盾,以天地会的组织形式相号召,在越北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他们设关

卡,收税征粮,划分管区,踞地称王,俨然是一个个小小的独立王国。据统计,中法战争前,活动在越北各地的中国天地会武装力量有153股。^⑦中国天地会武装团伙在越北各地的活动,既严重危及越南政府对该地区的统治,也使“贡道梗阻,枕近粤边”,^⑧妨碍了清王朝对越南政府行使宗主权,威胁着中越边界的安全。1867年,吴凌云之子吴亚忠败退入城,在北宁、谅山、高原、太原、宣光等省扩张势力。1868年,吴亚忠率部破高平省城,扰谅山,打败领兵官阮文庆,并在诃护社打死北宁按察使尊室藩,副管奇潘文延,使越南政府束手无策,只得向中国告急请援。清政府于1869年、1871年、1874年、1880年、1881年先后五次遣兵入越,但由于越北天地会熟悉地形,非但没有被消灭,反由小到大,势成燎原。随着岁月的流逝,天地会内部不断分裂组合,原来的各部起义军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帮帮以天地会的组织形式相号召,占地为王的绿林游勇。就在他们行将被历史遗忘的时候,历史又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了新的转机,迫使他们返回故土。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使越北天地会与法国侵略者的矛盾激化。法军侵略越北,直接威胁滞留在该地区的大批中国移民的生命安全,打乱了他们业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于是以黑旗军为首的各股天地会武装,都加入了抗法战争的行列。中法战争又使越北天地会与越南政府及清政府的矛盾趋于缓和。1873年11月,法军攻陷河内,越政府无力阻止法军进犯,便邀请越北保胜(今老街)等地的刘永福黑旗军南下抗法。1873年12月黑旗军应邀在河内伏击法军,击毙法军统帅安邨及官兵数百人,越封刘为三宣副提督。1883年8月法军攻占了越南都城顺化,其下一步目标就是中国的广西、云南等地区。面对法国侵略越南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政府一面派清军赴越抗法,一面颁布诏谕奖励刘永福黑旗军,并招安越北天地会武装抗法。天地会武装被招安改编入清军后,装备和给养大大改善,战斗力得到充

分发挥。在抗法战争中,天地会武装与滇军、越南抗法力量并肩战斗,立了大功,同时天地会人数亦增加,势力增强。由于清政府妥协求和、中法战争以缔结中法《越南条款》而告结束。中法缔约以后,法国一直视越北天地会武装为眼中钉,特别是刘永福的黑旗军,“永福一日不去,则法人一日不安”,^⑨因此法国把解散黑旗军作为交还澎湖的条件。清政府原本就是想借法国的力量来消灭黑旗军的,但事与愿违。法国提出的条件,正合清政府的意愿。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多次下令刘永福率军入关。1885年9月,刘永福率3000人入关,回内地后,黑旗军一再被裁减。19世纪的最后10年,法军还与中国边防军联合,对越北各地的天地会武装进行镇压。由于敌强我弱,各股天地会武装无法继续在越北立足生存,只好向镇压力量较弱小的地方——中国境内转移。这样一来被裁减的黑旗军及流入境内的天地会与国内会党流民结合,便酝酿和发动了光绪末年广西天地会大起义,而从异国他乡返回的游勇武装则成为起义的主力军。

三、两次起义的共同特点和历史作用

广西的两次会党大起义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延续时间长。太平天国前后的起义,长达20年之久,光绪末年的会党起义也长达8年。二是波及面广,规模大。从1851年至1868年,清官书记载的、有组织名号的天地会起义队伍就多达175支。1857年9月南宁的朱洪英、胡有禄会党起义,曾转战千里,横扫桂北和湘南、黔。广东佛山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大宁军,1855年5月溯西江西上,进军广西,后来在广西发展到数十万人,其势力范围北抵柳州、关远、罗城、融县、逼进桂林;南至容县、怀集;西至南宁、武缘、宾州、灵山、上林,一度控制了大半个广西,打下7个府30个州县城,坚持斗争达11—12年之久。1852年吴凌云在新宁州(今扶绥县)发动起义,其势力遍及桂西南、左右两江的广大地区。

1863年2月吴凌云牺牲,余部由其子吴亚忠及部下张三、刘永福领导,继续坚持斗争到1867年,长达15年。光绪末年的会党起义,1894年仅南宁地区的队伍就达173股。^⑩1902年在庆远、柳州、思恩等府结成大小武装团伙达198股之多。^⑪左右江一带有数十股、约5、6万人的陆川、武鸣会党起义,1902年遍及广西南部 and 西部的10余个州县。在广西116个县级行政区,除义宁县(今临县)尚未见有会党活动的记载,其余无县不有。广西巡抚惊呼“无一处不有匪扰,亦无一日不飞书告急,筹援筹剿,兵力无可应付”。^⑫

两次会党大起义,由于规模大,时间长,而成为全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沉重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天地会的广泛起义,使清王朝统治力量分散,疲于奔命。光绪末年的天地会起义持续8年,迫使清朝调集10个省数百营大军。在围剿起义军的过程中,清军伤亡惨重,仅1903年至1904年,围剿各军受伤、染瘴、医治弗愈运送回营者,相继于道,综计两年之久,百余营之多。阵亡、伤亡、瘴故弁勇不下万人。其中被起义武装杀毙的清军五品军功以上的军官就有121人。^⑬清军筹集军饷,“前后用去不下七百万两”。^⑭从而加剧了清王朝的内外交困,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第二,沉重地打击了外国在华的侵略势力。太平天国失败后,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农民起义虽然转入低潮,但秘密会党的反抗斗争仍然连绵不断。而且这一时期的会党斗争大量表现为反抗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如1897年4月游维翰劫杀法国传教士马仙的“乐里教案”,1898年李亚安棒毙法国传教士苏安宁,1902年游勇武装黄凤光、黄宝斋等劫杀法军中尉韦葛伯。1902年法国驻龙州领事慑于广西天地会起义的威胁,逃离广西,“暂驻越南”。

第三,有力支援和配合了当时的其他革命斗争。1847年至1866年的天地会起义,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太平天国革命。

这次天地会起义,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支援,表现于:一是掩护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天地会的广泛起义,使清朝统治者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镇压天地会,无暇顾及拜上帝会的初期活动。直到1851年,清朝对拜上帝会的活动规模及其领导者仍茫无所知。二是会众直接加入拜上帝会或参加金田起义。还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准备阶段,大批天地会分子就纷纷加入拜上帝会。如秦日纲带千余龙山矿工到金田参加拜上帝会,他们大多是“拜会结盟”的天地会成员。^⑮罗大纲、苏三娘等率整部天地会起义军参加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三是为太平天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就是继承并发展了天地会的“米饭”制度。太平天国革命吸取了天地会组织分散、山堂林立、缺乏统一的领导和严明的纪律,易被敌各个击破等教训,制定了“十款天条”和“太平条规”。

光绪末年的会党起义,还鼓舞和支援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光绪末年的会党起义,正值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风靡全国和民主革命思想传播及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相继建立时期。当改良运动宣告失败之后,广西天地会把“敢不敢杀光绪皇帝”作为拜台入会的誓词和条件。起义失败后,广西会党中的许多骨干分子从屡战屡败中吸取教训,毅然转向革命民主主义。1905年,李立延、王和顺等14名广西会党的首领先后加入同盟会。一般会党成员有些也被发展入盟,早期同盟会发展的西南武装起义的基本力量,就是“已正式加入同盟会之革命会党”。如1907年9月,孙中山领导的钦州防城起义,12月广西镇南起义,主要依靠会党和游勇。由此可见,光绪末年的广西会党大起义,在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前发展上,是有一定功绩的。而大起义本身也从单纯的旧式农民战争走向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相结合的道路,为推动和迎接辛亥革命在广西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光绪末年广西会党大起义还从客观上声援了当时北方兴起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

动。

四、失败原因大同小异

清末广西两次天地会大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清政府的剿杀是起义失败的外部原因,起义军自身的种种缺陷则是失败的内在原因。具体表现在:

(一)天地会组织结构分散。天地会的组织形式是所谓“山堂”,每个山堂有自己的头子(称为“大哥”)。各个山堂互相独立,没有隶属关系。威信高的“大哥”有时可以使别的山堂俯首听命,但也难免旋分旋合,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即使是人数众多的大帮,又由很多不同的帮股组成。帮股众多,山堂林立,不相节制,使天地会组织力量分散,为统治阶级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一旦清政府集中兵力会剿,各股起义军便很快归于失败。而这种组织形式也难从总体上对封建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二)缺乏远大的政治目标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分散的组织形式,决定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不可能超出一省或相邻数省。活动范围的狭小,又限制了天地会领袖们的眼界,使他们不可能具有政治远见,“只因目前之利,并不计及大局”,^⑯从而使他们的行动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投机性、随变性和盲目性。如金田起义初,天地会的罗大纲、苏三娘等投奔太平军,后因太平军纪律严格,除罗大纲外,大都带部离开太平军,有的甚至投降清军。金田起义后,清政府在广东、广西招募了数千壮勇前来镇压太平军,其中主要都是天地会会员。这充分暴露了天地会组织纪律懒散及游民“有奶便是娘”的劣习。这一劣习被清政府利用,从而较快地镇压了天地会起义。天地会在受招安后被杀害的不计其数,光绪末年尤其严重。

(三)阶级意识落后。天地会虽然可以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但它终归是一种落后的组织,依靠江湖义气维系,缺乏新的阶级意识。因此不同的山堂和帮股之间,门户

之见很深,界限分明,私利冲突常有发生。一旦团伙或个人之间发生矛盾,一方往往借助官府杀害另一方。落后的阶级意识为统治阶级实施分割和各个击破的策略大开了方便之门。

(四)社会活动的破坏性。天地会大多数组织仍属广义上的“土匪”团伙,会党武装的骨干分子是游民阶层,他们没有正当的谋生手段,主要从事盗匪活动。这种放荡的生活,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社会性格,对反动统治阶级,他们是顽强的反叛者,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给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破坏。如杨秀清曾批评陈亚贵起义,“掳掠乡村,扰害良民,奸邪淫乱,无所不至,图逞一日之豪强,惶恤他时之殄灭”。^{①⑦}天地会武装的盲目破坏和残酷杀戮,使他们严重脱离群众,因此在清军进攻面前孤立无援,结果只有失败。

五、光绪末年天地会起义的特点

由于阶级基础的变化和时代条件的不同,光绪末年会党起义又有自己特殊的活动特点。

第一,流动性更强。光绪末年起义军的骨干是越北游勇武装,久居国外。打回广西后,由于举目无亲,无立足之地,为生存计,他们不得不走州过府,四处就食,过着流动作战的生活。此外,广西内地大批丧失土地的破产农民和丧失生活来源的饥民也加入天地会,这进一步增强了起义军的流动性。

第二,武器装备较好。起义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来自中法战争。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和前线的清军指挥官为了利用天地会武装牵制法军,向他们提供了大批新式枪弹。战后编入清军的会党被裁后,这些人又带走了大批枪弹,加上战场缴获和从事军火交易,光绪末年的会党武装基本上告别了长矛大刀,而普遍使用火药枪。

第三,起义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这一时期起义触角深入社会各个领域,参加会党人员较前广泛,除农民、失业手工业者

外,被裁遣的兵勇是光绪末年会党起义的主体。此外,会众还遍及商界、兵界、官界、绅界。起义队伍遍及广西,形成“满地红”的局面。

第四,时代特色更浓。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会党起义具有明显的历史过渡性质。一方面它是最后一次反对封建统治的单纯的自发的旧式农民战争;另一方面,它又鼓舞了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民主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志,从而使它从单纯的旧式农民起义走向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相结合的道路。

①即台湾林爽文起义、两广红兵起义、光绪末年广西天地会起义。

②《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前言,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第1页。

③④民国二十六年《邕宁县志》第三四,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第42、43页。

⑤《玉林州志》卷18。

⑥即泗城府、百色直隶厅、镇安府、归顺直隶州、太平府、上思直隶厅。

⑦根据《中法越南交涉档案》、《刘永福史草》、《清纓日记》、《冯官保事迹》等文献资料统计。

⑧郭炳光编《冯官保事迹》(光绪二十九年抄本)第15本。

⑨丛刊《中法战争》(六)第537页。

⑩⑪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第314页。

⑫《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58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⑬《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3583号。

⑭《广西人民起义资料》3册,第11页。

⑮梁崇鼎《贵县志》第11卷。

⑯《都安县志·大事记》民国35年稿。

⑰《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1),第376页。

作者蒋玲,茂名教育学院(525000)

责任编辑:郭林

浪子词人柳永与正统君臣审美意识的冲突

□张海鸥

柳永被时人和后人视为浪子词人，是因为其人其词涉及了许多风流浪荡之事。其实，他在少年时代并非浪子，而是很勤勉的书生。他的故乡建州（今福建崇安一带）在当时是人才辈出的“文献名邦”，“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①柳永生长于此地一个传统读书奉儒之家，祖父、父亲、叔父都读书为官，②长兄柳三复也在真宗朝进士及第并为官。受此影响，柳永自幼也喜欢勤学苦读，他曾在其《劝学文》中写道：“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③他少年时写的诗已颇见功夫。④从青年时代起，他到汴京开始了漫长的举子生涯。他成为浪子词人，也就是在此时期。叶梦得（南宋）《避暑录话》卷下云：“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这一方面是缘于性情和爱好，另一方面也是他以才取财，获得“润笔”以维持生计的途径之一。据宋人罗烨《醉翁谈录》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懂音乐，长作词，使他不仅可以尽情地到“烟花巷陌”去“浅斟低唱”、“偎红倚翠”，而且还能得到一些稿酬，这又助长了他的风流浪荡性情。他甚至结交了一些“狂朋怪侣”，在京都的酒楼、妓馆里欢饮狂歌，纵情享乐。他的词风靡一时，从市井百姓到文人学士，甚至皇帝都喜欢他的词。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骯骯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

然而，当柳永科考求官时，他在词中对浪漫情事的铺陈渲染和对自由意志的公开表达，却恰恰成了他入仕的障碍，此时，浪子词人与正统君臣的人格美和艺术美意识的差异变成了社会化的、历史性的冲突。

柳永与帝王人格美意识的冲突

以下三条史料是人们谈论柳永与帝王关系时常引用的。北宋末严有翼撰《艺苑雌黄》：

“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

稍后，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中云：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王辟之《澠水燕谈录》⑤：

“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

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以上三则史料所述皇帝对柳永的三次打击，参以其它史料，大致可信，但仍有疑点。首先是《鹤冲天》的写作原因、时间及柳永的科考经历。先看其词：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词中明言“青春”、“偶失”，当是初应科考落榜后所作。若非初次，当言“再失”、“又失”或“屡失”等。那么，柳永初试科举于何时呢？由于史料不足，柳永的确切年龄尚难断定，但学界考订柳永的生年不晚于雍熙四年。^⑥以此年算起，则柳永在仁宗即位前已36岁。今存柳词中有《玉楼春》（凤楼郁郁呈嘉瑞）等，当系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作于汴京，其时柳永23岁。^⑦从这一年到真宗朝结束，共开科考四次：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五年（1012年）、八年（1015年）、天禧三年（1019年）。^⑧就是说，柳永23岁、27岁、30岁、34岁均有可能应考。宋人多喜自言“老”，而自言“青春”当不过30岁。以柳永的勤奋读书经历，以其家庭父、兄辈的影响，他应考绝不会很晚。他进京就是为了应考，20多岁的举子在当时是常见的。据此推测，柳永在23岁、至迟27岁时已参加过科考，《鹤冲天》词则作于他初考落第之后。

第二个疑点是：《艺苑雌黄》所载“上曰”，是真宗还是仁宗？《鹤冲天》作于“上曰”之前还是其后？

细审前引三则史料，于本事多含糊其词，而宋人其它诗话、词话、笔记转述者，亦不考原委，皆言仁宗而不明确“上曰”之“上”为何人，以致后人有了“耆卿蹉跎于仁宗朝。”^⑨之误会。其实，柳永蹉跎于科场20多年，主要不是在仁宗亲政之后，而是在真宗朝和仁宗年少、章献太后听政期间。严

有翼明言“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因而“上曰：‘且去填词。’”可知他的词名从他初试科场就已成为障碍，而命他“且去填词”之人，当是真宗。严有翼又说“由是不得志”等等，已说明柳永“无复检约”、“奉旨填词”实与“上曰”有关。而《鹤冲天》词中之抱怨、赌气之意，正由此而发。这样看来，严氏《艺苑雌黄》所记之事，正是柳永在真宗朝初次应考不中之事。而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言，并非“据严语而更演之”，^⑩而是另一件发生在章献太后听政的仁宗朝前期的事。

仁宗即位只有13岁，章献太后听政11年。直到太后去世，24岁的仁宗才执政。柳永在仁宗亲政的第二年，即景祐元年（1034年）终于进士及第。他被仁宗以《鹤冲天》为由黜落之事只能发生在太后听政期间。此间开科考三次：天圣二年（1024年）、天圣五年（1027年）、天圣八年（1030年）。柳永从22岁（大中祥符元年）应考到48岁（景祐元年）中举这26年间的七度科举中到底参加了几次，现有史料尚难说明，但吴曾所言至少表明：他在天圣年间的三次科举中有一次已经入选进士，但在皇帝最后审批时因《鹤冲天》之故而被黜落了。这时的仁宗虽未独立执政，但已开始处理政务，当非15岁少年。

然此事令人费解之处亦多。史载仁宗“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⑪有一次他听到有考进士者因殿试落第而赴水自尽，不禁为之“恻然”，于是立了一项制度：凡经初试进入殿试阶段的举子，一律不再黜落。即便不令人十分满意，也收在榜末。^⑫他亲政不久，即于景祐初年下诏曰：“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悯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六举；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柳永“景祐元年方及第”，或许与此诏之意不无关系）。对读书人这样宽宏仁爱的仁宗皇帝，为什么对柳永就一次次地不客气呢？让我们来看看柳永这首颂扬升平的《醉蓬莱》：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动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澠水燕谈录》所言三条令仁宗不悦的原因，前两条都是皇帝身旁的人察颜观色，猜测揣摩的，未必用了一个“渐”字，用了仁宗作真宗挽词用过的“宸游凤辇”几个词语，就能引起龙颜不悦，绝了人家的仕途。“太液波翻”的“翻”字的确不如用“澄”显得柔和、宁静。但如果仅是艺术趣味不同，似也不至于使龙颜变色。那么到底为什么仁宗对柳永这么严厉苛刻呢？仔细想起来，浪子词人和正统帝王之间从真宗时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审美意识的冲突，不是词应该怎么作，而是人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首先是放浪形骸与正统、谨慎的品行差异。仁宗是个生性谨慎、“务本向道”的正统帝王。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记载，仁宗有一次夜间观看众僧做道场，遂“各赐紫罗一疋”。众僧致谢时，他嘱咐说，“来日出东华门，以罗置怀中，勿令人见，恐台谏有文字论列。”还有一次，他在很受宠的张贵妃那里见到一个定州红磁器，就追问“安得此物”？贵妃说是大臣王拱辰进献的。仁宗训斥贵妃不该与臣僚通馈赠，并用柱斧打碎了磁器。后来他又发现贵妃身着灯笼锦，问清是潞国公文彦博送的，很不高兴。后来文彦博任宰相，台官唐介弹劾他，涉及送灯笼锦的事。仁宗以对上失礼的罪名把唐介贬谪到边远地方，同时也降了文彦博的职，命他出判许州。还有一次仁宗举办赏花钓鱼宴，内侍们用金碟盛钓饵放在桌上。王安石当时是知制诰，他生性不拘小节，把钓饵吃光了。仁宗第二天对宰相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仁宗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性谨慎，规范意识很强，很注重生

活小节的人。

柳永和仁宗恰恰是两路人。他是个容易放任性情、只图一时痛快的风流才子。其实风流才子在当时也是照样可以做官的。做官的人也有风流韵事，只是大家不说出来。柳永却不但写出来，让人到处唱，而且写得不无夸张渲染。这就犯了忌讳。而那首《鹤冲天》又分明是对皇权的轻慢。那种揶揄圣主、戏谑卿相、玩世不恭的浪子情调，写出来便是挑战。仁宗不可能给他好果子吃。其实，柳永做不成官也没什么冤枉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并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明确的审美追求，其最深层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反叛规范、放纵天性的生命自由意识。

柳永和仁宗人格美意识的第二点差异是追求风流与追求儒雅的审美情趣差异。古代文人常常既风流又儒雅，柳永是风流有余，儒雅不足，仁宗则是“留意儒雅，务本向道”。他绝不会象日后的宋徽宗那样去京城名妓李师师的闺房里走走。他重用的臣僚都是正统儒雅之士，宰辅如晏殊、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之臣如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等。他当然不喜欢让那个放任自由的浪子词人领他太多的皇粮。

第三，柳永与仁宗的人格美意识有率真和修饰的差异。这并不是指他们的道德人格有高下之分，而是指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人格。仁宗所欣赏的人格美是经过儒家理性精神加工、修饰过的规范美，它代表华夏文明发展到那个时代的规范人格意识。按封建时代的规范，皇帝占有多少女人都合乎规范，臣子就有限度了。妻妾成群还可以，总和妓女们混在一起就不好了。宋代允许妓女存在，也允许官僚们听听她们的歌，看看她们的舞，甚至自家也可以养几个歌儿舞女。但像柳永这样总是在烟花巷陌中寻访意中人，眠花宿柳，而且还把这种生活体验不无夸张渲染地写出来，到底有些过分，做官总不太合适。相比之下，柳永是过于率真任性了。

浪子词人与宰相词人艺术美意识的差

宋张舜民《画墁录》载：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相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柳永比晏殊至少大四岁，但晏殊此时是堂堂宰相（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这次会晤大约在晏殊 53 岁左右。此时柳永中进士差不多 10 年了，但还是沉于下僚，于是他想和宰相谈谈词，寻找点共同语言，希望这位宰相词人能理解自己的词。这真是当局者迷。晏殊可是旁观者清。他知道皇帝不喜欢的是什么。两个人一开始就心照不宣地谈到了词。晏殊开口就点题：“贤俊作曲子么？”柳永答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当然不能让步，马上指出：我虽作曲子，却不像你那么放肆。

这次短暂的会晤中隐含着长期以来两种审美意识的冲突。这表面是词美意识的冲突，其实是如何做人的观念冲突。柳永是浪子词人，“恣游狂荡”是他的自我评价。晏殊是正统文人。他 14 岁就以“神童”身份被宋真宗接见，15 岁受赐同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42 岁任参知政事。以后虽有浮沉迁徙，但基本是身居高官要职。他生性谨慎，行为规范，很合仁宗的脾气。他举荐、提拔过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这些人后来都受到仁宗重用，成为一代名臣。他绝不会违反皇帝的意思而举荐柳永。《珠玉词》137 首中，仅有两处使用“狂”字：“无端一夜狂风雨”（采桑子），“醉来拟恣狂歌”（相思儿令），皆与柳永“争不恣游狂荡”的“狂”不同。这次谈话虽不多，但若把《乐章集》和《珠玉词》进行对比，就会看出他们在写什么和怎么写方面都有明显分歧。

柳词今存 213 首，其中直接涉及男女情事的约 130—140 首。这些词除写离别、相思等内容外，约有一半左右写到男女艳

情。晏殊批评他时所举词句出自《定风波》（自春来），而柳词中描写女性体态容貌、洞房情事、床第欢愉比较直露的远过于此。如被黄升批评为“丽以淫”^⑬的《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又如《尉迟杯》（宠佳丽）、《慢卷绸》（闲窗烛暗）等。严有翼批评这些词是“闺门淫媾之语”，^⑭并不过分。清人周济尝为柳永辩护，但也不能不批评其词中“恶滥可笑者多”。^⑮这类词，晏殊是不会写的。晏殊今存词 137 首，无一首像柳永这样坦率地写男女艳情。晏词中纯以女性男女情事为题材的词只是一小部分，写得也比较含蓄、优雅。如《清平乐》写女性美：

玉碗冰寒滴露华，粉融香雪透轻纱。
晚来妆面胜荷花。//鬓蝉欲迎眉际月，酒红初上脸边霞。
一场春梦日西斜。
即使写恋情，也很含蓄，如《诉衷情》

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东城南陌花下，逢著意中人。
//回绣袂，展香茵，叙情亲。此时拼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

柳词中的女性主要是秦楼楚馆，烟花巷陌中的女性，写得比较艳，比较露，性感较强；晏词中的女性主要是豪门华筵上唱歌跳舞或侍奉宾主的女性，写得比较典雅、含蓄、优美。柳词中的男女之情常常涉及房中床上的情事和体验，晏词则绝不写这些。晏词中的女性都是交际场上的，柳词中则多是风月场上的。晏词中的男女之情仅限于情感意念范围，而且写得委婉含蓄，柳词中则常常突破这个限度而涉及两性的云雨欢合。即使是写相思或回忆往事，或向往未来，柳词也常涉及两性间的床第之欢。柳永不想对感情遮遮掩掩，他喜欢坦露真情，喜欢铺陈渲染。即便对风尘女子，他也敢坦言真诚的爱恋和同情之心。他把男女之情写得太真切了。

晏词中大量篇章写男女情事之外的生活和生活感受。他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常常是一位雍容典雅的达官贵人，在那里或伤春、悲秋、感慨时光流逝、节令变化；或在清

风明月之中,山水花草之间,宣泄一点官场上的厌倦和郁闷;或在小园香径中独自徘徊,看一看落花飞燕,叹息一番生命的衰老。他也写梦、写醉,写宾客往来,写听歌赏舞吟诗作词之事。总之他只写“高贵者”的生活,不写“卑贱者”的生活;只写正统文人清客的情趣,不写风流浪子的情趣;他追求词篇的雍容、典雅、闲适、清淡、委婉、含蓄之美,不喜欢秾艳、华丽、坦率、风流俚俗之美。

其实,柳词的文化市场远比晏词广阔。晏词的市场在文人骚客之中,柳词则无论市井民众还是正统文人、达官贵人都喜欢,皇帝也要听。晏殊也熟悉柳词,不然他怎么能开口就拈出柳词句子呢?后来的文人都爱读柳词。秦观还有意无意地学柳词句法。苏轼也很熟悉柳词,以至一眼就能看出秦观词中像柳词的地方。

看来,当时的文人以至帝王都并不否认柳词的审美价值。执政者只是认为他这个人不适合从政,应该去专门写词,柳永也就真的成了“专业”词人了。正统文人则认为柳词可听可唱可读,但其中艳的部分切不可学,学了就有失身份。

其实,浪子词人只是柳永人生角色之一。如前所述,他青少年时代是个勤学苦读的书生,为官后是个被后人列入“名宦”之林的好官。他的词也有许多是符合正统审美观念的高雅之作。比如写都市繁华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写羁旅情怀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写离愁别绪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写悲秋念远的《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写执着追求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等等。这些词艺术性极高,历来被认为是柳词的代表作,是极标准的文人雅士之词,是宋词中第一流的精品。柳永

拓宽了词的题材,发展了慢词(长调)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把俚俗语用到词中(这一点在当时和以后都受到人们批评)。他是北宋词坛一个新的美学流派。他的词不仅影响到词的创作,而且影响到戏曲。清况周颐《惠风词话》卷三曰:“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

①《嘉靖建宁府志》卷四。

②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十《送柳宜通判全州序》有载。

③见《建宁府志》卷三十三,又日本刊本《古文真宝》亦收录(仅80余字)。

④厉鹗《宋诗纪事》卷十三录柳永诗三首,其中《中峰寺》咏崇安名胜中峰寺,可知是其在家乡读书时作。

⑤王辟之乃宋英宗治平年间进士,去柳永不远,且其《澠水燕谈录》“所记质实可信,多与史传相出入”(《四库提要》)。

⑥参见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三期),蔡厚示、李国庭所作《柳永》评传,吴熊和《唐宋词通论》,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前言》等。

⑦《宋史》卷七《真宗纪二》卷一一二《礼志》可参证。

⑧据《文献通考》卷三十二《选举五》。

⑨清·宋翔凤《乐府余论》。

⑩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前言》。

⑪《宋史》卷九《仁宗纪一》。

⑫《邵氏闻见录》卷二。

⑬《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

⑭《艺苑雌黄》。

⑮《介存斋论词杂著》柳永条。

作者张海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副教授(200437)

责任编辑:陶原珂

黎明时分的三支响箭

——论“五四”女作家的杂文、新诗和“问题小说”

□钱 虹

五四时代是一个风气大开的觉醒的时代。灵魂的苏醒和心理上的解放,使一代新女性迫不及待地拿起笔来——她们要庆祝自己的新生,表达自己的愿望,探求人生的意义,向世界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五四女作家群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以及个人的心理动机下,向着黑夜尚未退去的林中射出了三支响箭,宣告了她们的诞生和存在。

第一支响箭是议论性杂文。五四女作家中,不少人都是“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向‘文艺的园地’跨进第一步”^①来的。当时,她们都算不得纯粹的文学家,却可以毫无愧色地接受“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和“国事问题关注者”两项桂冠。在自觉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活动中,她们表现出历代才女身上所罕见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议政、参政的热情与气概。例如,冰心最早发表的文章,是登在1919年8月25日《晨报》上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文中记叙了作者对北京法庭公开审理五四运动中被捕的爱国学生的感受,“耳中心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因而振笔疾书,揭露法庭与北洋军阀政府指使“原告”沆瀣一气的阴谋,要求公道,释放爱国学生。这一纸“公道自在人心”的呼吁书表明,积淀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中感时忧国的传统,“兼济天下”的抱负在新一代知识女性身上焕发出一种强烈的“主外”意识——关注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庐隐说得好:“我的

思想真有一日千里的进步了。我了解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从此我才决心要作一个社会的人。”^②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驱使庐隐更感兴趣于妇女、哲学、政治、国家和人生等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这一点与五四初期“问题小说”的大量产生是有直接关系的。1919年至1921年,庐隐接连发表了《论妇女们应当剪头发》、《“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思想革新的原因》、《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新村底理想与人生的价值》、《劳心者与劳力者》等多篇议论性杂文,畅谈妇女解放、劳工神圣、思想革新和平等自由,阐发新的社会之理想:铲除压迫和剥削,建立人人安居乐业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新村”,使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实现。加上她与此同时发表的专论文艺观念更新的《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近世戏剧的新倾向》、《创作的我见》等,在这一系列杂文中,五四初期中国思想界、文学界讨论的问题,她几乎无不涉猎。她的观点不一定都正确,但却充分显示了这个“‘五四’的产儿”(茅盾论庐隐语)与男子一样的激进态度和进取精神。1917年就“开始用白话做文学”(胡适语)的陈衡哲,回国任教不久即于20年代发表了《四川为什么糟到这个地步?》、《关于〈努力〉本身的问题》、《“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等政治意识和社会批判性更强烈的杂文。比较一下这三位较早出现于五四新文坛的现代女作家的早期议论性杂文,便不难发现,其中并不是单纯而客观的评述,而是融合着作者本人强烈的主观感受和浓厚的情绪色

彩的：冰心的杂文充满人道主义的怜悯；庐隐的杂文散发着改革社会的满腔热情；而陈衡哲的杂文则流露出抨击黑暗的义愤，如她这样揭露军阀统治下的四川之糟：“现在的四川社会，只有两个阶级，一是吃人的，一是被人吃的。吃人的又分为大嚼大吃的和小嚼小吃的两等。……至于被吃的人民呢？他们也分为两等，一等是被人生吞活剥的，……四川七千万的人民，可以说大多数属于这一等的。还有一等，是被人咬一口、割一块的。他们的命运虽苦，然比了上面的一等，已经好多了。我们自命为知识界的人，也是属于这一等。”^③在揭露、抨击黑暗的四川社会的同时，也表明着她自己——知识阶层的地位和命运的危机感；形象的譬喻和透彻的分析中，渗透着作者愤世嫉俗的强烈感情。这一点，与五四女作家的早期诗歌和“问题小说”中的主观抒情倾向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五四女作家群的第一支响箭表达了她们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抗议，那么，第二支响箭则表达了她们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这便是她们早期的新诗，回荡着一种黎明时分林间鸟儿欢叫的急促跳跃的旋律，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陈衡哲 1919 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鸟》，首先以一种挣脱牢笼、赢得自由的迫切呼唤而激动人心：“我若出了牢笼，/不管他天西地东，/也不管他恶雨狂风，/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直飞到筋疲力竭，水尽山穷！/我便请那狂风，/把我的羽毛肌骨，/一丝丝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④为了“做一个自由的飞鸟”，为了能“在自由的空气”展翅翱翔，笼中的鸟儿何惧“扑折了翅膀”，拼命“撞破那雕笼”。在这鸟儿身上，分明跃动着觉醒的一代女性对自由与解放的渴望。有意思的是，我们同时在好几位五四女作家的早期诗作中，看到了以鸟儿自比自勉的抒情言志诗。冰心写道：“空中的鸟！/何必和笼里的同伴争噪呢？/你自有你的天地。”（《繁星·七十》）庐隐笑言：“云端一白鹤，/丰采多绰约。/我欲借槃缴，/笑向云端搏。”（《云端一白鹤》）

陆晶清梦想，“向仙鹤借来了雪白的翅膀，/乘长风，/飞过重重大山，/飞过无边际的海洋”（《归梦》）；石评梅渴望，“将‘自由’的花冠——戴在燕儿的头上”，让她“很快地飞去——/由我绯红温暖的心窠中飞去！”（《飞去的燕儿》）尽管冰心的“空中鸟”别有天地，庐隐的“白鹤”雄心勃勃，陆晶清的“仙鹤”魂牵梦绕，石评梅的“燕儿”略带乡愁，但在审美风格上，都显示出浪漫主义的共同特征：强烈的主观抒情，浓厚的理想色彩。这一点，也恰恰与青春时代一种典型的心理和情绪特征相吻合：憧憬未来并富于幻想。五四女作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崇拜“火”、“光”（如《凤凰涅槃》、《炉中煤》、《太阳礼赞》）甚至赞颂“天狗”（《天狗》）意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凌空展翅的“鸟儿”是一种既勇敢坚定又优美抒情的形象，即女诗人的“自我”形象，它不似“火”、“光”那般灼热滚滚（闻一多的《红烛》），也不象“天狗”那般气吞日月，因而“鸟儿”成了符合女作家心理特点的最形象也最贴切的抒情载体。正因为此时的“鸟儿”们勇敢坚定，也就必然会使五四女作家的早期诗歌艺术风格添加了一些比较坚硬、豪放甚至不无粗犷的情感线条。以柔美著称的冰心，居然也有“大刀阔斧”的男子气概：“青年呵！/我们也有这样刚强的手腕么？/有他这样朗洁的心胸么？/青年呵！/一齐打起精神来，跟他走！/不要只……”（《秋》）以感伤出名的庐隐，当年曾对世界热烈欢呼：“尘世的万种罪恶，/光明的障碍全仗你打破，/打破了那里黑暗的形形色色！”立志“永远健旺着把世界改革！”（《祝〈晨报〉第三周（年）的纪念》）柔肠百转的石评梅，在其最初的诗作《夜行》中，丝毫找不出凄艳哀婉的泪痕：“车声辘辘，好象唤醒你作恶梦的暮鼓晨钟！/萤火烁烁，好象照耀你去光明地上的引路明灯！/你现时虽然在黑暗里生活，动荡；/白云苍狗，不知变出几多怪状！”^⑤陈衡哲笔下的扬子江，更以一种左冲右突、桀骜不驯的战斗姿态出现“我决意舍弃了一切，/独自的努力向前奔，/刀样的石尖儿，/斩不断我向海的决心；/钢铁般的

坚壁儿，/阻不了我冒险的精神。/他们尽自威吓我，/我却尽自向前奔，/向前撞，/向前奔。/我磨平了刀样的石尖儿，/我凿穿了钢铁般的坚壁儿，/再向前撞，/再向前奔。”^⑥五四时代的浪漫精神，贯注在扬子江那勇于冒险、敢于冲撞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气概中，它给五四时期的文坛带来了喧嚣与骚动，充分体现出青春时期特有的朝气和魅力。处在青春期的男女虽有生理和性格上的差异，但觉醒意识带来的心理上的飞跃却是同步的，在扬子江那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豪迈气概中，我们看到了《女神》那种狂飙突进的主观战斗精神。表面上看，这是在赞美一条勇敢坚定、不畏艰险的江流；而从深层意蕴来分析，这不啻是觉醒了青年女性向束缚思想、禁锢自由的旧世界发出的抗争与怒吼，诗中“刀样的石尖儿”、“钢铁般的坚壁儿”无疑是封建恶势力的象征；而“我”则是一个反抗黑暗、向往光明、追求自由、勇于献身的热血青年。这个热情奔放、与恶势力拼搏的“我”，充分显示了“自我扩张”的意义和价值，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这个“我”的奋斗，并不像于连·索黑尔（《红与黑》）、拉斯蒂涅（《高老头》）那样纯粹为了改变自身的地位，使自我奋斗成为进入上流社会的阶梯，而是为了施展拯世济民的抱负。石评梅的话道出了一代五四新女性的心声，“我们最美丽而可以骄傲的是：充满学识经验的脑筋，秉赋经纬两至的才能，如飞岩溅珠，如蛟龙腾云般的天资，要适用在粉碎桎梏，踏翻囚笼的事业上”。^⑦这里，个性意识与“兼济天下”的传统精神，在五四新女性身上有机地统一起来。她们就像那条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扬子江那样，一旦挣脱坚壁石尖的封锁和阻挡，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融进了社会的大海。然而，社会是黑暗的，山河破碎，军阀混战，到处都充满着痛苦、屈辱和不平之声。于是，她们圆睁着疑惑不解而又愤世嫉俗的眼睛，面向黎明时黑暗的天空，射出了第三支响箭——“问题小说”。这既是她们用小说的形式探讨、研究社会问题的继续，也是她们肩负起忧国

忧民的社会责任感的标志。

“问题小说”的大量产生，是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它最鲜明地标志着：“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⑧从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⑨的低诉，到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⑩的悲叹；从冰心“是谁断送了你？”^⑪的质疑，到庐隐“灵魂可以卖吗？”^⑫的呼问……“问题小说”以其针砭社会、揭露黑暗的及时和率真，在五四新文学发轫期的阵地上竖起了一面与近代黑幕小说、谴责小说相抗衡的旗帜，并迅速地将一群男女作家召集至自己的麾下，显示了五四新文学的最初实力。

统率这两支创作队伍的，正是五四新文学作家关注现实、感时忧国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冰心 1919 年在北京《晨报》上公开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⑬庐隐 1921 年在《小说月报》上也说自己的创作宗旨是，对于“社会的悲剧，应用热烈的同情、沉痛的语言描写出来，使身受痛苦的人一方面得到慰藉，一方面引起其自觉，努力奋斗，从黑暗中得到光明——增加生趣，方不负创作家的责任。”^⑭尽管五四“问题小说”存在着不足之处，被批评为“只问病源，不开药方”，或“结构松散，技巧幼稚”，但这些 20 多岁尚在求学的青年作者，对于发挥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社会功能和扩大其社会影响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在当时（1919 年）就有人注意并指出过：“万勿当作普通小说读过就算了，还要请大家起来研究研究才好。”^⑮“问题小说”的出现，实在是五四文学作为一种启蒙文学的一大功绩。它使文学走出了无病呻吟的象牙之塔，成为反映社会与人生痛苦的敏感的血压计。

无可否认的是，冰心和庐隐这两位文学研究会最早的会员，在关注社会问题、反映现实人生中流露出来的满腔热情，以及她们在“为人生而艺术”的最初实践中对于创作题材的开拓意义。庐隐的“问题小说”

差不多每一篇都提出了“谁之罪”的质询，如封建婚姻，扼杀青年男女的爱情（《月夜里的箫声》）；横行乡里的恶霸地主断送农家少女的性命（《一封信》）；烽火连天的军阀混战，带给无辜百姓以灭顶之灾（《王阿大之死》）；纱厂女工的痛苦来自雇佣劳动剥夺人身自由（《灵魂可以卖吗？》）……冰心的“问题小说”也反映和触及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爱国青年与封建家庭的思想冲突（《斯人独憔悴》）；空怀报国之心的青年由于失望而远走异邦（《去国》）；可怜的童养媳受到非人的摧残（《最后的安息》）；穷苦的拾荒孩子不幸饮弹身亡（《三儿》）；等等。这类反映民生疾苦、揭露黑暗现实的“问题小说”，表明了作者创作之初的视野并不像一般评论家所批评的那样只是一味咀嚼着身边琐事，而是有着明确的警世的创作意图，担负起感时忧国的社会责任的。庐隐的社会使命感似乎比冰心更明确，思想倾向也更激进，创作视野也更开阔些。冰心注重人生的幸福与环境的和谐，她的笔端常蕴着温情柔意；庐隐则强调人生的痛苦和“社会的悲剧”，她的笔下常带愤懑怨恨。这不仅反映出她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分别受到泰戈尔和叔本华的不同影响，⑩也使得她们的取材范围、描写对象以至艺术风格彼此迥异。

同时代的苏梅（绿漪）1920年发表于《北京女高师文艺会刊》的小说处女作《童养媳》，虽是文言，也反映了封建桎梏下的童养媳的不幸和痛苦，令人同情。陈衡哲的《小雨点》收集的不少作品，都应算作“问题小说”，比如《波儿》、《巫峡里的一个女子》、《洛绮思的问题》、《一支扣针的故事》等等。作者作为较早派往西方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她习惯用东方人的善良眼光和伦理观念去观察和思索西方社会的问题，发现了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孤独感。如失去父亲的波儿，无钱求医，只得等待死神的降临（《波儿》）；年老体弱的亨利夫妇，被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女们所遗弃（《老夫妻》）……。这些反映西方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的“问题小说”，反映了作

者对于本世纪初美国妇女命运和儿童、老人境遇的关注，她观察着东西方文化观念中的差异现象，思索着西方妇女为保持人格独立付出代价和母亲的自我牺牲。这些在本世纪初西方社会突出的妇女独立和妇女命运的问题，恰恰也是20年代在中国开始萌芽的社会现实问题。陈衡哲的小说，虽然近乎平铺直叙，刻划不够细致，叙事有欠圆满，但她所提出的问题的社会意义，却在东西方文化观念沟通上架起了一座桥梁。以诗歌和散文见长的石评梅，也写过一些反映不幸人生的“问题小说”，如《董二嫂》等。她最早发表于《晨报副刊》上的一个剧本——《这是谁的罪？》，描写一对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新派”恋人，由于封建家庭的粗暴干涉被迫分手，酿成一幕社会惨剧。当即有人撰文指出，作者的用意“是要编问题剧”，“罪在其父，罪在社会习惯”。⑪可见，反映现实人生的种种问题，以唤醒世人的觉悟，确实是五四女作家早期创作的共同心愿和思想宗旨。

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问题小说”在题材上相对集中于妇女命运及地位、家庭生活与事业的矛盾等，并且大多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摹写，并非纯客观的社会写实作品。首先，她们的作品中每每出现抒情人物“我”的声音：浮想连翩的感慨，人生痛苦的嗟叹，或是悲愤难抑的呼喊，莫名其妙的忏悔，常常使故事结构出现罅隙和裂缝，而渗透出主观感情。例如石评梅的《董二嫂》，描写封建家庭内一位青年妇女的不幸遭遇，但是这位“女主角”始终未曾露面。起初是她挨打后痛苦的声音透过围墙引起“我”的感叹和思索。过了几天，董二嫂死了，“我”发出了卢梭式的忏悔。其中，情节的发展听任抒情人物“我”的感觉和思绪飘来荡去，而人物不幸命运又在“我”跌宕起伏的“心波”中时隐时现。于是，我们在“问题小说”的写实画面中，看到了和早期诗歌相似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

其次，在她们笔下，每每出现象征意味的梦幻世界。如冰心的《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那出现在烦闷悲苦到极点，

预备投海自杀的青年面前的一对金童玉女,“缟白如雪的衣裳,温柔圣美的笑脸”,象征着光明天使的降临;《超人》里在星光下缓缓走来的白衣妇女,便是温柔恩慈的圣母化身;《最后的使者》中那诗人与神、与雨的使者、与夜的使者、与水的使者、与花的使者的对话,更是弥漫着一种神秘奇谲的梦幻般的氛围,流露出神思飞扬的浓郁的诗意。庐隐小说中则把不同空间的人物嵌入梦幻中的同一画面,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如《月夜里箫声》那梦境中的吹箫仙女,让“我”(也让广大读者)看到了人力车夫食不裹腹与有钱人花天酒地的贫富悬殊的社会情景;《一个病人》中因神经衰弱而失眠的女子眼前出现“无数魑魅”的幻觉意象的叠印,代表着人生痛苦与荒诞世界的因果联系。陈衡哲的《巫峡中的一个女子》,故意隐去了故事的年代,将那位出逃的女主人公安排在“模糊得像梦境一般”的荒山中,她却仍不得受人间的鬼、深山的兽之折磨。总之,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神仙、妖魔鬼怪,都在“社会的悲剧”中充当了重要的剧中人。于是,我们在“问题小说”的写实画面中,也找到了象征主义的线条和荒诞派的色块。

五四女作家群初期创作的三支响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其早期诗歌和“问题小说”。其中,尤以冰心的《繁星》和《春水》为代表的抒情小诗的文学成就最高,成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流派中独具风格的一家。“问题小说”的社会意义虽然大大超出于抒情小诗,但其审美价值却远远不如后者。似乎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负有表达某种思想、理念的使命,因而使女作家们难以自如地发挥自己抒情的特长。最早明确“问题小说”这一文学概念的是周作人。他在1919年撰文谈及,“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它,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问题小说,……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所以形式上内容上,必须具备两种条件,才可当得这个名称。一、必具小说体裁。二、必涉及或一问题”。⑮这段话,清楚地概括了“问题小说”

的性质和特点。作为小说,它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形象,描写生动,有一定的可读性;又因为它必涉及读者关心的现实人生问题,所以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但是,这种特点反过来看也是一种艺术上的缺点,在某些“问题小说”中,小说的体裁往往成为承载某个社会问题的薄薄的外壳,甚至成为作者表达某种思想理念的演绎。如庐隐的《一个快乐的村庄》所描写的那人人安居乐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世外桃源”,就分明是《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一文中乌托邦社会主义“新村”的图解。

①茅盾《庐隐论》,1934年《文学》第3卷第1号。

②庐隐《庐隐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年6月版。

③陈衡哲《四川为什么糟到这个地步》,1922年7月23日《努力周报》。

④陈衡哲《鸟》,1919年《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

⑤(石)评梅《夜行》,载国立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新共和》第1卷第1号,1921年12月10日出版。

⑥陈衡哲《三峡中的扬子江》,1922年11月26日《努力周报》。

⑦石评梅《红粉骷髅》,载1924年12月17日《京报副刊·妇女周刊》。

⑧《文学研究会发起宣言》,引自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5月初版。

⑨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1919年《新潮》第1卷第3号。

⑩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1919年《新潮》第1卷第3号。

⑪冰心《是谁断送了你?》,见《去国》集,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⑫庐隐《灵魂可以卖吗?》,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

⑬冰心《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1919年11月11日北京《晨报》。

⑭庐隐《创作的我见》,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

《中国文学史》“导论”读后放言

□黎乔桂

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一出版,立刻掀起了一片赞叹的声浪。我认为这部新著的主要优点有三:第一,对审美意识的强调;第二,对个性的强调;第三,对“以情动人”的强调。有此三强调,对过去好些重思想、轻艺术的文学史著作,就起了纠偏作用,有了新面貌、新气象。

但是这部新著,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之处。本文暂时局限于其“导论”部分,探讨一下这种不足,以期引起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一

由主编章培恒先生执笔的这篇“导论”其实是一篇特长的文学理论论文(近四万字),文中对其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作了如下表述:“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并不是决定一篇作品高下的主要尺度。”^①章先生在文学中摄取了若干例子来加以论证,我们且看看它们是否真有道理。

章先生引录了《诗经·秦风·蒹葭》、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崔颢《黄鹤楼》、李白《静夜思》、李商隐《夜雨寄北》等古代名篇。他说,这些诗,“若

就其反映社会的广度和深度加以考察,实算不上有突出的成就。”^②又举出乐府诗《悲歌》、《艳歌行》与之比较,认为那些诗反映生活广而深,但在古人评价中却从来低于上述名篇,企图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

陈子昂诗是这样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官至左拾遗,屡屡上书言事,切中时弊。并曾随军击契丹。平生爱哲学,有大志。后被诬下狱而死。堪称一世豪杰。在文学上则力主一扫南朝颓风,重铸汉魏风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序》一文曰:“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读之令人血脉贲张。而眼前这首诗,则以扭转乾坤自命,又感到没有同盟者,豪情与悲愤相激,是何等胸怀?天地熔于一心,万古抚之一瞬,不稍加藻饰,而作者音容事业,尽在目前。这活脱是一尊伟人塑像。难怪元好问要说“合著黄金铸子昂”了。如果对这还要说什么“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算不上有突出的成就”,岂非皮相之论?

上述名篇采取怀乡题材者居多,章先生认为它们没有包容更广、更深的生活内涵,恐怕是对

^①鹄魂《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1919年12月4日北京《晨报》。

^②关于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可以从她1920年8月30日夜写的《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以及《繁星》、《春水》“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得到证实。关于庐隐受叔本华影响,可参见《庐隐自传·思想的转变》。

^③邓拙园《评梅女士的〈这是谁的罪?〉》,1922年4月8日《晨报副刊》。

^④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1919年2月2日《每周评论》。

作者钱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062)

责任编辑:陶原珂

题材本身缺乏深入分析,且忘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的缘故。既是宗法社会,一切人、一切事都贯穿了宗法的血脉,自然就特别重视地域性,讲究“故土难离”,“怀乡病”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情结。这与西方那些重商民族的“四海为家”传统相比,显然是大异其趣的。尤其是,李白在文章中说过:“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③隐隐然把怀乡与整个宇宙、人生联系起来,逐渐使它上升为中国文学的永恒母题。所以,在许多古代文学作品中,“怀乡”题材非但不单纯,反而几乎包含了士大夫文人的大半个精神世界。难道我们从李商隐《夜雨寄北》的乡思中,没有看到诗人的坎坷一生?难道我们从《黄鹤楼》那更广义的乡思中,没有看到诗人对万千士子价值失落,对专制社会压杀人才的慨叹?

除了诗歌,章先生还举长篇小说作例子。他拿《三国志通俗演义》和《西游记》相比,认为就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前者当然远胜后者,后者的好处只在“构思之幻”;不过两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不相上下。但这“幻”的蕴含其实是很深厚的。无论是对于作为所写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强大、发达的唐代来说,或者是对于创作时代的,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来说,《西游记》那种在幻想中向西天取经的题材,其社会生活涵义都不寻常。何况还有儒、道、释三教的复杂关系,精灵妖魔行为暗示出人情世态,以及那个不怕天、不怕地、神通广大、智勇双全的齐天大圣更象征了老百姓的理想,怎能说小说反映的生活不广不深呢?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章先生不用杜甫诗与其他诗作比较?杜甫诗兼有两长,既传颂千古,又明显地具充分的生活广度和深度,一比答案不就出来了吗?难道是章先生对杜诗不熟悉?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看来恰恰相反,正因为他对杜诗太熟悉了,害怕用来比较会妨碍自己想要作出的结论;于是这才苦心孤诣地设计了看来较合于己说的比较范围的方案,以期避开社会、人生的大题材,避开杜甫和杜诗。以致明知要削弱科学判断的普适性,削弱读者的信任感,他也顾不得了。

至此,对于章先生那种实质上排斥文学反映生活广度和深度的尺度的观点,批评已经可以住笔。不过这个问题牵系太广,是否还会有其他变

相呢?

二

我想与章先生商讨的第二个问题,即作家、作品的个性、以及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

本来,章先生在文章中强调个性是正确的,是对过去的文学史研究过分强调共性、却又忽视个性的一种纠偏,确实给研究工作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不过很可惜的是,与此同时,他似乎又走向另一极端,把个性解释成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共性、脱离理性的、偏狭的“个性”了。这一点,与我们前面说过的第一个问题是有联系的:谈论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关涉的主要是创作的基础和源泉;而谈论作家、作品的个性与共性,则关涉的主要是作家和创作的本身;两者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层面。既然章先生否认反映生活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性,那么很自然地,读者便会预料到,他势必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作家和作品共性的重要了。

章先生认为他的意见是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支撑的,我们先看看他的说法。

章先生先说:“在谈到人类本性时,马克思特别注意到人对自我的重视。”接着便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中转引若干前代思想家的言论。爱尔维修说:“人不邪恶,但却是服从自己的利益的”。霍尔巴赫说:“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边沁说:“……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等等。^④

读书至此,不免会引起稍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读者惊疑:马克思怎样变成纯粹的个人主义者了?他又怎样变成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的,还有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论者边沁?如果说到理论渊源,马克思更渊源于黑格尔,那么他还会变成唯心主义的哲学大师黑格尔吗?

章先生并不满足于霍尔巴赫等人的“个性”、“自我”等概念,他还要继续发挥和补充。他引用《神圣家族》:“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应当……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生命力。”并加以评论:“那么,

享乐和显露生命力应该也是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的组成部分。”^⑤继而，又从《神圣家族》中转引霍尔巴赫的观点：“人若没有情欲和愿望就不成其为人。”终于，他作结论道：“所以，马克思所说的‘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也包括了情欲等等。”^⑥

对此，人们不免又生疑惑：这到底是否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性”观点的可靠阐释？为什么多数用的只是“情欲”、“享乐的合理性”之类字眼，难道“人的本性”就只有这个方面，而没有其他方面？会不会只侧重了感觉、感性、“形而下”，而忽略了理智、理性、“形而上”？

这种模糊的疑惑，如果结合章先生的上、下文一起看，立刻会变得清晰起来：仅仅强调个人、个性，而忽视了众人、共性的观点，必然同时只侧重个人的“情欲”、“享受的合理性”之类，忽视了理性和高级的精神生活。而仅仅重视个人的“情欲”、“享乐的合理性”呢，又必然同时只强调纯粹的“个人”和“个性”。

这类观点是否真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支撑呢？让我们看看马克思自己怎样说。

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个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来说才是对象。”^⑦

他又说：“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物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因此，他的生活表现——即使他不直接采取集体的、同其他人共同完成的生活表现这种形式——是社会生活的表现的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的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的生活的较为特殊的表现或较为普遍的表现，而类的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个人生活或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⑧

他还说：“在某种意义上，人很象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镜子，也不象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这个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⑨

马克思的观点在此已经足够明朗。他主张个人从来就不是纯粹的、脱离社会的个人，个性也不是脱离共性的个性；正因为个人必须考虑他作为

社会一员的地位，所以他虽有享乐、情欲，但又并非只有享乐和情欲，他还有理性。这才是真正符合“人的本性”的个人。原来《神圣家族》本来是对“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兄弟等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必须从根底讲起，即从个人，从个人情欲和享乐的权利讲起，这才摘引了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边沁。但这还不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在理解了唯物的根底的同时，又进一步理解了马克思对于人的共性和理性的强调，才算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也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像章先生那样，因为只是满足于片言只字的摘引而发生误解。

既然如此，就抽空了章先生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于是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看看他是怎样剖析文学作品的实例的。

对于李白的名篇“将进酒”，章先生说：“这首诗的内容可以用以下三点来概括：一，对于以喝酒为中心的享乐生活的赞颂和追求；二，对个人才具的自信；三，对人生短促的悲哀。而第一点尤为突出。若从通常所谓的社会意义或教育意义来要求，这首诗并不可取。”^⑩

这种说法，分明是对上面引用马克思和法国唯物主义者时所表述的那种“章氏理解”，即关于“人本性”的“个人情欲和享乐的合理性”理解的一种实际应用。但是这种说法是多么叫人惊异！第一，这样不就是把李白与他所蔑视的那些“权贵”等量齐观吗？因为不难想象，后者正是追求“以喝酒为中心的享乐生活”的！第二，能否不加区别地把文学等同于生活，把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等同于形而下的物质欲望，把伟大诗人李白等同于纯粹的一个酒鬼？第三，即使退一万步来说，章氏解释符合诗的原意，李白真在那里讲饮酒作乐，在那里捍卫个人的享乐权，那境界又高到哪里去呢？难道能跟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为普天下老百姓争生存权相比吗？显然，不能这样理解李白诗！

关键在于对“喝酒”不能指实。“酒”、“喝酒”、“醉酒”，在这里已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形而上的象征。在诗歌中大量渲染醉酒，实在是李白的一大发明，在中国文坛上，甚至对中国人的整个精神生活，都曾发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他开辟了一片“醉境”，一个“醉的世界”、“醉的人生”，来与“醒的

世界”、“醒的人生”相对立。这种世界、人生，不是比“醒”的世界、人生，更干净、更清醒吗？像“钟鼓馔玉不足贵”、“古来圣贤皆寂寞”、“与尔同消万古愁”那样的句子，难道就没有包含对专制制度永恒性的深刻怀疑吗？在天宝初年，唐朝国势表面正有繁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许多人都在那里歌舞升平、弹冠相庆，不正是李白写出“将进酒”和“蜀道难”那样的诗篇，以及“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那样的句子，指出国家正潜伏着极大的危险吗？

确实不应该简单地用偏狭的个性、粗鄙的情欲以及“享乐的合理性”之类去归结李白诗。李白的个性固然卓特，但也正因为这卓特，才能发掘出自己周围的更广大的一片共性与之相沟通，直至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沟通，这才成就了他的创作的一片辉煌。

如果仅仅依靠这样一种“个性论”来阐释作品，那么许多古代名篇的真实面目都在读者眼前消失了。在章先生笔下的辛弃疾和他的词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面对数以千百计英雄壮阔、慷慨悲凉的辛词，以及别的诗文、“美芹十议”那样的策论，都可置之不顾，而只根据评点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的几句话，和自己对两首辛词个别片断的揣测，就可断定辛弃疾的思想充满了“乱臣贼子气”？^⑪据说，正是这种渺渺茫茫，即使专家考证，也未必能找出几个分子的“乱臣贼子气”，才是千百年来广大读者热爱辛词的真正原因，因为这充分表现了作者的“个性”！请听听章先生是怎样说的：“辛弃疾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只要有会，连成为桓温一类的人也在所不恤。——在封建社会里，桓温是被视为曹操式的奸雄的。换言之，辛弃疾为了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做一番事业，可以不择手段，公然违背伦理纲常，其追求的强烈，殊非一般的士大夫可及。也正因为此，他的悲歌和抗议才具有如此巨大的震动力。”^⑫

对于此等文字，一切评论都是多余的了。此刻我的心情，最想说的只是两句话：还我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还我中华民族的心理凝聚力！

有了上述“证据”，章先生的笔锋便逐步向结论接近，他说：

“由此可知，文学必须体现人性，又必须具有鲜明的个人性（如同上文分析辛弃疾《水龙吟》时

说的那样）；而后者实际上也正是人性的要求。”^⑬

多么巧妙的措词，笔锋的溜一转，就把读者的注意力从“人性”导向“个人性”，仿佛“人性”从来就只是“个人性”了。于是他说：辛弃疾，“他的苦闷首先不在于报国无门，而在于英雄失路。”“这其实是一个从群体出发还是从个人出发的问题。”^⑭辛弃疾，“不但归根到底是以个人为本位，而且给予自我以极高的估价和期望。”^⑮

这些话，就有点“英雄欺人”的意味了。不过无论如何，章先生已经在自己的幻觉中，排除了“共性”、“理性”的干扰，竭尽全力把“人的一般本性”、“历史地变化了的人的本性”的大厦，扛到了“个人性”的地基上。

三

但是仅仅论证章先生否定“生活的广、深度”，否定“共性”等等，唯独主张个性、情欲、享乐的合理性，还是不够的，我们依然没有了解他的文学观的全貌。为了解开疑团，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分析他的文章的整体布局。

章先生首先提出“文学是什么”这个文学本质问题，承认许多人认同的“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这个答案大致正确，但是觉得仍有弱点，必须补充。怎样补充呢？他加上一句话，把答案变成“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⑯他认为，这个感情是有时、空规定的：“越是在漫长的世代、广袤的地域，给予众多读者以巨大感动的，其成就也就越高。”^⑰这个感情也有其人性（“人的一般本性”和“历史地变化了的人的本性”）依据：“越是这样的作品，其体现人类本性的成份也就越多、越浓烈，从而也才能与后代的人们，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⑱

对于章先生的这种文学观，我想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从表层看。章先生既强调个人性，同时又强调作品要取得最广大的共鸣。甚至包含这种意思：越是具有这种个人性，就越能得到最广大的共鸣，因为这种“个人性”就是（直通）“人的本性”。

但是我觉得这种理论很难克服自身的矛盾。既要避开生活的广、深度，避开共性和理性，那就只剩下赤裸裸的个人情绪性，又怎能争取最广

大读者的同情呢？因为无论作家如何陶醉于自己的个人情绪，读者的同情，也只能蕴藏在生活的广、深度里，蕴藏在对共性、对生活规律和艺术规律的认同里。章先生对南朝文学的评价很高，一向把它看作“文学的自觉”的典型。但是章、骆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明明这样说：“南朝文学也有其明显的偏狭性”，“士族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因此，他们的文学也就很少反映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民众的生活情形。”^{①⑨}连“典型”都无法与民众沟通，章先生所许诺的最广大的共鸣，又到哪里去找呢？既“很少反映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民众的生活情形”，就不仅限于对生活的反映不够广、深了，章先生仍要称赞这是“文学的自觉”，不知是哪一种“自觉”？

第二，从深层看。章先生强调以情动人，这“情”有“人的本性”作依据。但这“人的本性”终于又只能归结为“个人性”。于是，“社会”和“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都只能落空了，连同“历史地变化了的人性”中的“历史”也落空了，因为“历史”总不能是非社会的历史。

那么，“感情”还剩下什么？感情本来只能是活跃在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活动，本来就是社会的产物。既然不讲社会，专讲个人，那么脱离了社会的纯个人“感情”又是什么东西呢？实在叫人难以明白。我们知道章先生在中国古代，最推崇南朝二萧（萧纲、萧绎）的文学观，且看他在评价二萧中，是怎样演绎这种“感情”的。

首先他概括性地说：“就文学的自觉这个角度来看，最终完成一这历程的，是萧纲、萧绎。”然后又说：“直到一九八九年谈蓓芳氏发表《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上海文论》1989年5期），才对二萧的主张作了细致阐释，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地位。这不仅对了解二萧的文学主张，而且对理解整个南朝文学都很有益。”到底有什么“益”？原来谈蓓芳认为，萧纲的主张是“要求文学纯粹以作家自己的感情为依归，反对任何来自其他方面的束缚。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是‘石破天惊之论’。谈蓓芳的结论是：萧绎认为文学作品‘必须从这种违反‘中和’原则的、强烈到近乎沉迷的快乐或强烈的悲哀、愁思出发，并具有完善的艺术形式，从而使读者的心灵受到震撼。’章先生自己也这样评价萧绎：‘他对文学所要求的，只是强烈的感情和艺术上的美，此外不承认对文学的

其他约束，这就肯定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价值。到这一步才真正说得上是文学的自觉。”^{②⑩}

一再强调要摆脱任何“束缚”、“约束”，这正是章先生非理性、强调个人情绪的文学观的最明确的信号。所谓“沉迷”，近似古希腊大哲柏拉图的“迷狂”。但柏拉图的艺术马车，除了有一匹疯狂的烈马之外，还有一匹驯马，最终就是这匹驯马，与御车人一同制服了烈马，正常地走向既定的目标。^{②⑪}可见被世人目为浪漫主义的老祖宗的柏拉图，也讲究理性，并非主张摆脱任何束缚的。

章先生把魏晋和南朝文学硬绑在一起，都算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的，而且对南朝文学评价比魏晋高。鲁迅先生的说法正与章先生大异其趣。他是最早提出魏晋文学属“文学的自觉”的人；并且引用刘勰的话“嵇康师心以遣论，阮藉使气以命诗。”然后说：“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②⑫}这话明显就把南朝排斥在“文学的自觉”之外。那么鲁迅对呢？还是章先生对？我们不妨拿两种文学创作来比较。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文和阮藉的“咏怀诗”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处处令人感到时代风暴，有真感情、真个性。而载在《玉台新咏》等著中的萧纲、萧绎自己的作品呢，看不到社会不待言，谁又看得到多少感情、个性呢？更何况屡屡被古人斥为“亡国之音”！如果这也算“文学的自觉”，又是哪一种“自觉”？

也许最后连章先生自己，也对这种“自我”盲目膨胀的文学观感到不安，疑心说得过火了，他说：“假如作家本身的人性已受到严重扭曲，那么，即使作家本人确实极为感动，读者也无法与之共鸣。——一个杀人狂的作者，在疯狂杀人之后的喜悦，至少今天的绝大多数读者都无法与之分享。”^{②⑬}但是这声明已经发表得太晚。因为从章先生的理论出发点——脱离社会的“人性”、“个性”、“感情”——那里，已经预告了人性的扭曲，乃至感情的淡漠或反常的“强烈”等等。

以上便是我对章先生文学观的第二点意见。

归纳起来，章先生文学观的弱点在哪里？就在前引马克思所警告过的：“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物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章先生正是这样，以为可以斩断社会与个人的种种联系，把前者作为一个抽象、无用的

概念搁置一旁。譬如他可以将李白对社会的态度、辛弃疾对国家命运的态度置之不顾；然后指挥李白喝酒作乐，辛弃疾作皇帝梦（眼红刘裕、孙权等）。他以为前者（对社会、国家的态度）是纯社会的，后者（喝酒、做梦）则是纯个人的——因而又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两者是“对立”的，于是可以脱离接触。他以为可以像脱衣服一样把社会脱下来，然后就剩下个人；这样就成为大救星，把纯洁的“个人”从万恶的“社会”中拯救出来了。殊不知社会毕竟不是衣服，它和个人是血肉相连的，一旦切断了两者的联系，“纯洁的个人”不但没有得救，反而是被“杀死”了。这就是我们在章先生笔下，看不到历史上真实的李白、辛弃疾等大诗人、大作家的原因。

所以我认为，在那被章先生补充过的关于文学本质或文学观的答案中，“对社会生活形象反映”这半句，骨子里是被掏空了的，剩下的其实只有“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这半句。我们看到在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出了大大小小的许多问题，究其根由，都和章先生这个答案有关。比方说，把整部中国文学史看作贯彻始终的“情”与“理”的斗争史，由此而来引起的对魏晋和南朝文学关系的判断、对唐代文学批评、古文运动、公安三袁及晚明小品的评价；把李白、辛弃疾“庸俗化”，把杜甫“隐形化”，把萧纲、萧绎“巨人化”；此外还有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分际和衔接的阐释等等。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商榷探讨，只好由别的文章来承担了。

①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导论”第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下同）。

②《中国文学史》“导论”第2页。

③“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卷二十一，北宋蜀刻本，影印）。

④“导论”21页。

⑤“导论”第20页。

⑥“导论”第20页。

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

⑧同上，76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6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

⑩“导论”第22页。

⑪“导论”23—26页，40—45页。

⑫“导论”25页。

⑬“导论”26页。

⑭“导论”42页。

⑮“导论”43页。

⑯“导论”59页。

⑰“导论”14页。

⑱“导论”19页。

⑲《中国文学史》下卷，298页。

⑳“导论”54—58页。

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131、132页等，“斐德若篇”，（1963年一版，1980年第二次印刷，人民文学出版社）。

㉒鲁迅《而已集》，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一版）。

㉓“导论”59页。

作者黎乔桂，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讲师（510630）

责任编辑：童 轩

龙泉明教授谈现代文学研究

□王 毅

王：龙教授，您从80年代中期开始读硕士研究生，十年之后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年轻的博士导师，一定有不少成功的经验，您在学术上是如何走过来的？

龙：在别人眼里，十年也许是短暂的，但我清楚其艰苦和漫长。在当今社会里，我对自己走过的这段路，大概只能以“甘苦寸心知”来概括。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心理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审美意识进行多角度的探讨；对中国新诗的流变规律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述。

王：您的《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分析》一书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它被誉为“一部审视角度比较独特的、自成系统的文学史论著”，是“第一部以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广角扫描’的形式，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普遍规律，尤其是其内部矛盾运动规律的学术论著”。您能否从该书作者的角度，在此谈一下您对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的研究？

龙：这个课题之所以引起关注，我认为首先是它具有独特的价值。作家的文化心理，似乎是很难用理性的语言确切描述的，其具体内容与结构形式又是众说纷纭的深层意识活动。然而，它事实上在作家的客观艺术实践中有着十分生动的体现，决定着作家的艺术个性。另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前多少有些零碎。因此我更关心系统的文化心理分析。我力求从历时性与共时性，外在与内在的统一，即在时间与空间的立体交叉建构上对现代作家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从而在一个特定

的层面上构筑起新的理论框架和评价系统。

我把对现代作家文化心理的探讨看作是研究作家与作品关系的重要目标，因为文学作品的产生不仅受作家文化心理的内在制约，同时，作家的文化心理意向还规范着艺术表现的选择和相应的审美效应的产生。所以，在审视现代作家在文化选择上从“离异”到“回归”的趋向，思想启蒙过程中的“立人”与“救亡”交织，作家人格建构由“古典”向“现代”转换，审美选择从“个体自由”向“群体规范”嬗变，及其现实功利的价值取向，经验与理性蕴涵的艺术思维模式和丰富多样的意识构成的整体中，都着力于从文化深层次上揭示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内在基因，从文化心理机制与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上，把握现代作家创作的基本特质，洞察现代文学的历史精神和内在规律，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对作家文化心理的探求，同时也是对文学史客观规律的更深入的阐发，对作家文化心理的个别与综合的考察，能够发掘和提炼出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所以这种研究，实际上基本构成了一种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系统，是切入现代文学发展史研究的一个尝试。

对现代作家文化心理的研究，我一以贯之的思路是，在论析多种文化心理现象时，都力图把它置于“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其一，这种“交合”，既是指作家文化心理与现存的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外在联系，又是指作家文化心理与古今中外文化碰撞、对流的内在契合；这既包含着对作家文化心理背景的深刻透视，也包含着对作家文化心理的内在成因的认识。其二，

这种“交合”，也是指研究者在把握作家的文化心理时，始终注意由心理现实返观历史的暗流，或以历史传统解读现实心理的图式，揭示现代作家文化心理的历史演化逻辑。其三，这种“交合”，还指研究者不但对作家文化心理的分析准确地复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从作家文化心理的复杂交结关系中，发掘其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正因为作家心理多侧面地、内在地体现了这种“交合”，我的论述才可能充满深切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具有辩证性与可信性。

文化心理既是一种观照事物的角度，又是探寻事物动因的基点；既是一种研究事物的方法，又是决定事物相互联系的根本环节，这是它的独特价值和优势所在。比如，我通过对现代作家在人生态度、创作意趣、功能观念等方面的综合论析，认为现代作家的价值取向是以现实功利为核心的，现实功利的价值取向既表现在对事物的现实价值的重视，也是表现为思维偏执于研究事物的现实功能。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的文学对象一般不越出现实生活界限而无所依傍；他们的情感一般不越出人际界限而狂暴倾泄；他们的理智一般不越出伦理政治界限而自由翱翔；他们的审美一般不越出现实功利而无拘无束。也正由于此，中国现代文学缺乏个性焕发的理想色彩和无边无际的艺术想象，缺乏严格的内在形式和深致的理论探索，缺乏超现实功利目的更高层次的艺术审美观照。

王：走过了文化的宽阔地带，我们看到，您把研究的笔触又伸向了文学的美学领域，出版了显示着您的实力和个性的《中国现代作家审美意识论》。文学的美学研究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课题，因为以前的研究造成了从美学到美学、从文学到文学的思维定势，它往往给人一种将美学与文学“隔离”的感觉。您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个难题的？

龙：是的，我也清楚它的难度。因此我才努力以中国现代作家为审美对象，真正从美学的角度对现代作家的审美对象，真正从美学的角度对现代作家的审美趣味、

审美能力、审美心理、审美感受、审美观念、审美理想等，进行深层次的观照，将研究对象放在整个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中和整体的多向网状联系中进行动态考察，将研究思路尽量向文艺美学史的宏观把握延伸，从而使美学对文学的渗透以及文学的审美内涵获得新的阐释。因此，它的意义就不仅限于对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的某种历史束缚的突破，而且对作家走向文学的美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方法上，我力求通过比较分析和细致分析求新出新。其中主要就是在更自觉、更完整的层面上，开展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包括对现代作家内部的比较分析、对现代文学流派的比较分析，还扩展到与古代文学、外国文艺的比较研究，而且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与当代文学思潮的比较。我认为，成功的比较不是简单的比附，它需要广阔的视野和精细的辨别能力，这样才能使评价深致和准确。

在这之后，我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比较分析》一书，就是这种比较方法推广运用的结果。它是全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作品、流派、思潮和理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历史比较分析专集。像这样较为系统的大范围的多课题的比较分析的专著在当时还是少见的。

王：与整个现代作家的文化心理及审美意识相比较，新诗是窄一些的领域。但在我看来，其难度却不在前两者之下。新诗虽然有了80年的发展史，但似乎仍然处于比其它文体更需要为自己辩护的境况，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龙：新诗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我认为现在到了应该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总结的时候了。这些年我致力于新诗研究，就是力图站在历史和理论的高度全面审视新诗走过的历程。既对阶段性的诗歌现象进行历史的总结，又注重把握整个诗歌发展的内在本质特性和规律，力求使新诗研究在广度、深度和力度上向前推进一步。

王：您能举例谈谈吗？

龙：拿二三十年代（20年代中期至30

年代后期)来说,我认为其诗坛主体趋向可以概括为“对峙、竞争与超越”。普罗诗派——中国诗歌会——“密云期”新诗人与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先后相峙鼎足,他们都以不同的审美规范开辟自己作为独立流派的生存空间。持续十多年的流派竞争,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繁荣。两者间的先后并立对峙,构成诗坛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和潮流。前者在进步的社会文艺思潮的引导下,投入现实斗争,密切诗与时代、群众的联系,强化诗的现实功利价值,选择的是一种积极的与社会对话的方式;后者主要在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下,逃避现实矛盾,走进艺术之宫,深入人的心灵,追求自我表现与唯美艺术,选择的是一种消极与社会对话的方式。前者体现了服务于社会政治的使命的英雄情怀,后者则体现了执著于自我表现和纯诗追求的艺术理想。从总体上看,他们二者始终存在着—对深刻的矛盾:即政治和艺术的矛盾、革命功利性与审美情趣的矛盾。诗歌内部的矛盾运动,制约了诗歌潮流的产生,也制约了诗歌潮流的发展。二三十年代两种诗潮的互相对峙与互相否定、互相竞争与互相补充、互相融合与互相超越,构成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内在动力。

有了对阶段性诗歌现象以及诗歌内在本质规律的把握,才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单个诗人进行全面的认识。例如对戴望舒的评价,以前评论界众说纷纭,在对他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上,一般至多把他视为“现代”诗派的代表人物。但在我看来,在整个二三十年代诗坛上,戴望舒都具有代表性,是30年代新诗的最高综合者。这倒并不是因为他的诗歌成就高出了同代著名诗人多少,而是他的诗歌中所内含的多种思想艺术素质,都显示着或潜存着新诗的发展与流变的种种动向,其丰富性、综合性、典型性,是可以作为新诗从幼稚到成熟,从奠基到拓展阶段的标尺来看待的。

王:说到戴望舒,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命运。您能否也谈谈现代主义诗歌及其研究的情况?

龙:大致说来,研究界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态度随着时代的不同而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现代主义诗歌被等同于资产阶级“颓废”、“没落”之类,遭到彻底否定。新时期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态度出现了“对半分”的情况,即在否定其内容的同时,开始肯定其艺术。目前,情况有了进一步变化,即在肯定其艺术的同时,认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内容亦有可取之处。毫无疑问,对现代主义诗歌认识的逐步加深,将对整个新诗研究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现代主义作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特定时期的艺术产物,对生命本体的不解和迷茫,对人生的厌倦和绝望,对未知事物无可奈何的表现,具有特殊的艺术功效。它对处于黑暗与光明搏斗的现代中国社会的诗人来说,必然具有某种共鸣。他们必然会把它作为现代情绪的重要表现方式。现代中国不是不需要现代主义,现代中国人不是不能接纳现代主义,而是外在社会环境并没有给它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无论如何,现代主义诗歌在艰难曲折的生存处境中结出了丰硕果实,它在表现技巧、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现代杰出的诗人行列中,它有不少是现代主义诗人或曾经接受过现代主义影响的诗人。所以,现代主义诗歌在现代中国的生存处境虽然尴尬,但其诗学价值和历史地位却不容忽视。

至于当前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我认为水平不算高,成绩也不够理想。其根本原因恐怕在于一些诗人文化素养较差,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理解相当片面,以至一味摹仿。我们应当从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借鉴西方现代主义中有价值的部分,综合各种艺术手法,形成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只有这样,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路子,造就自己的大师。

作者王毅,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生(430072)

责任编辑:陶原珂

广东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印记”

——读《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杨昌俊

高伟梧所著《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一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广东改革经验总结并上升到理论探讨的又一新的尝试。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的演变有三个阶段,即“改革前的阶段、改革阶段、改革后新体制稳定阶段”。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是从对改革前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弊端的批判和分析开始,这种理论称为改革前的市场经济理论;当前立足于本国的现实土壤,对市场经济的形成、变动和发展,对在各种复杂条件下的运行机制分析和研究,这可以称为改革中的市场经济理论。于光远认为,该书“不仅讨论了一些一般理论问题,而且对广东的改革实践进行了分析和理论提炼。从书中可以看到从改革前的市场经济理论向改革中的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印记”。于光远的评价是确切、中肯的,本文拟对该书特点、观点与方法作些具体论证。

特点

首先是结构特点。该书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为两大主题,并把两者溶为一体为论述对象,因此该书既非通常的市场经济专著,也非通常的社会主义专著。在结构上,先论述市场经济一般理论与实践,然后以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提法为结合点,论述社会主义。这一结构的鲜明特点,就是说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而不是相反,市场经济必须建

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从而明确无误地标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这也说明市场经济具有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须遵守的普遍性,包括一般运行规则与国际惯例等,而社会主义则显示我国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特殊性,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特有的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特有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公民社会结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

其次是逻辑特点。该书逻辑展开方式,一是以改革前与改革中的市场经济为程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为起点,时间跨度较大,经济理论与实践向前推进的连续性线条较为清晰。二是理论与实践交错论述。如先论证市场经济一般理论,再论证广东市场经济实践与启示,然后论证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理论与实践,最后论证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到以虚带实,以实求虚,虚实并举。

观点

该书主要论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及其结合,视野广阔,提出许多从广东丰富的改革实践中提升上来的新的观点。这里择取部分观点,作一介绍。(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体论”观点。该书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统一的社会经济运动,是市场经济又是社会主义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本体,而非体外之物,也不是体内分离,而是相互储存相互制约,兼容于一体”。(第202页)(2)市场经济对所有

制更有决定性的观点。该书指出：“在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市场经济更有决定性，更为基础，市场经济决定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一般过程，所有制只是在这个过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财产分配制度，它到底得服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是所有制决定市场经济，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存在着共性，要消灭资本主义就非消灭市场经济不可，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继承性。”（第 191 页）（3）企业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共溶点”观点。在书中说：“现代企业组织仍是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细胞。因此，社会主义首先要使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企业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共溶点，只有建立起企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宏观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可能确立和巩固。”（第 192—193 页）（4）股份合作经济向股份经济转化的观点。该书指出，股份合作制“存在着股份制与合作制难于调和的矛盾，……所以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股份合作制的企业不断地转到股份制去也是必然的。”但是有一部分股份合作制企业能长期存在下去，因为“股份合作制最适合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社区农业经济，土地不可能转移与再生，土地不可能完全按市场法则分配，在民族群体中还按‘身份’而不按资金获得合作权，这样股份合作制就还有社会经济的基础。”（第 185 页）（5）国家经济职能上升为首位的观点。该书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国家又向社会回归的历史阶段，国家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的关系，则随着‘政治国家’向‘非政治国家’的转变而变化。……这一时期，国家的经济职能就上升为第一位。”（第 133 页）“计划经济最根本的弊病在于政治错位，经济服从政治，国家上层建筑直接取代经济基础，超越了自己的权限，扩大了政府的功能。”（第 134 页）（6）从传统的国家政治化的社会转变到现代公民社会的社会模式转变的观点。该书指出：“公民社会也称作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并不局限于

城市和城市居民，而是表达一种与政治国家相对称的社会形态。公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并存的局面，是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社会自我运行，自我约束，但也不是完全摆脱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第 252 页）“公民社会……从最深层次来说我国现时的改革与发展最根本的就是重新界定公民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对公民的责、权、利作统一的制度安排。”（第 255 页）“公民社会是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以及现代文明的社会基础，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现代文化是公民社会的内容与表现，是公民社会发展与成熟的标志。”（第 256 页）

方法

该书曾运用与发掘改革中运用的多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现列举几种如下：（1）一般与特殊结合。任仲夷同志对该书的题词中有过明确的表述，他说该书一方面“具有丰富的材料”，可以从中多方面了解广东实行经济改革的“特殊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从广东改革实践中找出“更多的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上升为理论的东西”。“此书的最后定稿，仍然是以广东的实践经验为依据。这样做，无疑是非常正确的。”（2）内容与形式的结合。该书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有制从内容上规定着这种经济的社会性质，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实现这种社会经济组织和运行的方式，从形式上规定这种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程序以及动力和调节机制。”它们也可以说是“内质与形体”的关系。（3）破与立的关系。该书认为，广东改革经验是“先体外后体内，先增量后存量”（第 88 页）即以开放促改革，先从阻力最小的旧体制外先发展起来，让经济增量先进入市场，率先形成新的体制。这样才能够在改革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实现改革与建设同时并举，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与提高。这就是广东人所说“先建新楼，再拆旧楼”的改革程序。当然双轨过渡时间不能拉得太长，避免“新楼”建起来，“旧楼”

读《清诗流派史》

□陈永正

近年来,清诗逐渐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内地和港、台地区都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而刘世南先生的《清诗流派史》则是其中颇具特色的力作。

该著在清诗研究上采取了新的审视角度,从流派的兴衰发展着眼,辩证地分析、论述有清一代诗歌历史。正如敏泽先生在《序》中说的:它“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在为史的体例方面,也是有所突破的。”

全书分前、中、晚三期对清诗流派的发展

展作了全面的考察,并依次分析各个流派及其代表作家的思想与艺术特色。前期包括河朔诗派、岭南诗派、虞山诗派、娄东诗派、秀水诗派、神韵诗派、宗宋诗派、饴山诗派,并特意为顾炎武设置了专章;中期则有浙派、格调诗派、肌理诗派、性灵诗派、桐城诗派、高密诗派、常州诗派;晚期有宋诗运动和同光体、汉魏诗派、中晚唐诗派、诗界革命派,并有龚自珍的专论。通过对这些流派的论述,完整地勾画出清代诗歌流变的全过程,总结了清诗发展的规律。作者认为:每一流派对以往各流派的理论、创作的成果,都必然有吸收和扬弃;即使是宗仰前代某一理论也必然渗入后者新的时代审美因素以及个人的审美情趣;诗派的生灭盛衰,其关键因素在于补偏救弊,每一流派都是为了对前此诸流派的偏弊作出补救而生而盛,亦由于本身的偏弊而为后出流派所补救而衰而灭;同一流派的作者群也在不断分化,后有的蜕变为另一流派。在对流派的研究中,作者注重从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诗人审美追求这三个紧密相联的环节进行论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从个人好恶去评价每一个流派的理论和作品,在明确区分进步与落后流派的同时,对后者也标举其艺术特色与理论价值,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

本书在对每一流派及其作家的评论中,颇多精辟独特的见解。如第一章对河朔派的论述,指出理学对申涵光等人影响,诗人强调忠孝,以孝为本为先,故不愿出仕

又不拆,使一些人既住“新楼”又占“旧楼”,两边利益均沾,造成摩擦。为此改革中必须增量与存量改革连动,相互配合与促进,但最关键的还是存量的体制改革。

该书主要总结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市场经济改革的经验,正如于光远所说,广东作为市场经济的先行地区,与其他地区相对而言,这些地区市场经济发育较充分一些,因而可以为改革中的市场经济理论提供较丰富的素材。当然各地区

市场经济发展中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点,会出现“一制多式”状况。因此该书的理论意义,不仅是对广东,而且对其他地区提供了直接的或间接的设计改革中或改革后的制度格局的思路。该书也有其缺点和不足,如对某些概念运用的准确度、某些层面论述的深广度似仍有可修改补充之处。

作者杨昌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谭湛明

清朝,而又为保全家室而成为傅山所斥骂的“奴儒”,言之成理。第三章论顾炎武,则从顾氏宣传“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上立论,谓顾氏思想已超越“忠于一姓”的观念,其诗以“真”与“深”对整个清代诗风都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第四章分析钱谦益迎降的动机,谓钱氏《书广宋遗民录后》引文中子《元经》“陈亡具五国之义”之说,说明钱氏严华夷之辨,有恢复之志,亦持之有故。第五章引全祖望谓吴梅村谀洪承畴之事,指出《圆圆曲》不能作诗史实录读。吴骨头太软,甚至不能与钱谦益相比。第六章谓清诗一大特色,是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的统一,当以秀水诗派创始人朱彝尊为代表,然朱氏学过其才,才不胜学,故其诗不能自成一家。此说亦甚有见地。第七章分析王士禛不取杜的原因,谓王氏取“正”而不取“变”,喜“美”而不喜“刺”,力求表现“治世之音”,与杜本不合拍。又为王氏的“妙悟”说作辨,谓妙悟即今之所谓灵感,指出钱钟书谓“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之说纯属误解。第八章指出清初宗唐派与宗宋派之争包含杀机。唐诗正声,宜歌咏升平,而宋诗则宜抒兴亡盛衰之感,故宗宋派受到政治上的压抑。第十一章论格调派,谓沈德潜继承明七子的“调”而变其“格”之内涵,七子谓“高古者格”,而沈氏则变为诗之“本原”,亦即“诗教”,以便“鼓吹休明”。书中并批驳今人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中对格调论的赞美。第十二章论翁方纲创肌理说的甚

深用心,是企图用来对抗并打垮在野的性灵说。第十三章谓袁枚以通俗小说为诗,追求新奇和风趣,具有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性灵诗求新求变,打破人性枷锁,真正体现了“清诗”的特色。第十六章论黄仲则,说他把贫贱生涯当做一种审美对象来吟咏,黄诗的特色是“悲”,而“悲”也是一种审美快感。第十七章批评后世学龚自珍诗的人,如南社诗人(特别是柳亚子)“太过轻易”。无龚氏之气质、学养以及思想家的高度思辨力,徒然在字词句上模仿,自然不可能成功。第十八章分析同光体诗的艺术魅力,在其语言风格与意境美,谓陈三立是中国旧时代最后一位诗人。

全书新见创见甚多。有些论断虽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和商榷,但也可开阔读者的思路。如论岭南诗派,在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三家中,去梁氏而补以释函可;论虞山诗派,谓冯舒、冯班学晚唐,是诗歌发展规律的体现,等等,作者均能自圆其说。书中尚有一些较明显的缺陷,似应在再版时修订。如全书前半部写得很认真、细致,而后数章则稍嫌粗略,有前重后轻之病。又,不少诗派的重要作家都未曾论及,如论秀水派不提钱载;岭南派不提黎简、宋湘;同光体不提沈曾植、郑孝胥;汉魏派不论述邓辅纶、高心夔,等等,均是不应有的疏失。

作者陈永正,中山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东盟教育研究的扛鼎之作

——评《战后东盟教育研究》

□王学风

华南师范大学冯增俊、卢晓中两位教授主编的《战后东盟教育研究》，对东盟五国的教育发展作了颇为全面的展现，对全面了解和研究东盟教育，探讨五国经济腾飞与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它以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比较五国教育发展的特点，为我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颇有借鉴意义的、教育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是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面的一朵奇葩。

全书共有七章。第一章为导言，阐述了研究战后东盟教育的现实意义。作者指出，东盟五国的教育发展都带有明显的后发生型教育现代化的特征：既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又带有其它宗主国教育发展模式的烙印，其特点与我国教育发展的状况极为相似。因此，考察东盟五国丰富的教育发展的经验，会使我们在当代教育改革和发展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

第二、三、四、五、六章采用“个案研究”方式，分别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战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教育发展。该书是集体攻关与合作研究的成果，体例上有所不同，但研究的重点及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着重从战后五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现行学制与管理体制、以及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层面探讨战后五国教育发展的特色、问题及经验教训，分别探索五国如何从本国固有的传统教育、外来宗教建立的教育、入侵国兴起的教育、逐步推进到教育现代化的颇相似的发展进程。而重点在描述其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第七章“东盟教育实践与教育现代化既是总结性的又是开拓性的成果，在前面几章的研究和论述的基础上，对东盟五国教育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世界教育现代化的高度考察了东盟五国教育发展的内在意义，探讨和验证了现代教育的一般规律，从而推断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应该注意推行的有关策略。

纵观全书，可以看出该书有以下几个学术特点：

(1)系统性。该书资料丰富而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且脉络分明，研究框架合理，宛如一幅综合、完整的图景。该书既阐述了东盟五国教育实践的方方面面，又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五国的教育经验，进而考察了后发外生型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共同特点和规律，使读者对东盟五国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和完整的认识，具有理论的启发性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2)针对性。该书视角独特，著者截取“战后”这个独特的视角来透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对我国的教育发展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从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末是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西方世界中有“70年代韩台港，80年代新马泰”的说法。战后东盟五国经济奇迹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因而，著者紧紧抓住“战后”这个特点作为研究视角，对东盟教育作了全面而细致的阐述。

(3)现实性。我国已出版的各国教育专著中，已有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和拉丁美洲等地一些发展中国家，但关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盟国家的教育却甚少研究，纵使有亦过于简略，只是零星、散乱地停留在对这些国家的简单介绍和表面描述上。而东盟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成功，使东盟教育研究对当前我国及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实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因此，研究东盟教育，具有填补空白的时代意义。事实上，该书在探讨战后东盟五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时不是事无巨细地罗列、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的，而是将东盟五国的情况与我国教育发展中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加以探讨的。吸收对我国教育改革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经验，在审视别人的同时也审视自己，从而达到以他山之石攻我之玉的目的。

作者王学风，华南师范大学教科所研究生(510631)

责任编辑：陶原珂

广东逻辑学会 1996 年学术年会论点综述

□黄绍汪

广东逻辑学会 1996 年学术年会,于 1997 年 1 月 7 日至 9 日在从化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逻辑专业工作者和逻辑爱好者 42 人参加了年会,会议收到论文 31 篇,涉及到逻辑与精神文明建设,逻辑与创新思维,逻辑基本理论问题和逻辑应用等多个领域。现将年会关于逻辑科学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 and 作用,以及创新思维的研讨综述如下:

一、关于逻辑科学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 and 作用,有代表概括为:(一)逻辑对培养文明的人具有育化作用。精神文明建设,归根结底是培养文明的人;文明的人必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即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在文明人的综合素质中,逻辑思维能力是最重要的带有基础性的素质;而逻辑科学的内容就是有关这些方面的知识,逻辑思维的素质是需要通过学习逻辑而得到培养和提高的。(二)逻辑为明辨是非提供了形式上的评价尺度。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树立真善美,揭露假恶丑;逻辑作为思维的工具,在认识真理,推翻诡辩方面具有独到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评价尺度。(三)逻辑是促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进步的基础知识。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科学发展水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逻辑作为思维的科学的科学则对其他科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在人类知识系统中,逻辑是最早产生的知识之一;在学校、尤其是大学是最早设置的几种课程的一种;逻辑方法和理论,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曾发生过重要影响;逻辑推理和可控性实验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两大基石,现代逻辑在计算机科学、物理学、语言学和哲学等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总之,逻辑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物质文明水平,另一方面使人类不断地摆脱愚昧、无知和迷信,接受新的科学知识走向精神文明

的新境界。

二、关于创新思维问题。

有人指出,智力的奥秘是当今世界科学界所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四大课题之一,而创新思维又是智力的核心。那么,何谓创新思维呢?有人认为:创新思维是发挥人的自主创新能力,以超常规的眼界,从特异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提出全新的、具有创造性的方案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有人认为,这定义强调了创新能力在创新思维中的作用,突出了创新思维的超常性、新颖性和独创性等特征;但定义忽视了创新思维结果的创新性,同时也忽视了创新思维结果应具有社会价值性。因此,提出创新思维是发挥人的自主创新能力,以超常规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或者以新颖而独特的方法解决了问题,或者解决了新颖而独创的问题,且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的思维活动。该定义的外延范围广泛,更加符合思维过程的实际情况,不仅强调了创新思维的特征和功能,还突出了创新思维的机制。

有人认为,创新思维是相对于常规思维而言的,它是一种高水平的综合性的思维,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维、灵感思维……等各种思维的综合运用;在一定意义说,是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结合,是显思维与潜思维的联接。

有人对创新思维的心理基础 and 哲学基础进行了探索。认为韦特海默的《创造性思维》一书是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阐释创造性思维的范例。创造性思维是来自整体定形结构(格式塔)的重新组合,创造性过程是转变情景中心的过程,它是以顿悟的方式实现的。因此,格式塔心理学为创新思维的理论奠定了心理学基础。由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对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格式塔心理学奠定了哲学基础,因此现象学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又因为格式塔心理学

“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王承文

自本世纪30年代胡适、铃木大拙开创敦煌禅籍研究以来,有关禅宗研究已取得长足发展,并日益成为一门世人关注的国际显学。1997年1月3日至1月8日,由澳门大学、澳门佛教出版委员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和广东历史学会等单位组织的“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澳门、肇庆市和新兴县举行。来自内地、港、澳、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讨论会。会议提交论文40余篇。会议除进行多次认真讨论外,

与会代表还专程到新兴、肇庆等地参观了六祖慧能的遗迹。兹就本次会议所讨论的主要内容作一综述。

一、慧能及其禅宗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与会者一致认为,慧能作为唐代禅宗南宗的开创者和中国佛教史上的伟大改革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讨论集中在三个方面:

是创新思维的心理基础,所以,现象学是创新思维的哲学基础。

在谈及创新思维的时代性背景时,有人认为我国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全新任务,要求人们首先在思维方式上转型,思维要有自主、开拓、超越、创新。但在我国,在过去那种一切服从计划的传统社会体制下,创新思维可以说是人们思维中最薄弱的一环。而“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江泽民语),因此,用创新的理念观察一切,自觉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那么,创新思维在社会转型中有哪些表现?首先,如何面对过去,这有一个创新态度的问题。创新思维采取全新的态度对待一切传统的东西,既不全盘否定,也不简单继承。其次,创新应注意对现实的检讨和评判。80年代初实现了一次思想大解放,是真正的社会思维的创新,人们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社会。批判不是简单否定,它是以为发展为目的,它打开了思维的禁区。第三,思维主体的自主性、积极性是进行创新思维的前提,从有社会的需要到有现实的成果,要有人的自主性、能动性。从总体来讲,个体的自主性获得尊重、信息渠道比较畅通,僵化、绝对化的思维定势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主体的积极性与自主性存在使创新思维有了极大的发展,仅近10年,经国家专刊局批准的专刊就达26万多件。第四,创新思维具有

极大的超越性。创新是超常规的,同时带有预见性;它超越本土,面向世界,超越今天,面向未来,它始终在科学的前沿,并预示未来,因而能不断出新。当然,创新思维也是思维的艰苦过程。不管是顺利或曲折,对思维都是一种磨练,智慧将从中来。

有人对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创新思维,提出了一些想法。首先,尽快地、全面而有重点地引进国外最新成果;第二,大力提倡个案性研究和实验性研究;第三,综合前沿学科,应用最新理论,争取在基础性理论方面有所突破。第四,对一些哲学观点的解释,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把握创新思维的本质特征,使创新思维研究有所深化。

最后有人指出,一些人把创新思维讲得过于神秘、高深莫测,似乎常人无法把握,只能等待“灵感”自来,这是欠妥的。其实,创新思维也有规律,而且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对创新思维的研究,目前应特别重视下列几点:一是创新思维的前提、准备、条件、基础;二是触发思想“火花”的时机、机遇的把握;三是对思想“火花”的进一步充实、检验与完善。为了帮助人们掌握创新思维,我们应该加紧研究,创立中国的创新思维学。

作者黄绍汪,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冯生

1、关于慧能与佛教的中国化。慧能南宗禅产生的前因可归结为：印度本土佛教的衰落；中国仿印佛教的危机与衰落；儒道复兴强盛对仿印佛教的挑战；佛教在中国寻求继续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慧能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有学者认为所谓中国化就思想理论说，在相当程度上是指儒学化。“六祖革命”中最根本性的“革命”就是把传统佛教作为抽象本体的“心”变成更为具体现实的“人心”，变成一种儒学化的“心性”。并由此导致了禅宗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心性”之外，表现为把“佛性”“人性”化。儒学作为一种“人学”，最注重对于“人性”的探讨。慧能实际上是以儒家学说中惯用的“人性”取代佛教的佛性。由慧能肇端的注重入世的中国化佛教，也是受儒家学说中注重入世传统的影响，使中国佛教走上了把出世间与世间打成一片的入世之路。但是有学者则强调慧能禅宗中道家的影响。认为“禅”字作为翻译名词，其取诸《庄子·寓言》。在达摩之前，“禅”字已经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类似印度 Yoga 和 Dhyān 以定为核心的修习方法；二是已经开始老庄化特别是庄子化的哲学范畴，禅宗思想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禅宗的禅实际上是一种力图摆脱思维羁绊、超越相对、涵盖相对、游行自在的意境。有学者则认为慧能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入世成佛说与中国文化中的内在超越的特征息息相关；“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与中国文化中“道法自然”的传统一脉相承；顿悟成佛说与中国文化中“随缘任运，直观体悟”的精神天然契合。也有学者通过对东晋以来顿悟思想发展的系统疏理，认为从支道林、竺道生到慧能，顿悟思想经历了从析理到践行的发挥过程，而六祖的顿悟说则把中国人自远古以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思维方法——实践悟性——最彻底、最成功地加以表述和说明，因而完成了其中国化。

2、关于慧能南宗与北宗的关系。有学者强调南宗与北宗的最大区别不是顿与渐。神会攻击神秀“法门是渐”，但是从敦煌发现的北宗禅文书以及有关神秀思想的记载可知，神秀与慧能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共同的。顿悟并不是慧能思想的主体。神会将慧能思想统统归结为顿悟，是迎合听众急于成佛的心理而采用的宣传手段。因而有故

意曲解的成分。有学者认为慧能虽讲顿悟，但考虑到人的资质不同，并不完全反对渐修。也有学者从境界思想入手比较慧能禅宗与达摩至神秀禅宗主流的差异。认为达摩至神秀的境界思想是一种舍有限(个体生命)而入无限(涅槃胜境)的境界，故包含着对众生现实生命的否定。从致思思路言，它走的是一种离用(妄心)归体(真心)的外在超越之路。而慧能境界思想的独创性则表现为澄显了一种于有限中体认无限的境界，实际上体现了对众生现实生命的理性肯定。从致思思路言，它走的是本体即存在这样一种即体为用于用入体的内在超越之路。还有学者从佛教忏法体系来比较六祖《坛经》中的无相忏即自性忏与同为禅宗北宗的《大乘无生方便门》中的忏悔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亦是南北宗在理论上的分野。

3、关于六祖慧能及其禅宗的影响。与会者认为，慧能及其禅宗破除了已经陈腐的传统佛教观念和教条，使佛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了中国佛教的特质，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也正因为这样，在唐代会昌毁佛的大劫难中，不少印度化的宗派走向灭亡，而南禅却获得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和广泛影响；慧能对心性理论的新发展是他所创立的南宗禅最有价值的部分，其精神实质是肯定人清净自性的绝对性，从而最终建立起一个个性解放与内在超越的世界。这种重视人的本质的思想是一种人文精神的闪光，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慧能禅宗主流地位的确立促使了唐宋之际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构。从中唐到两宋，儒学群体经历了崇儒排佛到以儒融佛的过程，而这也正是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逐渐确立过程。

二、关于《坛经》的文本研究

《坛经》是慧能弟子汇编其弘法语录而成，中国佛教著作中称“经”的惟此一部。它是研究慧能禅宗思想最主要的依据。对《坛经》的整理和研究也一直是本世纪禅宗研究的重大课题。

胡适以来，“敦煌本《坛经》是神会弟子之间传授的秘本”似成定论。但是有学者认为这个推论一方面明显不合适抄本所述的传授系统，另一方面有足够证据表明9世纪初以前敦煌本已经很广泛地流布。应该是神会的弟子们得到了这个原本，为确立神会的权威加写改编了几次变成了今天所见的敦煌本。敦煌发现的六祖《坛经》共有五个写

本,有学者指出目前已有的校录本或重译本尚存不少疏漏,因此,对《坛经》的整理工作还远未结束。现代欧美地区的“禅宗热”与对《坛经》的翻译有关。自1930年黄茂林居士首次翻译后,先后又有五种英译本。有学者专文探讨了各种英译版本的特点及其流传。印顺法师在其《中国禅宗史》中曾提出《坛经》实可分为几大部分。有学者研究《坛经》的结构认为,其起首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授无相戒的开法记录,中间是与十大弟子等日常的传法记录,殿后部分则是先天二年(712)在新州的说法记录。

对《坛经》的文本研究发展到今天,引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完全必要的。不少学者为此进行了新的尝试。有学者从语源学、修辞学、佛典文本学的角度通过对《坛经》中的神秀偈的几个重要隐喻性概念进行了剖析,认为神秀偈义完整,形式成熟,形成较早,而慧能偈的定型则经过了门徒长期的润色修正,较晚完成。因此,研究《坛经》必须注意不同历史环境中宗教文学修辞和宗教术语、宗教哲学理念的微妙关系。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敦煌本《坛经》中范围副词的使用,并与唐代不同时期有代表性典籍进行比较,试图以此确定其形成年代。还有学者将《坛经》中的宗教术语及其所表达的宗教哲学理念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

三、慧能及其禅宗与岭南文化

慧能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活动在岭南。中国中古佛教思想史上的“革命”并非完成于中原内地的某一高僧大德,而是完成于来自蛮荒边裔之地的岭南而且似乎并没有太多佛教修养的慧能,岭南随之亦成为“革命的策源地”。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因此,慧能及其禅宗的研究实际上应关系到岭南中古时期较隐秘的那段文化史。慧能与岭南文化作为本次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无论是资料的开掘还是理论的探讨上都有一定的突破。作为禅宗研究中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资料较系统的开掘和具体而深入的专题研究往往是十分必要的。从资料范围来看,包

括了唐宋禅宗典籍、碑刻及其他文献、地方史志、族谱、实地调查报告。另外,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作为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往往亦能弥补文献史料的匮乏。学者们认为,历史人物的活动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慧能成为禅宗大师与其特定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唐初新州和岭南特定的社会、宗教和文化环境均有密切关系。例如慧能谒五祖弘忍以前实已具有禅宗的某些重要思想,唐代初年素称荒僻溪洞深远的岭南新州其实是一个拥有不少寺院、佛教较盛的地区。慧能以后,禅宗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不断扩大。有学者研究了唐代岭南佛寺群的分布特点和禅宗早期在岭南的具体传播。韩愈与潮州禅师大颠的交往是一段有名的学术公案。有学者以一些新发现的族谱等材料探讨了禅僧大颠的事迹和禅宗丛林经济在粤东地区的发展。60年代在广东曲江南华寺曾发现一批北宋木雕罗汉像铭文,有学者以此从一个具体方面证实了作为禅宗祖庭的南华寺在宋代岭南僧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初在四川的广东移民聚集区普遍出现的以南华宫命名的会馆和六祖崇拜则凸现了六祖及其禅宗的影响对岭南社会基层的渗透以及在社会与文化整合中所获得的地域象征意义。在岭南精神文化方面,岭南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诗歌、绘画及书法艺术等方面都反映了慧能禅宗的影响。有学者还将慧能与奠基江门心学而使明代理学发生重大转变的陈白沙进行比较,并以此揭示古代岭南思想文化中强调个人在精神上的自由性和思想创发性的独特品格。

讨论会进行中有评议、质疑和辩难,气氛始终严肃而热烈。与会者普遍认为,在禅宗研究日益成为国际显学的今天,一方面要加强严谨扎实的研究,同时还要加强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以不断开辟新领域,拓宽新视野。

作者王承文,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510275)

责任编辑:林有能